

王蕴章（1885-1942）及其《燃脂余韵》
研究

A STUDY OF WANG YUNZHANG (1885-
1942) AND HIS WORK *RANZHI YUYUN*

孙亚楠

SUN YANAN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2013

王蕴章 (1885-1942) 及其《燃脂余韵》
研究

A STUDY OF WANG YUNZHANG (1885-
1942) AND HIS WORK *RANZHI YUYU*

孙亚楠

SUN YANAN

(B.A. Hons, NUS)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

硕士学位论文

A THESIS SUBMITTED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OF ARTS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2013

Acknowledgement

First and foremost, I would like to show my deepest gratitude to my supervisor, Associate Professor Su Jui-Lung for being a patient and supportive mentor throughout my two years of study. This thesis would not have been possible without his immense knowledge, valuable guidance and kind encouragement.

I would also like to extend my thanks to Professor Grace Fong from McGill University, one of the initiators of the McGill-Harvard-Yenching Library Ming-Qing Women's Writings Digitization Project. This digital archive of the collections of women's writings provides useful materials and data for my research. Professor Grace Fong has also been a visiting scholar at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in December 2012, the workshop and seminars conducted by her during her visit have benefited me greatly.

My heartfelt thanks also go to all other teachers who helped me to develop the fundamental and essential academic competence. To all the non-teaching staff of the department, I also owe a debt for their timely help.

Lastly, I would like to thank my family, friends and all of those who supported me in any respect during the completion of the thesis.

目录

Acknowledgement.....	i
Abstract.....	iv
第一章 绪论	1
一、研究背景.....	1
二、前人研究总结.....	3
(一) 女性文学史料及作品的收集与汇编	3
(二) 明清妇女史的代表研究	4
(三) 女性交游群体与才德之辩	6
(四) 女性文学“经典观”的建立及其反思	8
(五) 清代闺秀诗话的相关研究成果	13
(六) 身处近现代转折期的王蕴章及其杂志编辑事业	15
三、研究意义与问题意识.....	19
四、研究文本及研究框架.....	19
第二章 《燃脂余韵》所呈现的女性生活与形象.....	23
一、琴瑟和鸣，赌书消得泼茶香.....	24
二、丸熊获画，教子成名母亦师.....	29
三、小结.....	36
第三章 《燃脂余韵》的编纂过程及编纂策略	38
一、《燃脂余韵》的撰写过程及其在涵芬楼出版月刊中刊载情况简述.....	38
二、《燃脂余韵》之编撰策略.....	41
三、王蕴章对于女性诗歌的品评.....	49
(一) 抒写性灵	50
(二) 雄壮豪迈的诗风	53
四、小结.....	54

第四章 从《燃脂余韵》看王与时人的交游状况	57
一、春音词社社员及其家眷.....	57
(一) 春音词社背景介绍.....	57
(二) 徐珂(1869-1928).....	58
(三) 潘飞声(1858-1934).....	65
二、女界治学先锋.....	66
(一) 易瑜(1868-1932).....	67
(二) 李素筠(生卒年不详).....	68
三、小结.....	70
第五章 节烈与死亡、气节与革命——王蕴章《燃脂余韵》广采节烈事迹背后之政治寓意	71
一、辛亥革命前后对于明季殉烈妇女事迹的书写及其政治寓意.....	72
二、《妇女杂志》中有关节烈妇女的议论及记叙.....	74
三、从王蕴章戏曲创作中对贞烈的书写看其政治理念.....	76
四、绍兴陈烈女殉夫一事引发沪上文人的热议.....	79
第六章 结论	85
一、总结.....	85
二、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87
参考书目	89

Abstract

The *Ranzhi yuyun* is an anthology of poems written by female poets in the Qing Dynasty. As the compiler of this anthology, Wang Yunzhang was also the main editor of the two magazines that were published in Shanghai during the early Republic era (1910-1920), namely the *Fun ü Zazhi* (*The Lady's Journal*) and *Xiaoshuo yuebao* (*The Short Story Magazine*).

This thesis uses the *Ranzhi yuyun* as the major source, accompanied by a close study of relevant sources from the *Fun ü Zazhi* and *Xiaoshuo yuebao*. The first chapter of this thesis discusses the general content of the anthology. Chapter two examines the strategies adopted by the author in compiling such an anthology. Chapter three discusses the social involvement of the author in the contemporary society by studying relevant examples from the anthology. Chapter four discusses the implied political meaning of the records of chaste women in the anthology.

In conclusion, the *Ranzhi yuyun* focuses on women's role as wife and mother as proven by plentiful records of the examples of "boudoir responsorial" and "mother education" in the anthology. Wang Yunzhang adopted the strategies of the traditional anecdotal approach when compiling the anthology. Although Wang's comments on women's writings were not copious, he generally embraced the Natural Inspiration Theory in criticizing women's poetry.

Keywords: *Ranzhi yuyun*, Wang Yunzhang, Women's Study, *Fun ü Zazhi*, Anthology of poetry (*Shi Hua*), Gender Study

王蕴章(1884-1942)及其《燃脂余韵》研究

第一章 绪论

一、研究背景

清代是女性文学发展的极盛期，梁乙真(1903-1950)在《中国妇女文学史纲》中即曾说道，“妇学至清代，可谓盛极。才媛淑女，骈萼连珠，自古妇女作家之众，无有逾于此时者。”¹胡文楷(约1899~1988)《历代妇女著作考》统计历代妇女著作，清代以前从汉代至明代的女性作家仅350人，而清代则“超轶前代，数逾三千”²，单是有诗集、词集传世的闺秀作家就有三千人以上。妇女的识字率在明清两代大幅度提升当然是成就女性文学创作高峰的主要原因之一，组建家庭之后，闺秀又以良好的文学修养自觉承担起教育子女的重责，并在家学的建立和传承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地域性或家族性的女性结社亦间接推动了闺秀诗文创作，闺秀之间结伴出游、诗文唱和，以文字相互砥砺并给予彼此精神鼓励。清代男性文人的参与和支持亦是推动清代女性文学传播与发展的另一主要原因之一：随着出版业在明清两代的蓬勃发展，父亲及丈夫积极地保存及收集家庭女性成员的文学创作，并将它们刊刻成集；清代著名的文人如任兆麟（约1718年前后在世）、袁枚（1716-1797）、陈文述（1771-1843）、亦纷纷招收女弟子，鼓励闺秀进行文学创作，形成了诸如“吴中十子”、“碧城仙馆女弟子”及“随园女弟子”等数个庞大的女性诗人团体。

伴随着清代女性文学的蓬勃发展，保存女性文学创作及建构妇女文学理论亦转而推动了大量闺秀选集及诗话的创作，这些女性诗文选及诗话的编撰者有女性

¹ 梁乙真，《中国妇女文学史纲》，收录于《民国丛书》编辑委员会编，《民国丛书》第二编（上海：上海书店，1921），页874。

² 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自序〉，见《历代妇女著作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页5。

亦有男性，编撰体例与收录准则亦不尽相同。根据学者蒋寅的辑考与统计，清代专论闺秀的诗话，见存述二十二种，亡佚书十四种。³其中有清末民初男性文人王蕴章所著之《燃脂余韵》六卷，是一部断代及随笔体的综合性女性诗话。蒋寅认为该书“遇手稿、钞本、书简等必甄录亡佚，又载同时闺秀之作颇多，以资料言较他家诗话为尤丰富。徐彦宽跋称其‘卓然集清三百年闺秀诗词话之大成’，洵未过也”，⁴故此也引起了笔者的研究兴趣。

《燃脂余韵》的编撰者为王蕴章（1884-1942），江苏无锡人，字莼农，号西神残客、窃九生、鹊脑词人、湘纍、二泉亭长等，室名药庐、梅魂菊影室、秋平云室、篁冷轩、古建羨斋、玉晚香簾、云外朱楼、海山仙龕、雪蕉吟馆、一花一蝶亭、千二百轻鸾室。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仅16岁的王蕴章即中副榜举人，同时他又精通英文，早年曾任职学校英文教师。清末，王蕴章应上海商务印书馆聘请，主编《小说月报》以及《妇女杂志》长达十余年。1910年，王蕴章加入了清末民初最为重要的革命文学团体之一，南社。民国元年（1912），他曾任职于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后因工作不遂意，便辞去职位、游历南洋各国，并作有《南洋竹枝词》百首。后来王蕴章又回到上海，历任沪江大学国文讲授以及《新闻报》编辑，并主持正风文学院的教务工作。⁵

王蕴章多才多艺，除了治词章之学外，他亦精通书法，并擅作小说，常为沪、锡各报刊撰写小品文及小说。他的主要小说作品有《碧血花传奇》、《香桃骨传奇》、《可中亭传奇》、《铁云山》、《霜华影》、《鸳鸯被》、《玉鱼缘》以及《绿绮台》等。除了《燃脂余韵》外，现可见王蕴章所著之刊行本有《玉台艺乘》、《西神小说集》以及《云外朱楼集》，未刊稿本另有《梁溪词话》及《雪蕉吟馆集》等。

《燃脂余韵》是一部笔记体的闺秀诗话，“燃脂”，即“燃烛”之意，语本出自南朝徐陵（507-583）的《玉台新咏》序：“于是燃脂暝写、弄笔晨书，选录艳歌，

³ 蒋寅，〈闺秀诗话十二种叙录〉，《文献》2004年第3期，页253。

⁴ 蒋寅，〈闺秀诗话十二种叙录〉，页260。

⁵ 以上内容参考郑逸梅，《南社丛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页102-103；及〈燃脂余韵前言〉，见王蕴章，《燃脂余韵》，收录于王英志主编，《清代闺秀诗话丛刊》第一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页617。

凡为十卷。”⁶清初王士禄（1626-1673）作有《燃脂集》⁷，收录古今闺秀诗文，分赋、诗、文、说四部、六十四类、共三百二十余卷，即取意徐陵“燃脂暝写”之语。然而徐陵《玉台新咏》所选为艳歌，并非闺秀诗作，王士禄“燃脂集”之名本为误引。⁸王蕴章在《燃脂余韵》的序言中称王士禛（1634—1711）编纂体例与条目最为完善，于是便将错就错，有意延用“燃脂”之典故，为这部闺秀诗话取名。而实则王士禛《燃脂集》为古今闺秀诗文总集，而王蕴章《燃脂余韵》是一部以“诗文评”为体的诗话，二者的编撰体裁并不相同。

二、前人研究总结

（一）女性文学史料及作品的收集与汇编

关于女性文学的研究，最早的几部著作几乎都是通史或断代史类的著作。例如谢无量《中国妇女文学史》（1916）⁹，梁乙真《清代妇女文学史》（1925）¹⁰，谭正璧《中国女性的文学史话》（1930）¹¹。谢著虽是通史，但止于明代，梁著正好承接谢著，将清代妇女文学划分为遗民、极盛及衰落三个时期，“以诗为经，以史为纬”¹²，进行相关讨论。值得注意的是，梁著中已然对清代以几位男性文人为中心所辐射及发展的妇女文学群体有所关注。谭著虽然是一部通史，但是其关注点仍局限于“一时代有一文学”之史观，著作中对宋元以后的女性文学的相关讨论以小说、戏曲、弹词为重点。虽然这些早期女性文学的研究在视野上存在一定的局限，但仍不失为重要的参考材料。有关妇女文学目录及考略类的著作，理应首推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1957），此书处理的文献范围上至汉魏六朝，

⁶（陈）徐陵编，（清）吴兆宜等注，《玉台新咏笺注》，页13。

⁷《燃脂集》未经刊印，山东省立图书馆曾藏有传钞本，战后散佚，现上海图书馆藏手稿本仅九册。见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页906。

⁸“<燃脂集例>一卷，国朝士禄撰。士禄尝欲辑古今闺阁之文为一书取徐陵《玉台新咏》序‘燃脂暝写’之语为名。然陵所选乃艳歌，非女子诗，士禄盖误引也。”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转引自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页910。

⁹谢无量，《中国妇女文学史》（上海：上海书店，1990）。

¹⁰梁乙真《清代妇女文学史》（北京：中华书局，1932）。

¹¹谭正璧，《中国女性文学史话》（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

¹²王蕴章，〈清代妇女文学史序〉，见梁乙真，《清代妇女文学史》，页2。

下至清代，而清代妇女著作所占的文献比重尤为丰富。

另一方面，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汉学界也相继出版了几部大型女性文学选集，对妇女作品进行汇编、整理与翻译。由孙康宜主编的“*Women Writers of Traditional China: An Anthology of Poetry and Criticism*”（1999）¹³，分创作与批评两个部分，以时代为序，但其收录作品仅限于诗词。另一部大型选集则是由 Wilt Idema 及 Beata Grant 主编之“*The Red Brush : Writing Women of Imperial China*”（2004）¹⁴一书，其收录作品不止限于诗词，也包括短文、戏曲、小说等各种文类，所选作品也皆是知名的闺秀作家及其代表创作。另外一部值得关注的选集则是由曼素恩及 Yu-Yin Cheng 主编的“*Under Confucian Eyes: Writings on Gender in Chinese History*”（2001）¹⁵，虽然这部著作不仅仅收录女性作品，作者包括男女两性，而是以“性别观”为焦点选译相关著作，但其所录文类更为丰富，包括书信、尺牍等。通过以上这些女性文学选集的出版，我们可以看出西方汉学界对女性文学研究范围的扩展，尤其是学者对不同文类研究的开拓。

（二）明清妇女史的代表研究

若以明清女性家庭及社会生活作为整体参照，两位西方汉学家以史学角度切入而写作的两本专著则最具代表性，也最为全面。其一为高彦颐（Dorothy, Ko）所著之“*Teachers of the Inner Chambers: Women and Culture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中文译名：《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¹⁶，该书从妇女具体的个人生活经验出发，探讨了身处在明末清初社会文化背景下的妇女生活。该著中有两章着重讨论了明清妇女如何在家庭、闺秀群中以诗文活动呈现自我及构建社交网络，最后一章则以柳如是（1618-1644）等有名的青楼名妓为例，分析了她

¹³ Kang-i Sun Chang and Haun Saussy (eds.), *Women Writers of Traditional China: An Anthology of Poetry and Criticism*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¹⁴ Wilt Idema; Beata Grant (eds.), *The Red Brush: Writing Women of Imperial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4.)

¹⁵ Susan Mann and Yu-Yin Cheng (eds.), *Under Confucian Eyes: Writings on Gender in Chinese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¹⁶ （美）高彦颐著；李志生译，《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们与男性社会体系的互动关系。值得一提的是，高彦颐在行文中有意批判五四以来对传统文化批评的偏颇，强调应让妇女自己“发声”。以“缠足”问题为例，通过对女性书写的与“缠足”相关文学作品的考察，高彦颐提出明清妇女在看待“缠足”这个行为时，并没有将其视为对其自身身体的残害，抑或父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而是以欣赏的角度，从中获取视觉的美感与感官的快感。

“*Precious Records: Women in China's Long Eighteenth Century*”（中文译名：《兰闺宝录：晚明至盛清时的中国妇女》）¹⁷则是由西方汉学家曼素恩所著的另一本关于盛清女性研究的宏观著作。书名中提到的十八世纪，即指史学界一般所称之为“盛清”时期（1683-1839）¹⁸，作者认为，如果以性别问题作为研究的焦点，学者不能笼统的将晚明与满清视为一个连贯的发展周期。作者强调，“满族的入主中国标志出一个文化上的裂痕，这种裂痕随着清王朝霸权之确立而改变了性别关系，从这个观点来看，清代性别关系的历史标示出一个与晚明时期截然划分的情况”，¹⁹而“盛清时期是中国妇女史上一个独特的时代。”²⁰

曼素恩在本书的第四章提出了两种才女的文化典型。随着清朝朴学的兴起，文人在对经典的阅读和考据过程中，发掘出两种理想的才女典范形象。以章学诚的《妇学》为例，他视汉代班昭（约 45-117）为才女形象的正统，章氏认为女性的“文”才应服务于传播家学与道德训导，女性“文”与“才”的发声与作用虽应只限于闺阁中，却能进而维系“夫”与“子”所活动之外在社会的稳定。另一种女性典范则是由东晋谢道韞（约 376 年前后在世）所代表的“咏絮之才”之才女形象，作者认为，此种现象背后的文化心态则是出于男性文人对于萌发于幼女纯真心灵、未经雕饰才情的欣赏，其中以袁枚和及其一众随园女弟子为代表。

另一方面，若将本书与高彦颐的著作互为参照，我们不难发现，性别关系在明末清初与盛清时期确实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面貌。以青楼文化为例，晚明的青楼是文化的象征，名妓与士大夫、甚至闺秀的文学交流是当时社会的一种文化

¹⁷ 曼素恩著，杨雅婷译，《兰闺宝录：晚明至盛情时的中国妇女》（台北：左岸文化，2005）。

¹⁸ 曼素恩著，杨雅婷译，《兰闺宝录：晚明至盛情时的中国妇女》，页 6。

¹⁹ 曼素恩著，杨雅婷译，《兰闺宝录：晚明至盛情时的中国妇女》，页 48。

²⁰ 曼素恩著，杨雅婷译，《兰闺宝录：晚明至盛情时的中国妇女》，页 48。

标识，并且在女性文学的发展和传播中占据着中心地位。反观盛清，青楼名妓的地位骤然下降，闺秀同样具备以文学取悦男性的才能，从而取代了青楼本来的“文学功用”。而闺秀更与青楼划分出一条泾渭分明的分界线，并强调自己的道德地位。例如清代完颜恂珠（1771-1833）所编纂之《国朝闺秀正始集》，完颜氏秉持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观，并在序言中申明不录“青楼失行妇人”之诗作，选诗则以作者“性情贞淑”与作品“音律和谐”为标准，意在建立以“妇德”为中心的女性典范。

Xiaorong Li 于 2006 年发表的博士论文（“*Rewriting the Inner Chambers: The Boudoir in Ming-Qing Women's Poetry*”）²¹ 其中一章对《国朝闺秀正始集》的相关讨论又有一定的补充。作者指出，《国朝闺秀正始集》所收录的某些诗词在诗歌情境的构筑以及内容及情感的表达上仍不脱传统“闺怨”及“思妇”诗的设定。然而完颜氏之所以将其纳入诗集，则是因为女诗人将闺阁陈设赋予除了暗示情欲以外的作用，抑或在诗作中融入女性日常家庭生活经验的描写，从而赋予闺阁符合儒家雅正诗教观的审美意义，也使诗人情感抒发合理化。作者认为，诗集的选编本来即是编者某种诗学观的体现，而以《国朝闺秀正始集》为例，虽然其收录的作品内容仍不脱“闺怨”及“思妇”的传统，但编者却刻意选取符合其诗教观的作品，从而树立某种女性书写的道德典范。

（三）女性交游群体与才德之辩

根据两位西方汉学研究者著作中的相关讨论，我们不难发现，明清女性的交游与结社活动以及明清以来关于妇女的“才”/“德”之辩乃是明清女性文学研究者所关注的两个重要子题。

以女性交游及结社活动为研究子题，比较受学者关注的是以若干男性文人为中心及其女弟子所组成的诗词唱和群体：例如任兆麟与吴中十子、袁枚及其随园女弟子以及陈文述与碧城仙馆女诗人等。其中，较具代表性的著作有以下若干：高彦颐所著之（“*A Man Teaching Ten Women: A Case in the Making of Gender*”

²¹ Li, Xiaorong, *Rewriting the Inner Chambers: The Boudoir in Ming-Qing Women's Poetry*, Ph. D. Dissertation, McGill University, Canada, 2006.

Relation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²²; J. D. Schmidt, (“Yuan Mei (1716-98) on Women”)²³; 钟慧玲, <陈文述与碧城仙馆女弟子的文学活动>²⁴; 以及王英志所著之一系列以袁枚及其随园女弟子为研究重点的著作, 包括《袁枚和随园诗话》²⁵、《性灵派研究》²⁶、《袁枚评传》²⁷等。这些著作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的文学活动脉络, 以及男性文人在女性文学传播及发展过程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明清女性参与文学活动, 盛况空前, 这也引起清代不少著名学者就女性“德”与“才”的问题进行辩论, 这也是当代学者研究明清女性文学所关注的议题之一。刘咏聪《德才色权——论中国古代女性》²⁸一书曾就“才德观”作出相关讨论。孙康宜则在其 (“Ming-Qing Women Poets and the Notions of 'Talent' and 'Morality'”)²⁹ 一文中指出, 才德观的辩论历时已久, 且无论男女皆有参与, 她更提醒我们应打破成见, 不可将男性置于必然的权威与打击位置, 而将女性置于必然的劣势与抗争位置, 实质上很多女性本身也曾积极参与捍卫女德与女教的历史过程中。清代章学诚 (1738-1801) 与袁枚关于“妇学”的一段争论也极具代表性, 章氏曾著有《妇学》一文, 公开抨击广收随园女弟子之袁枚为“无耻佞人”, 章氏认为自唐以来, 博学女性已失去了属于女性自己的学术传承, 其对女四书一类的女教著作嗤之以鼻, 认为它们内容贫乏, 根本无法与古典传统中的妇学相提并论。章氏认为, 女性不应该公开参与男性文人的文学创作世界, 女性对与学问的掌握应运用在对于家学的传承中, 而以诗人的身份在公开场合发言则带有淫荡的意味。曼素

²² Ko, Doroty, “A Man Teaching Ten Women: A Case in the Making of Gender Relation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in 柳田先生古稀記念中国の伝統社会と家族 (东京: 汲古书院, 1993), pp.65-93.

²³ J. D. Schmidt, “Yuan Mei (1716-98) on Women,” *Late Imperial China*, 29 (2008), pp. 129-185.

²⁴ 钟慧玲, <陈文述与碧城仙馆女弟子的文学活动>, 《东海中文学报》2001年第13期, 页151-182。

²⁵ 王英志, 《袁枚和随园诗话》(台北: 万卷楼出版社, 1993)。

²⁶ 王英志, 《性灵派研究》(沈阳: 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8)。

²⁷ 王英志, 《袁枚评传》(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²⁸ 刘咏聪, 《德·才·色·权: 论中国古代女性》(台北: 麦田出版社, 1998)。

²⁹ Chang, Kang-i Sun, “Ming-Qing Women Poets and the Notions of 'Talent' and 'Morality,’” in Theodore Hutters, R. Bin Wong, and Pauline Yu (eds.), *Culture and State in Chinese History: Conventions, Accommodations, and Critique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1997), pp.236-258.

恩 (“Fuxue (Women's Learning) by Zhang Xuecheng (1738-1801): China's First History of Women's Culture”) ³⁰一文就针对章氏〈妇学〉一文的内容进行了细致的分析。而针对章学诚对袁枚的抨击，其门下女弟子骆绮兰（1775-1813）则在《听秋馆闺中同人集》的序中一一反驳，Robert Hamilton, (“The Pursuit of Fame: Luo Qilan (1775-1813) and the Debates about Women and Talent in Eighteenth-Century Jiangnan”) ³¹一文中即有相关讨论。

（四）女性文学“经典观”的建立及其反思

对于明清时期妇女作品编纂工作以及女性作品“经典化”建立的相关探讨，应首推该研究领域的开山鼻祖之一，孙康宜。其 (“Ming and Qing Anthologies of Women's Poetry and Their Selection Strategies”) ³²一文，分析了众多明清时期的妇女选集，其中包括对每本选集编者生平概述、成书年代考据，选集的编选策略、收录准则以及编撰体例等相关内容。孙康宜在该文中对个别选集的成就及研究价值也提出了精辟的看法，譬如清代刘云份（生卒年不详）所编之《翠楼集》有助于学者考察明代女诗人的地理分布情况³³，又如明末邓汉仪（1617-1689）所编之《天下名家诗观初集》亦有助于了解女性文人之间的交游网络等³⁴。本文也重点分析了明清之际几本重要的妇女选集：柳如是与钱谦益（1582-1664）合编之《列朝诗集》、王端淑（1621-1685）《名媛诗纬》、钟惺（1574-1624）《名媛诗归》等。孙康宜指出，柳如是在《列朝诗集》之闰集中大量收入名妓的诗作且特别钟情于

³⁰ Mann, Susan, “Fuxue (Women's Learning) by Zhang Xuecheng (1738-1801): China's First History of Women's Culture,” *Late Imperial China*, 13(1992), pp.40-62.

³¹ Hamilton, Robert, “The Pursuit of Fame: Luo Qilan (1775-1813?) and the Debates about Women and Talent in Eighteenth-Century Jiangnan,” *Late Imperial China*, 18(1997), pp.39-71.

³² Kang-i Sun Chang, “Ming and Qing Anthologies of Women's Poetry and their selection strategies”, in Ellen Widmer, Kang-i Sun Chang (eds.), *Writing Wome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147-170.

³³ Kang-i Sun Chang, “Ming and Qing Anthologies of Women's Poetry and their selection strategies”, 页 160.

³⁴ Kang-i Sun Chang, “Ming and Qing Anthologies of Women's Poetry and their selection strategies”, 页 159.

描写风月之情诗。³⁵王端淑在《名媛诗纬》的最后一卷中收录了个人诗作六十三首，孙康宜认为王端淑此举乃是利用一种“logrolling”的策略，是企图将自己与其他女性作品共同纳入“经典化”的一种手段。³⁶而钟惺在《名媛诗归》的序言中特别标举女性作品“清”的特质，这是为了匡正当时男性文人创作尚“巧”的文学风气。³⁷更为重要的是，本文开宗明义地提出无论是男性文人抑或女性文人，其编选妇女选集之举动本身，即带有“经典化”女性作品的企图。孙康宜更在行文中指出了某些具体“典律化”女性作品的手段：例如在选集的序言中将编选女性作品与《诗经》的编选并举；又如利用合刻的方式，凸显个别女性文人的作品，为时人提供典范。孙康宜亦指出，男性文人与女性文人在编纂女性作品选集时考虑的侧重也有所差异，相对于男性文人，女性文人更为关注女作家之“德”。孙康宜关于女性文学经典化的相关探讨，为日后明清女性文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便于切入的研究视角。

延续孙康宜对“经典化”女性作品的讨论，方秀洁（Grace S. Fong）则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在（“Gender and the Failure of Canonization-Anthologizing Women’s Poetry in the Late Ming”）³⁸一文中，方氏以晚明的八本女性诗集的编纂情况为例，对“典律化”女性作品这一诠释提出反思。该文将晚明的妇女选集编纂及出版分为两个高潮，即分别以“复古运动”为文坛代表思潮的十六世纪后半期及“反复古运动”为文坛代表思潮的十七世纪前三十年，并分别以该两段时期内出版的四本女性诗集为例，分析了男性文人在编撰妇女选集时的策略与考量。以十六世纪后半期的女性选集为例，方氏指出，该时段的女性选集收录按照时间排序，而不以文类分类，从收录的时间跨度来看，则从上古至明代当时。诗集中出现的女性作家及作品多有重复，有些甚至是传说中的神话人物（如西王母），而由于明以前

³⁵ Kang-i Sun Chang, “Ming and Qing Anthologies of Women’s Poetry and their selection strategies”, 页 154。

³⁶ Kang-i Sun Chang, “Ming and Qing Anthologies of Women’s Poetry and their selection strategies”, 页 159。

³⁷ Kang-i Sun Chang, “Ming and Qing Anthologies of Women’s Poetry and their selection strategies”, 页 152。

³⁸ Grace S.Fong, “Gender and the Failure of Canonization-Anthologizing Women’s Poetry in the Late Ming”,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26 (2004), pp.129-139.

作品占据了选本的大量篇幅，明代女性诗人的作品反而不受重视。另一方面，选集中出现的女性有些往往只以姓氏代称，有些甚至名氏湮没，仅存作品，方氏认为，即使这些女性及其作品在众多选集里重复出现，也无法使她们的作品“典律化”³⁹。而以十七世纪前三十年间出版的女性选集为例，伴随着公安派与竟陵派“反复古运动”文学思潮的兴起，编者更强调女性诗作的“个性”。另一方面，选集也更为重视明代当时女性作品，收录的篇幅较之前有所扩充。方氏认为，总体来说，诚如四库馆臣对明人的批评一般，明人喜好编撰女性诗集，但是他们常互相借鉴，编撰体例大多相似，连谬误也如出一辙。而考察晚明女性选集的出版的情况，并无法显示当时男性文人企图建立“经典”的尝试，编撰女性诗选背后的动机是多元的、复杂的：它们或出于商业利润的考量、或仅仅以“存余”作为收录动机、或为了彰显作者个人的名声、抑或为了颂扬中华文化对边缘地区的教化之功（例如某些诗选尝试收录朝鲜女诗人的作品）。更甚，编者强调诗集的道德教化功能，对女性作品的文学价值往往过于理想化，而缺乏对于个别作品的品评、不同女性诗人之间诗风差异的辩证。

分别回应孙康宜与方秀洁的观点，Xu, SuFeng, (“The Rhetoric of Legitimation: Prefaces to Women’s Poetry Collection from the Song to the Ming”)⁴⁰一文对女性作品“经典化”的讨论有相关的补充。Xu 认为，孙康宜在其文中所指出的，男性文人以“《诗经》收入女性诗作”而为女性诗歌创作及出版的正统性辩证、而试图“经典化”女性文学创作的传统，并不源自晚明赵世杰（生卒年不详）《古今女史》所书之序。作者考察了北宋至元朝尚存的男性文人为女性诗集所撰写的序，提出了这种传统其实可以最早追溯到北宋文人欧阳修（1007-1073）为女性诗人谢希孟《采萍诗》所撰写的序，而这种论调也被此后的理学家们不断地在为女性诗人撰写的序言中重复引用或模仿，一直延续到元朝甚至是明代早期。Xu 认为，在明代以前，为女性诗集书写序言的文人大多为当时名声赫赫的士大夫或理学家，他们

³⁹ Grase S.Fong, “Gender and the Failure of Canonization-Anthologizing Women’s Poetry in the Late Ming”, 页 135。

⁴⁰ Xu, SuFeng, “The Rhetoric of Legitimation: Prefaces to Women’s Poetry Collection from the Song to the Ming”, *Nan Nü Men, Women and Gender in Early and Imperial China*, 8(2006), pp. 255-289.

作序一般源自女性亲友的要求；而到了晚明之后，为女性诗集作序的文人则较多为自称“山人”或“布衣”的“边缘文人”。为女性诗集作序，乃这些“风流文人”为了表现个人边缘化、独特的风雅文人之生活品味、与官场刻意保持疏离的姿态，以及在士大夫官僚系统外赢得一己声誉的手段。⁴¹另一方面，Xu 也指出，针对晚明至清初大量出现女性诗集和选本中收入青楼名妓的文学创作这一现象，编者和选家们也在序中提出了自我辩护以解释此举的合理性，即在“诗三百收入女性诗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诗经》同样收入郑卫之声之类的淫词”，这一强调“桑间濮上”同样具有道德教化意义的辩证。诚然，Xu 的论述对前期学者的研究成果有校正和补充的意义，但其所谓“风流文人”为巩固其“unofficial power”而为女性诗集作序，而非“经典化”女性文学之相关论证仍有待进一步考究。文中仅举出明代杨维桢（1296-1370）一人作为“风流文人”的代表，论证似乎稍显不足。且孙康宜与方秀洁虽然观点各异，但其二人考察的对象乃是编选女性文集的男性文人，若然针对明清男性文人是否有“经典化”女性作品的企图进行讨论，其本质区别于 Xu 文中提出的仅仅为女性诗集作序的男性文人。

除了以上三篇论述之外，在针对某些明清女性选集的相关研究与探讨中，我们也可以间中看见学者对于“经典化”理论的思考。《清初女性词选集研究》乃台湾学者陈建男于 2005 年发表的硕士学位论文⁴²。本文主要首先概括性地探讨了清初词坛与女性文学的发展情况，分收入女性词作与未收入女性词作两类，大略介绍了康熙朝七本词选的编选情况。作者随后以《名媛诗纬初编》、《林下词选》、《众香词》以及《古今名媛百花诗余》为案例，探讨了此四本专收女性词作选本的具体体例、内容与编撰标准。作者最后将此四本词选中的女性词作归纳整理，使用“定量”分析的方式以探查该女性的作品是否成为“典律”。陈建男在本文中所指的“典律”不单指作品，更多时候则是指作家。作者采用的分析方式乃是“定量”分析法，即以计算某诗人的词作在某词选中被收入的数量，以界定该作者是否被视为“典律”。根据作者的研究，男性文人所编辑的词选⁴³，以宋朝李清照、

⁴¹ Sufeng, Xu, “The Rhetoric of Legitimation: Prefaces to Women’s Poetry Collection from the Song to the Ming”, 页 271。

⁴² 陈建男,《清初女性词选集研究》,台北:国立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硕士论文,2006。

⁴³ 此处的词选,不指光收入女性作品的词选,而是指普遍意义的词选。

明末叶小鸾、当朝徐灿的作品收入数量为最，使三人及其作品成为创作及评论的典律。而反观女性文人编辑的词选，或男性文人所编辑之专收女性作品的词选，观察其所选各女性词人作品数量，则未有呈现典律化的倾向。作者认为，女性词选保存文献的意图大于树立词学审美标杆的功能，所以并未在选集中呈现出某种“审美霸权”。

以上回顾之文献，多以明清男性文人编纂之女性选集为讨论焦点，而就女性文人编纂的女性选集则较少触及。魏爱莲（Ellen Widmer）的相关著作则补充了该方面的研究空白，其（“Retrieving the Past: Women Editors and Women's poetry, 1636-1941”）⁴⁴一文，集中探讨了晚明至民国时期的六本由女性编纂的诗集和诗话。除了介绍编者生平、编撰策略及体例外，魏氏更详细考证了每本诗集与诗话的资料来源与收集方法，并以此作为评估该诗集编选质量的标准之一。魏氏将女性文人编纂诗集和诗话的目的大致分为二类：（1）“存余”——即对女性作品的保留意义（2）“诗教”——对女性“德”与“才”问题的辩论。该文更指出了女性编者与男性编者在编撰策略上的某些差异：女性更为关注某些“口述历史”，即对口耳相传诗句的保存和记录；又如女性收集资料的来源较男性更为广泛，譬如某些刺绣上的作品也成为了女性诗集资料的来源。

另外，连文萍于1996年在《汉学研究》上发表的〈诗史可有女性的位置？——以两部明代诗话为论述中心〉⁴⁵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本文以江盈科（1553-1605）《闺秀诗评》及方维仪（1585-1668）《宫闱诗评》两部诗话为探讨中心，指出了该两部诗话在诗史上的位置：《闺秀诗评》乃是首次以女性诗作作为全书的评论对象，《宫闱诗评》则是首次由女性担任评述者。文中细致地分析了《闺秀诗评》的体例及文学批评标准，且提出了现已散逸的《宫闱诗评》乃《宫闱诗史》评语辑录之本的观点，并通过对《宫闱诗评》相关的记载的考察，指出其所谓“正”与“邪”两集之分，并非针对诗歌的内容，而是针对诗人社会地位所言。但是，

⁴⁴ Widmer, Ellen, “Retrieving the Past: Women Editors and Women’s Poetry, 1636-1941”, in Grace S. Fong and Ellen Widmer (eds.), *The inner Quarters and Beyond: Women Writers from Ming through Qing* (Leiden; Boston : Brill, 2010.), pp. 81-105.

⁴⁵ 连文萍, 〈诗史可有女性的位置? ——以两部明代诗话为论述中心〉, 《汉学研究》1996年第17卷第1期, 页177-200。

此两部诗话的篇幅都非常短小，况《宫闱诗评》现已散佚，探讨与研究的空间也相对狭隘；且此两部诗话虽具有“初创”的意义，但在女性文集与诗话中并不具有代表意义，似乎不足够回答作者所提出的“诗史可有女性的位置”之相对宏大的设问。

（五）清代闺秀诗话的相关研究成果

在2004年发表的〈闺秀诗话十二种叙录〉⁴⁶一文中，学者蒋寅对清代至民国共十二种闺秀诗话，包括对编者、编纂体例、版本及馆藏的进行了相关介绍。该文也针对个别诗话，提出其价值间指摘其谬误：例如清代孙兆淮（生卒年不详）所撰之《闺秀录》一卷，蒋氏即指出其书“所载作者多不见于施淑仪《清代闺阁诗人徵略》，所录诗作多出自未刊稿本，书名亦不见于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诚可补二家书之阙。”⁴⁷蒋寅该文并未有任何理论上的发挥，基本仍属于简介性质，但仍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然而学界针对个别闺秀诗话的专论目前仍旧较为缺乏，其中清代才媛沈善宝（1808-1862）及其所编撰的《名媛诗话》获得了大部分学者的关注。

针对沈善宝生平及其《名媛诗话》一书，王力坚先后发表了〈钱塘才媛沈善宝的随宦行迹与文学交游〉、〈钱塘才媛沈善宝与山东寿光安邱李氏之情缘〉、〈《名媛诗话》的自我指涉及其内文本建构〉、〈清代才媛的山水意识——以《名媛诗话》为考察中心〉、〈清代才媛沈善宝的家庭性别角色〉、〈从《名媛诗话》看家庭对清代才媛的影响〉、〈《名媛诗话》与经世实学〉、〈沈善宝的随宦行迹与文学交游〉、〈二元对立？——沈善宝与男性文人之关系〉以及〈《名媛诗话》的性灵诗学思想〉等论文，而其随后又出版了《清代才媛沈善宝研究》⁴⁸一书，是一部整合了其系列论文的专著。该书从不同的观察视角出发，针对沈善宝一生的形迹及文学交游情况、在家庭生活中所扮演的性别角色、与其他女性文人及男性文人结交的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和研究。另外，该书也探讨了《名媛诗

⁴⁶ 蒋寅，〈闺秀诗话十二种叙录〉，页253-261。

⁴⁷ 蒋寅，〈闺秀诗话十二种叙录〉，页256。

⁴⁸ 王立坚，《清代才媛沈善宝研究》（台北：里仁书局，2010）。

话》中呈现的自我涉指现象以及以《名媛诗话》为中心分析考察了清代才媛的山水意识。该书既有对沈善宝个人生平情况的研究，也有针对《名媛诗话》的创作心态、诗学观念的探讨，更将沈善宝及其创作置于其所处的宏大历史背景，看清代的社会文化对沈善宝的影响及该时代女性文人所共用的创作意识。

而其他直接针对沈善宝《名媛诗话》研究的论文有钟慧玲的〈阅读女性·女性阅读——沈善宝《名媛诗话》的女性建构〉⁴⁹一文，作者援用了“女性阅读”的概念，探讨《名媛诗话》之女性建构，探讨其所呈现之女性共同的处境与命运、别具襟怀器识的女性图谱，以及遵守妇德阐扬女教的女宗典范。钟慧玲认为沈善宝全面肯定女作家的作品，并在《名媛诗话》中建构了才、识、德三者皆备的理想女性。另外，关于《名媛诗话》中呈现的自我涉指以及家族女性成员集体创作的现象，方秀洁（“Writing Self and Writing Lives: Shen Shanbao's (1808-1862) Gendered Auto/Biographical Practices”）⁵⁰一文对其进行了相关的讨论，作者探讨了女性诗人如何超越诗话的评论性质，为其自身和其他女性作传，以《名媛诗话》为例，它其中散杂了沈善宝对其自身及其女性亲属身世回忆的记录，用支言片语间接构筑了其自身及其他女性诗人的传记，在某种程度上将该诗话当作再现其自身（及其家系女性成员）历史与文学创作的文本空间。詹颂〈道咸时期京师满汉女性的文学交游与创作——以沈善宝〈名媛诗话〉为主要考察线索〉⁵¹一文则以《名媛诗话》为主要考察对象，以该书的记载为主要线索，考察其时满汉女性文学交游群体的成员情况，研究这种文学交游的文化与心理基础及活动形式。

除此之外，温珮琪于2010年所发表的硕士论文，《家族、地域与女性选集——梁章钜〈闽川闺秀诗话〉研究》⁵²则以“地域性”与“家族性”为论述重心，

⁴⁹ 钟慧玲，〈阅读女性·女性阅读——沈善宝〈名媛诗话〉中的女性建构〉，《东海中文学报》2007年第19期，页217-252。

⁵⁰ Fong, Grace S, "Writing Self and Writing Lives: Shen Shanbao's(1808-1862) Gendered Auto/Biographical Practices", *Nan Nü: Men, Women and Gender in Early and Imperial China*, 2.2(2000), pp.259-303.

⁵¹ 詹颂，〈道咸时期京师满汉女性的文学交游与创作——以沈善宝〈名媛诗话〉为主要考察线索〉，《民族文学文学研究》2009年第4期，页123-128。

⁵² 温珮琪，《家族、地域与女性选集——梁章钜〈闽川闺秀诗话〉研究》，南投：国立暨南国际大学中国语文学系硕士论文：2010。

分析了编撰者梁章钜（1775-1849）如何通过《闽川闺秀诗话》，建构了闽川地区女性及家族女性的才学风貌。

（六）身处近现代转折期的王蕴章及其杂志编辑事业

笔者论文的主要研究对象为王蕴章所著之《燃脂余韵》，而王氏创作该本闺秀诗话的时间正处于清末民初，这一中国文学转型时期，另一方面，其也在该时期先后分别担任商务印书馆出版之《小说月报》与《妇女杂志》的杂志主编。笔者认为，王蕴章的杂志编辑事业或许可以为研究提供一个侧面切入点，尤其是《妇女杂志》一刊，更可以与《燃脂余韵》一书的撰写被共同视为王蕴章“女性文学”的观念与实践。

王蕴章曾加入南社，南社是晚清民初的重要文人社团之一，它是在一个在提倡民族气节、鼓吹反清革命以及研究文学的旗帜下聚拢的文学团体。南社延续时间之长、影响地域之广泛都是当时任何一个文学社团无法相提并论的。除了王蕴章之外，南社的许多成员也是中国近代史上思想、文化、教育及出版等各方面的精英。孙之梅《南社研究》⁵³一书详细考察了南社崛起之过程、成员的地理分布、创始人之一柳亚子的生平，并从近代报刊业、与国粹派的关系等方面着笔，探讨了南社在近代社会的影响力。栾梅建《民间的文人雅集——南社研究》⁵⁴则将南社分为酝酿期、勃兴期、发展期及凋零期四个时段，着重探讨南社社员之间的交往、联络及互动情况，清晰地梳理了南社发展的脉络。杨天石及王学庄主编之《南社史长编》⁵⁵是一部综合性的材料汇编，并以年代为顺序，将1902-1949年间南社社员发表于杂志报纸中的作品汇集整理，为研究南社的学者提供了查阅资料的便利。郑逸梅所著之《南社丛谈》⁵⁶中有“南社成员事略”一章，其中对王蕴章的生平及逸事亦有简略的介绍。

以女性研究作为一面窗户，以审视清末民初这一时代革鼎之际社会场景，亦

⁵³ 孙之梅，《南社研究》（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⁵⁴ 栾梅建，《民间文人的雅集——南社研究》（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6）。

⁵⁵ 杨天石、王学庄主编，《南社史长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

⁵⁶ 郑逸梅，《南社丛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是笔者需要关注之课题之一。夏晓虹《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⁵⁷一书即以女性问题作为切入点，结合大量的典型个案分析，关注了晚清社会女性的教育与婚姻等问题。其中对笔者研究较有启示的是书中第三章关于历史记忆重构的相关论述，作者考证了晚清广泛流传之“十不从”说法的由来，并以其中“男降女不降”一条为例，论述了晚清革命派文人是如何利用对明季殉烈女性事迹的褒奖与书写激发民族精神，从而鼓动男性反满革命的热情。本书更征引了许多晚清权威报刊上所刊载的文章作为论据，鉴于笔者并未曾对晚清报刊史有详细的研究，作者书中所列举的史料尤其开阔了笔者收集资料的眼界与范围。在《清末民初的晚明想象》⁵⁸一书中，作者秦春燕从思想史、历史、文学等各方面阐述清末民初的遗民对晚明的追忆及想象。她指出，晚明历史成为了清末民初社会的写照，而对晚明记忆的重建在当时的国家建构过程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书中第四章曾论及清末民初文人对于晚明“名妓”、“侠女”、“节烈妇女”这三种身份女性故事的发掘、重写与叙说，女性身上的侠义与节烈在晚清得到大力的渲染与表彰，女子处理死亡的刚烈态度成为了软弱男子的反衬，女性之死被赋予了沉重的纲常寓意，而非简单的节烈要求。

针对《妇女杂志》的相关研究，2000年东京大学曾成立《妇女杂志》研究会，并于2005年出版《〈妇女杂志〉所呈现的中国近代妇女》论文集。《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也于2004年12月第12期出版《妇女杂志》研究专刊。但是纵观学者的研究成果，其内容多集中于对《妇女杂志》所塑造女性形象的研究抑或不同时期⁵⁹妇女杂志所呈现女性生活面貌的讨论。而针对1915-1920年，王蕴章主编时期《妇女杂志》的讨论，则多集中在其试图塑造之“贤妻良母”之形象⁶⁰，而针对《妇

⁵⁷ 秦春燕，《清末民初的晚明想象》（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⁵⁸ 夏晓虹，《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⁵⁹ 详见 Jacqueline Nivard, “Women and Women’s press: The case of Ladies’ Journal (Funu Zazhi), 1915-1931”, *Republican China*, 10 (1984), pp.185-236。本文是第一篇关于《妇女杂志》研究的著作，Nivard 在论文中将《妇女杂志》分为四个阶段，王蕴章主编时期（1915年1月至1920年12月）被划为该刊的“草创期”，之后的研究者也都沿用 Nivard 的时间分段。

⁶⁰ 详见周叙琪，《1910-1920年代都会新妇女生活风貌：以〈妇女杂志〉为分析实例》，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硕士论文，1996；及 Wang, Zheng, *Women in 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 Oral and Textual Histori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Chapter 2.

女杂志》的女性文学观念或王蕴章本身编辑事业的讨论则较少触及。

胡晓真曾于《〈妇女杂志〉所呈现的中国近代妇女》论文集中发表〈文苑·多罗·华鬢——王蕴章主编时期（1915-1920）の《妇女杂志》における「女性文学」という观念とその実践〉一文⁶¹，通过分析王蕴章主编时期《妇女杂志》中与女性文学相关内容的刊载，讨论了王氏“女性文学观念”的实践。《燃脂余韵》也曾先后连载于《小说月报》与《妇女杂志》中，胡晓真在本文中也有相关的探讨。王氏曾在《妇女杂志》设“多罗艳屑”、“杂俎”等专栏，登载收录女性与文艺的典故之著作，胡晓真认为，所谓“多罗艳屑”，即“残脂余粉”之意，王氏将这些有关女性典故的编辑工作散置于“余兴”、“杂俎”、“补白”等栏目中，正象征了女性文学与文艺的边缘位置。胡晓真更将当时曾在《妇女杂志》上发文的女性文人施淑仪所编撰的《清代闺阁诗人征略》，与王氏所编《燃脂余韵》对比，认为施淑仪编撰女性诗话乃是倾注其毕生经历为女性书写形史，而男性文人诸如王蕴章的编撰动机只不过出于某种“怀旧情怀”⁶²，《燃脂余韵》“随意拈来，信手成篇，难免男性文人的猎奇述旧心态”。⁶³

《新理想、旧体例与不可思议之社会——清末民初上海“传统派”文人与闺秀作家的转型现象》是胡晓真于2010年出版的新作。本书的主要关怀是被后来的文学史视为传统文化残余物的旧派文体与文人（包括闺秀作家），如何对应上海文坛新兴的出版文化，如何重新塑造传统的美感价值，以及如何表象现代城市的生活经验。本书第四章除了收录胡晓真于《〈妇女杂志〉所呈现的中国近代妇女》已发表的文章之外，第五章更继而就王蕴章编辑事业，进行了相关研究及探讨。

胡晓真首先以王氏《十年说梦图》为其自身心境写照，分析了其在杂志编务上遭遇的压力以及挫败，认为旧派文人试图保留传统文体的努力已无法适应当时的文化潮流。另一方面，胡晓真也具体分析了王氏主编前期《小说月报》的知识

⁶¹ 胡晓真，〈文苑·多罗·华鬢——王蕴章主编时期（1915-1920）の《妇女杂志》における「女性文学」という观念とその実践〉，《〈婦女雜誌〉からみる近代中国女性》（东京：研文出版社，2005）。

⁶² 胡晓真，《新理想、旧体例与不可思议之社会——清末民初上海“传统派”文人与闺秀作家的转型现象》（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10），页189。

⁶³ 胡晓真，《新理想、旧体例与不可思议之社会——清末民初上海“传统派”文人与闺秀作家的转型现象》，页192。

系统构成，认为其内容寄托了编者通俗教育的理想，乃是“知识小道化”⁶⁴的具体表现。最后，作者提出“微物崇拜”这一概念以解释当时以王氏为代表的传统文人在世纪之交时所呈现的文化心态。作者指出，如《燃脂余韵》一般，杂志上所刊载许多文集多以笔记小说为体例，而书名则充斥着“残”、“余”、“零”、“碎”等字眼。作者认为，这种对收集芜杂琐碎事物，以残零纤碎为美感的信仰，乃是民初传统文人在无力构建宏大理想的挫败中而转向对微物崇拜的执着。

除了上述胡晓真的相关论述之外，张晖《新时代与旧文学——以民初〈小说月报〉刊登的诗词为中心》⁶⁵以及于佩灵《辛亥革命前后〈小说月报〉对遗民气节的认同》⁶⁶这两篇论文对笔者的研究亦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张晖的论著考察了《小说月报》1921年改版之前发表旧体诗词的情况，该段时期由王蕴章担任杂志主编，并坚持在每期《小说月报》中发表数十首诗词。作者指出，这些在《小说月报》上刊登的诗词，都笼罩在一股家国之悲的情绪中，杂志中充斥着咏史、凭吊之类的诗词，诗人们凭诗词寄托对国家未来前景的担忧，并抒发对过去岁月的怀念之情。特别以刊登在杂志中，吟咏辛亥为主题的诗词为例，虽然诗人的阵营并不相同，但诗作中都透露了诗人对于辛亥革命不够彻底的反思。于佩灵一文则通过对刊登在《小说月报》中王蕴章戏曲作品《碧血花传奇》的考证，指出王氏对于原作情节的改写与扩充表现了他对遗民气节的认同。于佩灵认为，杂志的创刊号多少能反映刊物的大致走向，而王蕴章在《小说月报》的创刊栏中选录了明遗民及忠臣烈士的诗作，即为了借杂志这个传播空间鼓励当时的有志青年呼应诗中所传达的反满情绪。除此之外，《小说月报》上也刊登了许多南社社员彼此唱和的作品，这些作品都表达了诗人对于“义”及“烈”精神的认同。于佩灵更总结道，虽然《小说月报》一份并不是革命倾向浓厚的激进刊物，但是辛亥革命前后的王蕴章怀抱着家国大业的抱负，其政治立场确实倾向于反满与革命，他利用《小说月报》

⁶⁴ 胡晓真，《新理想、旧体例与不可思议之社会——清末民初上海“传统派”文人与闺秀作家的转型现象》，页232。

⁶⁵ 张晖，〈新时代与旧文学——以民初〈小说月报〉刊登的诗词为中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4期，页42-56。

⁶⁶ 于佩灵，〈辛亥革命前后〈小说月报〉对“遗民气节”的想象与认同〉，《明清诗文研究》2011年第1期，页307-325。

的杂志主编之便，为当时的有志之士提供了阐扬义烈的空间。

三、研究意义与问题意识

通过上文对学者历来研究的回顾，不难发现，有关明清女性文学的研究虽然已经具有了一定的规模和成果，但是关于清代闺秀诗话的研究尚不够具体和深入，除了综述性与整体性的简介，针对个别闺秀诗话的研究仍然十分缺乏。蒋寅将王蕴章《燃脂余韵》推崇为清代闺秀诗话的“集大成者”，自然肯定了该书在资料收集和考据上的成就。何以该书未曾纳入研究者的关怀视野，实在非常遗憾。

一方面，学者关于王蕴章其人的研究，多集中在对其小说作品以及编辑事业的相关讨论上。诚然，王蕴章本人“鸳鸯蝴蝶派”的作家身份、《小说月报》与《妇女杂志》的主编身份确实引人关注，但是笔者认为，身处一个朝代鼎革、新旧交替的时代，《燃脂余韵》一书的创作在一定程度上则更为符合王蕴章鼓励女性文学创作、作为典型旧派文人代表的形象。且就女性文学，尤其是旧体文学创作这一议题出发，王蕴章本身的小说作品以及词章创作，包括《小说月报》及《妇女杂志》上刊载的相关闺秀旧体文学作品，尚有更多值得学者挖掘与探讨的空间。于是，笔者本文将以王蕴章的《燃脂余韵》作为核心研究文本，并结合对《小说月报》及《妇女杂志》中相关刊载文献的文本细读，希望在一定程度上填补目前学界关于清代闺秀诗话以及王蕴章本人研究成果方面的某些空白。

另一方面，学者胡晓真认为王蕴章《燃脂余韵》一书的编撰，是出于旧派文人“述旧猎奇”的好奇心态，该书的创作“信笔拈来”，缺乏系统及严谨的体例及组织。事实是否如此？笔者也希望在下文通过对《燃脂余韵》内容与结构的解构，以及对王蕴章本人文学思想与政治立场的研究过程中，尝试对以上批评作出回应。

四、研究文本及研究框架

《燃脂余韵》最早的单行本在民国七年（1918）由商务印书馆印刷刊行。由杜松柏主编，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7年发行的《清诗话访佚初编》收录有《燃脂余韵》影印商务本；由张寅彭主编，上海书店2002年发行的《民国诗话丛编》亦收录《燃脂余韵》民国九年（1920）本。笔者在本文中采用的文本则是由王英志

主编，2010年南京凤凰出版社发行的《清代闺秀诗话丛刊》中所收录的《燃脂余韵》。一方面，这套丛书是清代闺秀诗话的总集；另一方面，丛刊中所收录的《燃脂余韵》为点校上文所述诸版本所得，无论是在文字的精确性以及内容的完整性方面应该都较为权威。

除了对《燃脂余韵》的文本细读之外，笔者亦将参考由王蕴章担任主编时期（大致涵跨1910-1919年），《小说月报》及《妇女杂志》上所刊载文献的相关内容。一方面，《燃脂余韵》本来就是一部散载于《小说月报》以及《妇女杂志》上的栏目，且若将单行本与杂志上刊载的《燃脂余韵》比照，在内容与条目安排都存在一定的差异；另一方面，《燃脂余韵》毕竟是一部笔记体的诗话，虽然王蕴章时有在行文中加入自己的评论，但内容仍以记载本事及收录诗作为主。本文的主旨除了以《燃脂余韵》为主要研究文本之外，也试图从这本闺秀诗话中所收录的内容以及编者所采用的编撰策略上来窥探王蕴章本人的文学观念与思想。所以若仅仅将《燃脂余韵》作为单一的研究文本，则未免本末倒置，将诗话中所记载的闺秀其人其事以及文学作品置于研究的重心。王蕴章身为杂志的主编，在选择刊载于《小说月报》与《妇女杂志》上文章与作品的同时，必然加入了自己的创刊理念以及文学观念，笔者认为，若适当地选择杂志上相关的内容加以佐证及分析，应该可以更为全面地了解王蕴章本人的理念与思想。当然，笔者在本文中所采用的杂志内容，作者无论男女，仍主要围绕女性文学这一主题。

在章节安排上，本文将分为六个章节，结构如下：

第一章，序论。本章介绍了女性文学以及闺秀诗话在明清的大致发展状况，以及简介了编者王蕴章的生平及其创作经历。通过对历来学者相关研究的回顾，笔者尝试梳理了明清女性文学该领域的研究发展状况以及现有的研究成果。与此同时，笔者尝试发掘该领域存在的研究空白，尤其是对王蕴章其人及其文学创作方面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反思并提出疑问，并以此问题意识作为贯穿本文论述的主轴。

第二章，《燃脂余韵》所呈现的女性生活及形象。《燃脂余韵》中收录的闺秀事迹及文学作品内容非常丰富，若要面面俱到地加以分类和论述，或将如上文所述，偏离论文的主旨。但是，在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之前，对该本诗话的内容有

一定的直观认识及了解仍然十分必要。于是，笔者选择分别以“友伴式婚姻”以及“母教”为本章论述的两个主题，分析《燃脂余韵》所呈现的，以“贤妻”及“慈母”为典型的两类女性形象。

第三章，《燃脂余韵》的编撰过程及编撰策略。在上章对《燃脂余韵》的内容有一定直观了解的基础上，本章首先将尝试梳理《小说月报》及《妇女杂志》刊载《燃脂余韵》的过程，以叙述该书的成书经过。其次，通过对《燃脂余韵》凡例内容的分析，并结合笔者自己的阅读经验，笔者将尝试分析王蕴章编撰此书所采取的编撰策略。最后，笔者亦将通过阅读王蕴章在行文中对闺秀诗作的具体点评，分析他对女性文学的接受观念。

第四章，从《燃脂余韵》看王蕴章与时人的交游状况。《燃脂余韵》一书除了在保存清朝的闺秀作品方面具有非常珍贵的文献价值，值得研究者重视的另外一点则是该书对王蕴章时人事迹的记录及作品的收录。王蕴章本身的身份就非常特殊，除了身为一个作家及编辑，他更是当时沪上词社的社友及南社的社员。通过对时人或其女性家眷作品的记载和收录，《燃脂余韵》一书即忠实地反映了王蕴章与时人的交游状况。笔者在本章将选取《燃脂余韵》一书中所呈现的，王蕴章社交网络中的两类重要人群：即“春音词社”社友及其女性家眷、以及创办女学的女界精英，并结合他们在《小说月报》与《妇女杂志》中的相关刊载文章内容，分析王蕴章当时的社交状况。一方面，这些内容对相关人物的研究有一定的补充及参考价值；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以王蕴章为一个典型，分析一个旧文人如何自处于清末民初这个新旧冲击的时代。

第五章讨论节烈与死亡、气节与革命——王蕴章《燃脂余韵》广采节烈事迹背后之政治寓意。王蕴章在《燃脂余韵》的凡例中即注明本书将广采女性节烈事迹，当然，这种做法在清代闺秀诗集或诗话的编选中并不为特例。但是学者在有关此方面的研究过程中，不脱以明清时期女性的节烈意识为论述中心。向来，中国文学的传统即以“夫妇纲常”比喻“君臣之义”，身处这个朝代鼎革的动荡时期，笔者认为，王蕴章广录节烈事迹该举背后可能隐射了他本人的某些政治立场，尤其结合王蕴章本身作为革命激进文学团体南社社员的身份，这种推断则显得更为合理。在本章中，笔者将首先回顾清末民初之际，革命份子以节烈妇女的事迹煽

动反满革命情绪的相关言论，再结合对王蕴章本身的小说创作以及《妇女杂志》中所刊载的节烈妇女行传的考查，分析《燃脂余韵》广采节烈事迹背后所隐含的政治寓意。但是，《燃脂余韵》中对节烈妇女事迹的收录仅仅限于文字记载，单凭纯粹的文本分析，并不足以有力地说明笔者的论点。所以，笔者在本章将以《燃脂余韵》中相关的记载作为启发问题意识的导引，而主要仍以学者目前未曾使用的，王蕴章主编《妇女杂志》中的相关刊载及其小说创作作为分析的主要论证。

第六章，结论。笔者将在本章对前文的论述加以总结、提出研究的局限，并展望未来该领域可能发展的其他研究方向。

第二章 《燃脂余韵》所呈现的女性生活与形象

明清两代，许多闺秀诗人的诗作呈现出和丈夫之间在精神、学识及爱情层面的交流与互动。随着女性识字率提升，良好的家学修养使得闺秀能够在文学、哲学及历史等各方面与丈夫沟通及交流，伉俪间以文学创作互诉衷情、相互扶持，他们相敬友爱、尊重勉励，既为生活伴侣，又为文字之交。学者将这种两性关系称之为“友伴式婚姻⁶⁷”（companionate marriage），王蕴章的《燃脂余韵》中也收录了许多这种友爱婚姻夫妇的例子，他经常将伉俪间的闺房唱和比喻为东汉秦嘉、徐淑之间的诗词赠答⁶⁸或宋代管道昇（1262-1319）与丈夫赵孟頫（1254-1322）之间“你侬我侬”⁶⁹的浓情蜜意。在《燃脂余韵》中收录的女性诗作中，有许多例子为夫妻之间的唱和赠答诗作，或妻子写给宦游在外丈夫“寄外”诗一类的作品。闺阁唱和作品自然是夫妇间文化契合及精神共鸣的表现，而学者对于明清女性“寄外”作品的研究成果也指出，寄外诗除了表达思念之外，更多地是劝慰丈夫

⁶⁷ 社会学家与历史学家最早提出有关“companionate marriage”的概念，而学者对于这个词汇的诠释也不尽相同。社会学家最早以“companionate marriage”形容一种故意压制生育及维护平等主义的婚姻结合。其后又有社会学家采用以上定义，将不受传统婚姻在法律和道德上所附带的限制的平等男女关系称为 companionate marriage。史学家则把“companionate marriage”理解为夫妻间平等友爱、相互尊重，情感及性爱上互相满足的婚姻关系。见吕凯玲，〈李尚璋、钱韞素合集所见之夫妻情谊——清代友爱婚姻一例〉，《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50（2010），页1-2。关于“companionate marriage”中文译名，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说法：例如刘咏聪将其译为“友爱婚姻”，见刘咏聪，《德·才·色·权：论中国古代女性》（台北：麦田出版社，1998），页291。高彦颐《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一书中译本译为“伙伴式婚姻”，见（美）高彦颐著；李志生译，《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页191。曼素恩《兰闺宝录：晚明至盛清时的中国妇女》中译本称为“和谐配衬的婚姻”，见（美）曼素恩著；杨雅婷译，《兰闺宝录：晚明至盛清时的中国妇女》（台北县新店市：左岸文化：发行远足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5），页75。笔者在本文中采用高彦颐对“伙伴式婚姻”的定义，即“有知识的、琴瑟和谐的夫妇，他们相互间充满尊重与喜爱”，见（美）高彦颐著；李志生译，《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页191。

⁶⁸ “秦嘉，字士会，陇西人也。为郡上掾，其妻徐淑寝疾，还家，不获面别。赠诗云尔。”（东汉）秦嘉，《赠妇诗三首并序》，见（陈）徐陵编，（清）吴兆宜等注，《玉台新咏笺注》（北京：中华书局，1992），页30。

⁶⁹ “你侬我侬，特煞情多”，见（宋）管道昇，《我侬词》，收录于（清）徐鉉，《词苑丛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页244-45。

及表达自己对家庭责任的承诺，而且女性也不时在诗作中表达对于丈夫仕途及成就的自豪感。⁷⁰笔者本章即将通过对《燃脂余韵》所收录的这两种典型母题女性诗作的分析，探究“友伴式婚姻”在女性诗话中的呈现。

另一方面，围绕明清女性的“才德之辩”的议题，妇女在家学传承中所扮演的角色亦是历来研究明清女性文学学者所关注的问题之一。诚如笔者在上章研究回顾中所述一般，清代男性文人试图树立的女性典范之一即是以汉代“班昭”为代表的正统才女形象。女性的才学在家学传承与道德训导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燃脂余韵》中亦不乏对“丸熊获画”的伟大母亲形象的记录与书写。笔者在本章第二部分将通过对《燃脂余韵》中所收录的“母教”事例的分析，尝试解析王蕴章该作对于清代才女形象的建构。

一、琴瑟和鸣，赌书消得泼茶香

以下笔者将引用《燃脂余韵》中关于“夫妻唱和”以及女性“寄外作品”的笔记数则，以说明这本诗话中“友伴式”婚姻的呈现。

双湖夫人董氏，名琬贞，字容壶，晓沧先生之孙女也。晓沧先生赘于海盐，遂家焉。琬贞有小印曰“生长蓉湖家澈湖”，因以“双湖”自号。尝画墨梅寄雨生九江，题《卜算子》词以代家书。词云：“折得岭南梅，忆著江南雪。君到江南雪一鞭，可是梅时节。画了一枝成，没个谁评说。抵得家书寄与看，瘦似人今日。”雨生依韵和云：“一梦落春风，万里緘香雪。不定相逢在几时，别是黄梅节。别恨雨纷纷，只共梅花说。嫁得林逋瘦一双，长是天寒日。”客窗吟讽，何减秦嘉、徐淑之赠答也。⁷¹

该则笔记的传主为清道光年间女诗人双湖夫人董琬贞（生卒年不详），她是董

⁷⁰ 见李国彤，〈明清妇女著作中的责任意识与“不朽”观〉，《燕京学报》2006年20期，页55-77。

⁷¹ 王蕴章，《燃脂余韵》，收录于王英志主编，《清代闺秀诗话丛刊》第一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页702-703。

潮（1729-1764）的孙女，其夫为汤贻汾（1778-1853）（字雨生）将军。该则笔记的内容亦见雷瑠（1871-1941）、雷瑛所辑之《闺秀词话》中“董琬贞”条⁷²，而根据清代徐乃昌所辑之《闺秀词钞》中所录董氏〈卜算子〉一词，词牌后另有小题作“写梅寄外时在粤东”，另《闺秀词钞》首句“折得岭南梅”作“折得岭头梅⁷³”。根据其夫妇词作的内容，二人相别于黄梅时节，如今却已时值严冬，粤东梅花盛放，董琬贞即联想到江南的梅花是否也已傲雪凌霜，于是作画墨梅花一枝，并家书一封寄与相隔异地丈夫。董氏以“疏枝横玉”的瘦梅自喻，汤氏则和以“梅妻鹤子”的林逋自比，双方通过对梅花的吟咏及唱和，表现了夫妻间共有的审美情操及高雅风致，于是王氏将其二人间的诗词唱和譬喻为秦嘉与徐淑间之诗文赠答。

龚东坞本有《翦烛话雨图》，自序云：“三四年來，掌教义安，画家为余写照，因授之意，而自为一诗。”云：“鸿迹年来寄皖江，浪浪夜雨满文窗。而今说着愁滋味，珍重灯前影一双。”妻汪氏和云：“西窗面水静悄悄，促坐谈深雨气侵。回忆潇潇孤烛夜，眼前端的值千金。”龚少负奇才，老踬场屋，年七十，以副榜授仙居校官，赋诗云：“垂老居然得一官，一官仍复是儒酸。山妻惯与同甘苦，唤取来尝苜蓿盘。”伉俪之笃，风趣之雅，皆可想见。⁷⁴

在以上这则笔记中，王蕴章记载了龚东坞《翦烛话雨图》的题画诗以及其妻汪氏的和诗。在龚氏的题画诗中，他回忆了年来宦寄皖江、江浪与夜雨拍打窗户的场景，如今回想当时孤身宦游的愁苦滋味，则愈发珍惜当下能与妻子静坐窗前、对影成双的时刻。而妻子汪氏的和诗，则从相反地角度叙说了同丈夫龚氏原诗中相同的意境：龚东坞年来寄身皖江，时有夜雨和江浪拍窗，如今夫妻对坐相谈，西窗虽然面水却静寂无声，而此时与丈夫促膝长谈的内容则是回忆当年丈夫远游

⁷² 见（清）雷瑠、雷瑛辑，《闺秀词话》，收录于王英志主编，《清代闺秀诗话丛刊》第二册，页1509。

⁷³ （清）徐乃昌辑，《闺秀词钞》，清宣统元年（1909）小檀栾室刻本，见麦基尔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明清妇女著作》电子版，<http://digital.library.mcgill.ca/mingqing/search/details-poem.php?poemID=12304&language=eng>。

⁷⁴ 王蕴章，《燃脂余韵》，页635。

皖江时的夜雨。回想起丈夫当年于潇潇夜雨中孤独入眠的场景，当下二人能相对长坐的时光则越发显得珍贵。本来，《剪烛话雨图》一名就让人自然地联想起晚唐李商隐(约 813-858)的名作《夜雨寄北》，龚氏与妻子汪氏的两首诗作则全然化用了《夜雨寄北》中名句“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⁷⁵的意境，龚氏的诗作尤其是平铺直叙，而妻子汪氏的和诗，则能够从丈夫当年宦游时夜雨江浪的回忆展开诗歌内容的铺叙，完全再现了李商隐“却话巴山夜雨时”句所呈现的韵致。王蕴章随后又摘引了龚氏年来科举不利，却于老年中举后所作的另外一首诗作，龚氏在这首诗中自嘲自己老来得官却仍旧穷酸，值得庆幸的是妻子早已习惯与自己同甘共苦，面对清贫生活⁷⁶亦能怡然自得。虽然读者并不知道龚东坞之妻汪氏的确切名氏，但通过她与丈夫唱和诗作的记载，我们确实可以如王蕴章所言，想见其夫妇二人“伉俪之笃、风趣之雅”。

曹柔和(? -1756)，字苻宾，乾隆年间上海籍人，其夫婿为黄文莲(? -1790) (字芳亭)，乾隆十五年(1750)举人，乃“吴中七子”之一。王蕴章在《燃脂余韵》中称其夫妇二人“伉俪唱和，如秦嘉之有徐淑也”，⁷⁷并录曹柔和诗作三首。王氏并没有明确地记录这三首诗的诗名，只在笔记中记录了曹氏作诗的缘故，乃送别黄文莲入京之作。

闻君将远行，揽衣中夜起。出户戒徒御，入厨具甘旨。一樽布前楹，愿君且尽此。丈夫志四方，安能守床第。况君当盛年，束修本素履。读书展经纶，天逵路伊始。别离岂不怀，儿女情所鄙。为门一挥手，朔风浩千里。⁷⁸

以上为曹氏的第一首诗作，她首先描述了自己夜起为丈夫远行所作的准备工

⁷⁵ (唐)李商隐撰，刘学楷、余恕诚著，《李商隐诗歌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04)，页 1355。

⁷⁶ “苜蓿盘”用来比喻小官吏生活之清贫。《唐摭言·闽中进士》：“时开元东宫官僚清贫淡，令之以诗自悼，复纪于公署曰：‘朝旭上团团，照见先生盘。盘中何所有？苜蓿长阑干。’”(五代)王定保著，《唐摭言》(上海：中华书局，1960)，页 164。

⁷⁷ 王蕴章，《燃脂余韵》，页 810。

⁷⁸ 王蕴章，《燃脂余韵》，页 810。

作，包括训诫随行之徒御以及入厨准备干粮的过程。一樽清酒以作饯别之后，曹氏更收敛起儿女情怀，并以积极地口吻鼓励丈夫此次入京之举并借此宽慰自己。“丈夫志四方，安能守床第。况君当盛年，束修本素履。读书展经纶，天途路伊始”，曹氏激励正值盛年的丈夫不应眷恋儿女私情，而应该去都城大展拳脚并实现抱负。“别离岂不怀，儿女情所鄙”，曹氏坦言自己感伤别离，但为了匡助丈夫的雄图大志，她亦劝诫自己也不可过分流连于儿女情长。“为门一挥手，朔风浩千里”，诗末则是曹氏对丈夫壮志勃发、挥手告别潇洒姿态的描写。

絜余少鲁钝，龟勉承义方。结发事君子，琴瑟谐中堂。率衣同问寝，欢笑溢尊璋。嗟嗟灵椿树，一夕摧严霜。慈鸟待反哺，中夜徒彷徨。君今去庭帟，所志在显扬。鼎牲与菽水，得失君自量。《南陔》有遗训，勗哉无相忘。⁷⁹

以上为曹氏的第二首诗作，诗作首先描绘了夫妇二人相敬如宾、侍奉翁姑的和谐生活场景。“嗟嗟灵椿树，一夕摧严霜。慈鸟待反哺，中夜徒彷徨”，椿树向来被视为长寿之树，曹氏此处或许是指子女虽然希望翁姑健康长寿，但他们随时可能因病患突然离世。丈夫远游，彷徨无依的父母心系子女，而且更为迫切地希望能够依赖子女的照顾。“君今去庭帟，所志在显扬。鼎牲与菽水，得失君自量。《南陔》有遗训，勗哉无相忘”，曹氏提醒丈夫此行虽然是上京寻求大展鸿途的机会，但是仍不要忘记在建树功名与奉养双亲之间权衡轻重，最后更以《诗经》中寓意孝侍父母的名篇《南陔》⁸⁰以表警醒，提醒丈夫要时刻勤勉地将孝道谨记于心。

峨峨春明门，车马何喧阗。要津策高足，宾从皆豪贤。朝为菰芦士，夕作蓬莱仙。簪裾纷接席，为乐若百年。君本悠悠者，夙昔敦古欢。珠玉在怀抱，

⁷⁹ 王蕴章，《燃脂余韵》，页 810。

⁸⁰ 《南陔》，《诗·小雅》篇名，六笙诗之一，有目无诗。《诗·小雅·南陔序》：“《南陔》，孝子相戒以养也；《白华》，孝子之絜白也；《华黍》，时和岁丰，宜黍稷也。有其义而亡其辞。”见（汉）毛亨撰，（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疏，《毛诗正义》，收录于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页 711。

所投宜慎旃。敢告百君子，德行期无愆。⁸¹

以上是曹氏送行诗的最后一首，她在诗中首先描写了京城名士汇集、车马络绎不绝的场面，这其中不乏本来隐匿菰芦间的豪杰隐士因获得伯乐的赏识，瞬间跻身于都城的上流社会中，他们簪裾相接、朝夕宴饮，行乐欢娱、热闹非凡。随后曹氏笔锋一转，提醒丈夫他本来无官无禄、自由自在，虽然身怀珠玉之才，但更要谨慎地选择投靠的对象，并劝诫丈夫无论时局如何，坚持德行与操守总归不失为最正确的选择。

在以上三首诗作中，曹柔和表现出的是一个贤淑体贴的妻子形象，丈夫即将远游去都城谋求建功名的机会，曹氏身为妻子，深识大体，积极地鼓励丈夫一展抱负，并宁愿暂时割舍儿女之情；身为媳妇，孝奉翁姑，殷殷叮咛丈夫不要忘记乌鸦反哺之义。除此之外，她更以一个知书识礼的精神伴侣形象，提醒丈夫不要被京城的声色所迷惑，要谨慎地选择能够赏识自己才能的伯乐，更要时刻不忘道德操守，难怪王蕴章在诗后评论她为“敦厚温柔，不愧大家风范⁸²”。

身为娴淑温婉的贤内助以及相互扶持的精神伴侣，在与丈夫的诗文赠答中，王蕴章更欣赏如曹柔和送行诗三首中所表现出温柔敦厚的大家闺秀形象。在《燃脂余韵》卷五的同一则笔记中，他就列举了两位女性诗人赠答丈夫的诗作，并品评优劣：

台州张宿庵室李氏修琴，有《咏蠹鱼》一绝云：“生涯纸上亦堪怜，书味醅醅可细研。空有痴心成脉望，却知何处是神仙。”宿庵勤学不得志，故李诗云然。莱州谢淑清，适邑诸生魏定。《寄外》诗云：“音书欲寄又迟迟，忍把闲愁说与知。日永偏教常作别，家贫犹喜富于诗。萧条旅馆挑灯后，寂寞空闺搦管时。君是慧心曾解未，但无言处即相思。”家贫诗富，妙谛天成。视修琴之但工感慨，更进一解矣。⁸³

⁸¹ 王蕴章，《燃脂余韵》，页 810。

⁸² 王蕴章，《燃脂余韵》，页 810。

⁸³ 王蕴章，《燃脂余韵》，页 796。

在上引文的第一首诗作中，李修琴（生卒年不详）将毕生钻研于文章学问却郁郁不得志的丈夫张宿庵比喻成书虫，更引用蠹鱼食“神仙”字而化成“脉望”，吞之成仙⁸⁴的典故用来讽刺丈夫，劝他不应一厢情愿，抱有读书不能得求功名，却希望有朝一日能列入仙班的痴心妄想。这则笔记的第二首诗作则出自莱州籍女诗人谢淑清（生卒年不详）⁸⁵，这是一首寄外诗，谢氏在诗作中首先表明自己对远游在外的丈夫虽百般思念，却生怕愁绪令丈夫过于牵挂，只能迟迟拖延邮寄家书。漫漫长日不知如何消遣时光，自己却不得不与丈夫两地分离，但好在家境贫寒，却能以作诗为乐。在诗作的颔联中，谢氏更将自己与身处异地的丈夫置于不同空间中的同一平行时间下，想象丈夫在异乡的萧条旅馆中挑灯夜读的时候，也正是自己在寂寞空闺中搦管作诗之时。在诗作尾联中，谢氏认为自己与丈夫早已心有灵犀，虽然诗作中并未只字言明相思之苦，但是丈夫应该已然了解自己深深的思念与牵挂之情。王蕴章将两首诗比较，认为李修琴虽然笔锋尖锐、工于感慨，但是谢淑清的诗作反而妙谛天成，更进一解。相较李修琴笔下对丈夫的讥讽与揶揄，或许王蕴章认为谢氏的〈寄外〉诗更有温柔敦厚的大家闺秀风范，丈夫远游在外，妻子纵然诸多牵挂，却只含蓄地表达了思念之情，家境贫寒，却能安于寄情诗词之乐。

二、丸熊获画，教子成名母亦师

除了作为友伴式婚姻中的贤妻，明清女性仍以家学传承者的形象，出现在各类

⁸⁴ “张馥尚书少子，尝闻壁鱼入道经函中，蠹食“神仙”字，身有五色，是名“脉望”，吞之则仙。遂多书“神仙”字，碎剪入瓶中，捉壁鱼投之，冀其蠹食。不能得，忽成心疾。”见（五代）孙光宪著，贾二强点校，《北梦琐言》卷十二（北京：中华书局，2002），页250；又“建中末，书生何讽尝买得黄纸古书一卷，读之，卷中得发卷，规四寸，如环无端，何因绝之，断处两头滴水升余，烧之作发气。讽尝言于道者，吁曰：‘君固俗骨，遇此不能羽化，命也。’据《仙经》曰：‘蠹鱼三食神仙字，则化为此物，名曰脉望。夜以规映当天中星，星使立降，可求还丹。取此水和而服之，即时换骨上宾。’因取古书阅之，数处蠹漏，寻义读之，皆神仙字，讽方叹服。”见（唐）段成式撰，方南生点校，《酉阳杂俎续集·卷二·支诺皋中》（北京：中华书局，1981），页215。

⁸⁵ 《闺秀诗话》作“谢淑情”。见（清）苕溪生辑，《闺秀诗话》，收录于王英志主编，《清代闺秀诗话丛刊》第二册，页1676。

笔记和女性文集中。在本章的第二节中，笔者将征引《燃脂余韵》中的相关内容，以论述这本诗话中关于“母教”这一子题的呈现。

钱云仪，进士安侯女，贡生黄式序室，为顾若璞曾孙妇，若璞，字和知，以诗文名世。著有《卧月轩稿》。尤有经世才，为闺阁中所仅见。其致学之勤，可于其与弟书中见之。书云：“夫溘云逝，骨铄魂销，惟殍而哭，不如死之久矣。岂能视息人世，复有所谓缘情靡丽之作耶？徒以死节易，守节难，有藐诸孤在，不敢不学古丸熊画荻者，以俟其成……于是酒浆组紃之暇，陈发所藏书，自四子经传以及《古史鉴》、《皇明通纪》、《大政记》之属，日夜披览如不及。二子者从外传入，辄令篝灯坐隅，为陈说吾所明，更相率咿吾，至丙夜乃罢……⁸⁶

以上这则笔记出自《燃脂余韵》卷六，衔接上则笔记对钱塘蕉园七子，除钱凤纶（1622-1722）（字云仪）以外其余六位女诗人生平简略介绍及诗歌选录之后。这条笔记内容很丰富，除了上引文中提及的人物钱凤纶，顾若璞（1592-1681）之外，未引用原文中被提及的人物另外还包括顾若璞长子黄灿（1611-?）的妻室丁玉如（生卒年不详）。然而这则笔记内容仍围绕顾若璞为中心，甚至对其子媳丁玉如的介绍，亦是通过对顾氏的书信，〈若璞至张夫人书〉而展开的。钱塘蕉园诗社乃是清初以顾若璞为领袖的家族式女性文学社群，关于顾若璞的生平及蕉园诗社的文学活动情况，已有不少学者进行过相关的研究⁸⁷，笔者在此便不加赘述。

引文中顾氏的这段书信，收录在清代静寄东轩所辑之《名媛尺牋》中，称〈与

⁸⁶ 王蕴章，《燃脂余韵》，页 839。

⁸⁷ 如高彦颐，《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一书中，第六章〈交际式及公众式结社〉即有关于顾若璞及蕉园诗社的文学活动情况的详细介绍，页 234-243；另参见贺晓艳，《明末清初女性作家——顾若璞研究》，上海：上海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硕士论文，2012。

胞弟书》⁸⁸，此外，亦是顾氏《卧月轩稿》自序中的一段文字⁸⁹。这封书信记录了顾氏在丈夫黄茂梧（1590-1619）去世之后，在家事之余披览古籍，并为两子黄灿、黄炜（1614-1678）讲解经史的过程。顾氏自称“不敢不学古丸熊画荻者”，除了亲自督促二子研阅经史，她更特地为长子黄灿在西湖断桥选择了一处僻静之所，建造了一支专供他读书的船只。《卧月轩稿》卷三录〈修读书船〉七律一首，即顾氏为此事而作，其诗前小序即自述了她为黄灿修船的过程⁹⁰，“闻道和熊阿母贤，翻来选胜断桥边”，她在该诗首联即将自己比喻为唐代为子柳仲郢（？-864）和熊胆制丸以作提神醒脑之用的贤母韩氏。清代完颜恂珠所辑之《国朝闺秀正始集》所录顾若璞此诗，甚至刻意重新改题为〈秋日为两儿修读书船泊断桥作〉，并省去诗前小序，以显示顾氏育子长幼兼顾，而读书船并非为长子一人独修之贤母形象⁹¹。除此之外，顾氏也十分注重女性教育，她曾为女儿延请塾师，而因此受到一位老妪的讥讽，于是便因此作有〈延师训女或有讽者故作解嘲〉一诗加以反驳，“哀今之人，修容饰襟。弗端蒙养，有愧家声。学以聚之，问辩研精。四德三从，古道作程。斧之藻之，淑善其身⁹²”，她在诗中指责当时的某些女性只注重对仪容服饰的修饰，而忽略了家

⁸⁸ （清）顾若璞，〈与胞弟书〉，收录于（清）静寄东轩辑，《名媛尺牋》前润浦氏藏版，见麦基尔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明清妇女著作》电子版，<http://digital.library.mcgill.ca/mingqing/search/details-poem.php?poemID=35935&language=eng>。

⁸⁹ 见（清）顾若璞，〈卧月轩稿序〉，收录于《卧月轩稿》，光绪嘉惠堂丁氏刻本，见麦基尔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明清妇女著作》电子版，<http://digital.library.mcgill.ca/mingqing/search/details-poem.php?poemID=27962&language=eng>。

⁹⁰ “秋日为灿儿修读书船，泊断桥合欢树下，雨山峭蒨，空水澄鲜，断烧留青，乱烟笼翠，与波上下，倏有倏无。忽晴光爽气激射于丛云堆黛之中，令人心旷神怡，不复知有人间世矣。览物兴思，为诗以戒。”见（清）顾若璞，〈修船读书〉小序，收录于《卧月轩稿》，见麦基尔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明清妇女著作》电子版，<http://digital.library.mcgill.ca/mingqing/search/details-poem.php?poemID=28265&language=eng>。

⁹¹ （清）顾若璞，〈秋日为两儿修读书船泊断桥处〉，收录于（清）完颜恂珠，《国朝闺秀正始集》，清道光十一年（1831）红香馆刻本，见麦基尔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明清妇女著作》电子版，<http://digital.library.mcgill.ca/mingqing/search/details-poem.php?poemID=912&language=eng>。

⁹² （清）顾若璞，〈延师训女或有讽者故作解嘲〉，收录于（清）完颜恂珠，《国朝闺秀正始集》，见麦基尔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明清妇女著作》版，<http://digital.library.mcgill.ca/mingqing/search/details->

学的传承，并坚持妇女也可以通过研究学问修善其身并培养妇德。

钟令嘉，字守箴，号茶甘老人，江西余干人。铅山蒋心余之母也。心余少孤，四龄时，守箴断竹为箴，攒箴成字，教之，口授经书，盖与丸熊画荻竞美矣。心余卒以是入木天为名士。守箴著有《柴车倦游集》。《登太行山》一首，颇有唐人音节。诗云：“绝磴马萧萧，群峰气势骄。苍云横上党，寒色满中条。极目河如带，拦车雪未消。龙门划诸水，禹力万年昭。”尝就养京师，谓心余曰：“吾儿才非适时者，不如归也。”心余悚然，乞假归。守箴作《归舟安稳图》，题诗纪之。其高致尤不可及也。⁹³

以上这则笔记的传主为钟令嘉（1706-1775），是清代与袁枚、赵翼并称为“江右三大家”的蒋士铨（1725-1784）（字心余）的母亲。《燃脂余韵》记叙了钟氏在蒋心余四岁的时候折断竹子、凑成文字，授书教儿事迹。蒋士铨曾延请画师绘制《鸣机夜课图》，画中的母亲“手任操作，口受句读”，同时，他亦作有《鸣机夜课图记》，在文中叙述了母亲一生的行谊⁹⁴。除了《燃脂余韵》所录钟令嘉〈登太行山〉一首之外，完颜恂珠《国朝闺阁诗钞》中另收录其诗作二十二首，其中有组诗〈腊日寄铨儿八首〉，内容亦不乏身为母亲对儿子的规劝之言，例如“贫贱莫骄人”、“恃才防暗忌，交友戒多言”⁹⁵等句，即是劝诫儿子应该注重对自己品行的修养，并且需要谨慎地处事待人。

钟令嘉认为儿子“非适时者”，不适合官场生涯，为了远祸全身，便规劝其急

poem.php?poemID=28005&language=eng。

⁹³ 王蕴章，《燃脂余韵》，页 841。

⁹⁴ 以“课子”为主题，是清代女性作品中常见的类型之一，课子作品大概有三类：课子书、课子诗文及课子图。具体论述，请参见钟慧玲，〈期待、家族传承与自我呈现——清代女作家课训诗的探讨〉，《东海学报》2003年第15期，页177-204；刘咏聪，〈清代女性的课子诗文〉，收录于周愚文、洪进编《中国传统妇女与家庭教育》（台北：师大书苑有限公司，2005），页123-171。

⁹⁵ （清）钟令嘉，〈腊日寄铨儿八首〉其一及其五，收录于（清）蔡殿奇辑，《国朝闺阁诗钞》，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刻本，见麦基尔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明清妇女著作》电子版，

<http://digital.library.mcgill.ca/mingqing/search/details-poem.php?poemID=17860&language=eng>。

流勇退。蒋心余听从了母亲的劝诫，于是请辞回乡、携母南下，并绘有《归舟安稳图》一卷，一时公卿名士，题咏盈卷。钟氏亦有〈自题〈归舟安稳图〉七首〉，袁枚〈题蒋苕生太史〈归舟安稳图〉〉有句云“阿母更欣然，歌诗七章矣”⁹⁶，即指此事而言。〈自题〈归舟安稳图〉七首〉第一首便写道：“馆阁看见十载陪，虑他福薄易生灾。寒儒所得要知足，随我扁舟归去来”，⁹⁷官场沉浮、仕途险恶，钟氏在开篇即表达了对儿子官僚生涯的担心，劝其应知足常乐，不应贪恋权位。“四十归田可闭门，焚香省过答天恩”、“书声绕歇笑声连，乞枣争梨绕膝前”⁹⁸，钟氏在其余数首诗作中更是刻画了其家族钟情山野、归隐山林的闲适情致，以及祖孙三代、共叙天伦的温馨场景。袁枚《随园诗话》载：“乙酉岁（1766），心余奉母出都，画《归舟安稳图》，一时名公卿，题满卷中。尹文端公谓余曰：‘此卷中无佳作，惟太夫人自题七章，陆健男太史四首，足传也。’⁹⁹”可见当时文人对钟氏见识之深远与情致之超轶的钦佩，王蕴章在本则笔记中称钟氏“高致尤不可及”，而“盖与丸熊画荻竞美”，正与当时文人不谋而合。

勾曲女史骆佩兰，亦受业于仓山者也。尝作《秋灯课女图》，曾宾谷为题一绝云：“一灯双影瘦伶俜，窗外秋声不可听。儿命苦于慈母处，当年有父为传经。”佩兰得诗，因以“听秋”名其集。¹⁰⁰

以上这则笔记出自《燃脂余韵》卷四，王蕴章所谓“勾曲女史”骆佩兰者，

⁹⁶（清）袁枚，〈题蒋苕生太史〈归舟安稳图〉〉，《小仓山房诗集》，《袁枚全集》（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页373。

⁹⁷（清）钟令嘉，〈自题〈归舟安稳图〉〉其一，收录于（清）完颜恽珠编，《国朝闺秀正始集》，见麦基尔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明清妇女著作》版，<http://digital.library.mcgill.ca/mingqing/search/details-poem.php?poemID=410&language=eng>。

⁹⁸（清）钟令嘉，〈自题〈归舟安稳图〉〉其五及其七，收录于（清）完颜恽珠编，《国朝闺秀正始集》，见麦基尔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明清妇女著作》电子版，<http://digital.library.mcgill.ca/mingqing/search/details-poem.php?poemID=410&language=eng>。

⁹⁹（清）袁枚著，顾学颀校点，《随园诗话》卷八（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页253—254。

¹⁰⁰王蕴章，《燃脂余韵》，页741。

应为其笔误，实际上应该指随园女弟子之一骆绮兰（1755-1813）。骆绮兰字佩香，号秋亭，乃江苏句容人，著有《听秋轩诗集》六卷。这则笔记即指出了骆氏诗集命名的由来，乃源于清代文人曾燠（1759-1831）（字宾谷）为其所绘《秋灯课女图》题诗中的“窗外秋声不可听”一句。曾燠是骆绮兰在文学活动中所结识的男性友人之一，除了题词《秋灯课女图》，他亦曾为骆氏《听秋轩诗集》作序，其云：“余尝从其师梦楼老人，见其《秋灯课女图》，题绝句云……¹⁰¹”可见二人乃结识于骆氏业师王文治（1730-1802）的引荐。如上文所论蒋士铨所绘《鸣机夜课图》一般，课子图乃描绘清代闺秀训课子女的一类常见作品。骆氏早寡，膝下无子，她独立教导并抚养女儿，而《秋灯课女图》即为其尽心训导的自写，骆氏有自题诗一首：“江南木落雁飞初，月色朦胧透绮疏。老屋半间灯一盏，夜深亲课女儿书。¹⁰²”全诗紧扣画面内容，首两联点明画作的季节和时间，“秋”及“夜”，末两联则用平实的语句描绘了一位在深夜残灯下训课女儿的慈母。除了自题之外，《秋灯课女图》也有当代文坛名士如袁枚、赵翼（1727-1814），以及骆氏闺中密友鲍氏姐妹等的题咏，仅浏览《听秋轩诗集》目录，骆氏即有答谢题赠诗三首¹⁰³。鲍氏姐妹在题画诗词中纷纷称咏骆氏含辛茹苦、传承家学，“芸窗新授中郎业，绛帐堪承白傅名¹⁰⁴”、“谁识闺中女傅贤，饮冰茹苦度华年”、“云外冥鸿悲寡和，膝前雏凤慧堪怜¹⁰⁵”、“令师贤母，凤雏清和孤鹤。休怨伯道无儿，中郎今有女，堪承家学。习

¹⁰¹ （清）曾燠，〈听秋轩诗集序〉，乾隆六十年（1795）年金陵龚氏刻本，见麦基尔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明清妇女著作》电子版，

<http://digital.library.mcgill.ca/mingqing/search/details-poem.php?poemID=10431&language=ch>。

¹⁰² （清）骆绮兰，〈秋灯课女图〉，《听秋轩诗集》，见麦基尔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明清妇女著作》电子版，

<http://digital.library.mcgill.ca/mingqing/search/details-poem.php?poemID=11049&language=ch>。

¹⁰³ 这三首诗分别为：〈谢毕秋帆尚书题秋灯课女图〉、〈谢绣佛夫人暨令侄女莲艇夫人题秋灯课女图〉、〈谢奇丽川中丞题秋灯课女图（并启）〉。

¹⁰⁴ （清）鲍之蕙，〈题骆秋亭女史〈秋灯课女图〉〉，收录于《清娱阁吟稿》，嘉庆16年（1811）年刻本，见麦基尔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明清妇女著作》电子版，

<http://digital.library.mcgill.ca/mingqing/search/details-poem.php?poemID=38543&language=ch>。

¹⁰⁵ （清）鲍之兰，〈题〈秋灯课女图〉〉，（清）戴燮元辑，《江鲍氏三女史诗钞合刻》，清光绪8年（1822）刻本，见麦基尔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明清妇女著作》电子版，

<http://digital.library.mcgill.ca/mingqing/search/details->

礼明诗应不愧，舅氏宾王姓骆¹⁰⁶”等，这些诗句传神地刻画出骆氏叮咛课训、尽心教女的慈母形象。

前录虞山杨芬若女史词，以不得其诗为憾。近见其《春愁曲》云：“三月江南开豆蔻，春人又是销魂候。别院黄昏疏雨寒，梨云淡白天桃瘦。绿窗梦断缕金床，门外残红零落香。绣帘波漾诗魂倩，鸭炉烟袅愁丝长。愁丝宛转天涯去，华年不共春风住。婪尾杯中鬓影轻，酴醾雪后鹃声暮。欲谱《阳春》曲未能，钿箏哀怨鹍弦涩。别尽银缸睡不成，珊瑚枕上冰弦湿。”

蒨雅绵丽，殆致力于冬郎、玉溪两家者也……其母夫人李道清，合肥李经畬编修女也。著有《饮露词》。《相见欢》云：“昼长正自堪眠，雨廉纤。半是开花时候落花天。春如梦，闲愁重，正堪怜。无奈去年今日到今年。”清芬门第，母教濡染，宜其才华之隽妙矣。¹⁰⁷

这则笔记出自《燃脂余韵》卷三，传主为杨芬若（字全荫）（1900-1949）女史及其母李道清（生卒年不详）（字味兰）。杨若芬的父亲是杨圻（1875-1941）（字云史），清末民初人，乃虞山诗派的传人，著有《江山万里楼诗词钞》；她的母亲李道清的父亲则是李经畬（1825-1906），乃大学士李鸿章（1823-1901）的侄儿。在本则笔记之前，王蕴章另有一条笔记亦是关于杨芬若的，并在其中收录了杨氏《绉春词》中〈醉桃源〉、〈珍珠令〉、〈太常令〉词作三闕¹⁰⁸，此则笔记则意在补录其诗作。“蒨雅绵丽”是王蕴章对杨氏诗风的评价，认为这是源于杨氏致力学习韩偓（842-923）及李商隐等晚唐诗人华靡绵丽诗风的结果。杨芬若曾作《绉春楼

poem.php?poemID=36230&language=eng。

¹⁰⁶（清）鲍之芬，〈百字令·题骆佩香秋灯课女图〉，《三秀斋词》，（清）徐乃昌辑，《小檀栾室汇刻闺秀词》，见麦基尔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明清妇女著作》电子版，

<http://digital.library.mcgill.ca/mingqing/search/details-poem.php?poemID=17369&language=ch>。

¹⁰⁷ 王蕴章，《燃脂余韵》，页 707。

¹⁰⁸ 王蕴章，《燃脂余韵》，页 703。

诗词话》¹⁰⁹，并在其中记录了母亲李道清词章创作的相关情况。惜笔者现不见《绡春楼词话》全卷，只能转引雷瑠、雷瑛《闺秀词话》中“李道清”条中的相关记录：“先母合肥李夫人，自署道清，字味兰，年未三十，便即仙去，生平极嗜倚声，所作恒散置奩中，自谓疏不足存，每不加珍惜，辞世后，家大人检点残篇，为刊《饮露词》一卷，不及二十闕。呜呼，吾母毕生心血，尽于此矣，每一展读，涕为琳琅。兹录呈九闕，用志吾哀，至先母词之品高意远，当世君子，已有定评，吾不敢赘一辞也。”¹¹⁰杨若芬记录了母亲从事倚声创作的情况，而后因为保存疏漏、词稿失佚，只得词作不及二十闕，并集成《饮露词》一卷。从“每一展读，涕为琳琅”等语句，我们不难看出杨氏对母亲词品的钦赏之情，想必王蕴章称她诗词修养乃源自母教濡染是很有根据的。另外，王蕴章在此则笔记中关于李道清其人及词作的内容乃后补，本不见连载于《妇女杂志》中《燃脂余韵》的原稿，由此可见，王氏是刻意将李道清的传记附于对其女杨若芬的相关记载中，以彰显母教在家学传承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三、小结

综上所述，笔者以“友伴式婚姻”及“母教”为切入视角，分析了王蕴章试图在《燃脂余韵》中所建构的两类女性的形象，即伉俪唱随的妻子以及叮咛训课的贤母。两性关系因妻子的学识及爱好而变得更为和谐平等，清代闺秀既是与丈夫相互依赖的生活伴侣，亦是与丈夫精神共鸣的文字之友。而通过对“寄外”诗，这一次类型（sub genre）女性诗作内容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清代闺秀诗作中所呈现的主题，不再单纯地限制于传统“思妇”诗作中所表达的切望与哀怨情绪，女性诗人除了对配偶追求功名建树表达精神上的支持之外，亦可以适时地给予幕游在外的丈夫建议及提醒。另一方面，清代闺秀以自身丰富的学养自觉承担起传

¹⁰⁹ 《绡春楼词话》、《绡春楼诗话》分别载于民国妇女杂志《妇女时报》1912年第7、8号中，惜未见。

¹¹⁰ 见“论李道清词”条，（清）雷瑠、雷瑛《闺秀词话》，扫叶山房1916版，见麦基尔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明清妇女著作》版，<http://digital.library.mcgill.ca/mingqing/search/details-poem.php?poemID=20012&language=eng>。

承家学的角色，她们含辛茹苦地抚育子女、躬身督课，并为子女树立道德典范，引导下一代迈入人生正途。

若将《燃脂余韵》与女性编纂者，例如沈善宝所编写的《名媛诗话》比较，闺秀诗话中关于明清才媛“友伴式婚姻”生活形态的记录，在男性编纂者的笔下更为丰富¹¹¹，学者胡晓真认为这或许源自男性编纂者猎奇述旧的心态¹¹²。而笔者认为，男性编纂者和女性编纂者的着眼角度或许本来就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女性编撰者，如沈善宝更为关注女性作为一个性别的集体命运，而更加强调身为女性的特殊生活经验。男性编纂者则更加注重女性在家庭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乃女性身为一个妻子、母亲及女儿的生活经验。

¹¹¹ “《名媛诗话》中固然有夫妇伉俪情深，且得唱和之乐得佳偶，如朱灵珠、林佩环、郭润玉、陈蕴莲、关锷等。但是，诗话中也记录了更多的女作家承受婚姻所带来的灾难和痛苦。”见钟慧玲，〈阅读女性，女性阅读——沈善宝〈名媛诗话〉中的女性建构〉，《东海中文学报》2008年第20期，页228。

¹¹² 胡晓真，《新理想、旧体例与不可思议之社会——清末民初上海“传统派”文人与闺秀作家的转型现象》，页189。

第三章 《燃脂余韵》的编纂过程及编纂策略

在上一章中，笔者对《燃脂余韵》的内容及其所呈现的清代女性生活及形象进行了相关的讨论。除了对笔记内容的直接阅读，笔者认为，王蕴章在收录女性的文学作品的同时，本身就直接或间接地涵括了某些准则及例外，其内容的安排也必须有一定的依据。另一方面，王氏对闺秀诗词的点评也间接反映了他对文学作品的接受观念以及收录诗作的诗歌品味。《燃脂余韵》在1918年由商务印书馆正始印刷出版前，曾先后刊载于涵芬楼所出版的月刊《小说月报》与《妇女杂志》中，而作者王蕴章也正与此段时期担任该两份月刊的杂志主编。笔者认为，先后断续刊载于商务印书馆所发行的两份杂志中的《燃脂余韵》或许可视为其书籍全貌的雏形，通过考察其连载状况，与正式出版的《燃脂余韵》一书进行比对，我们或许可以从中一窥王蕴章撰写此书的经过与历程。在这一章，笔者将略述《燃脂余韵》在杂志上的连载情况，并将之与正式发行后单行本的内容进行对比。另一方面，笔者也将通过对王氏该书的序跋及凡例等篇的分析，考察作者于此书编撰收录内容的考量及策略。除此之外，王氏在具体的行文中也采取了一定的编排方式和撰写手法，虽然并未在凡例中说明，但笔者也将对此稍作总结，以尝试阐述王氏该书的编撰特色。最后，笔者将通过对王蕴章对于女性诗词评语的分析，而讨论其诗学审美及接受观。

一、《燃脂余韵》的撰写过程及其在涵芬楼出版月刊中刊载情况简述

《燃脂余韵》首先于商务艺术馆于民国时期出版发行的《小说月报》〈诗话〉栏中连载，自民国三年（1914年）5卷1号一直连载至5卷12号。于5卷1号第一次登载的《燃脂诗话》前有王蕴章所书之序，阐明编纂此书之主旨与意图，此序亦刊载于民国七年（191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铅印单行本前，根据学者蒋寅所撰之〈闺秀诗话十二种叙录〉中对《燃脂余韵》一书的简介，王蕴章自序作于是年六月¹¹³。但是根据笔者的考证，于《小说月报》上刊载的王氏自序与后来

¹¹³ 蒋寅，〈闺秀诗话十二种叙录〉，页259。

出版的铅印单行本所录之自序，除了末句款识之外，文字大抵相同，《小说月报》载王序款识云：“阙逢摄提阁花生日，莼农王蕴章识于梅魂菊影室¹¹⁴”；而商务印书馆所出版之王序款识云：“阙逢摄提阁荷花生日，莼农王蕴章识于千二百轻鸾室¹¹⁵”。笔者认为，学者蒋寅之所以指出王自序作于1914年6月，其根据乃源自商务印书馆所出版之《燃脂余韵》铅印本所载王序，“阙逢摄提阁”指“甲寅年”，即民国三年，而序中所云之“荷花生日”，乃指民俗中所传之农历六月二十四日。而笔者认为，根据《小说月报》所刊之王序，若其所言之“花生日”若无特指，而泛指民俗所言之“百花生日”，则该序文的创作时间应为民国三年农历二月十二日。另一方面，《小说月报》5卷1号的出版日期为1914年4月25日，王氏撰写该序的实际日期一定不会迟于该期杂志的出版日期，所以商务印书馆所录之王序文字应于排版之后另有改动。

若将止于《小说月报》5卷10号所连载的《燃脂余韵》与其后出版的单行本相比照，除了有个别内容的删减之外，其内容与条目顺序基本与该书前两卷一致。

截止于民国三年5卷12号，《燃脂余韵》在《小说月报》上的连载暂时告一段落。此后，于民国四年（1915）5月5日，《燃脂余韵》又重新在由王蕴章主编，商务印书馆所发行的另一本女性期刊，《妇女杂志》再次开始连载。《小说月报》与《妇女杂志》的刊物定位及预设读者群不尽相同，前者文学性较浓，后者不仅仅是一部文学类杂志，它所包涵的内容更为生活化且强调一定教育意义及实用功能。¹¹⁶根据《妇女杂志》创刊号的发刊词对该本杂志的栏目分类与定位，王蕴章不曾专设〈诗话〉栏连载女性诗话，《燃脂余韵》至此被移至该刊的〈杂俎〉栏重新连载。

这次于《妇女杂志》1卷5号重新开始连载的《燃脂余韵》，王氏亦书有短序一篇，他说道：“客岁辑《燃脂余韵》若干言付诸《小说月报》，药非特健，符是詵痴，亦茶枪酒铛，问一种零星功课耳。辍业以来，不复置念，乃辱海内，嗜茄诸子，或驰书相讯，或邮示名作以备甄录。空山足音，触我夙好，不辞许子之憚

¹¹⁴ 王蕴章，〈燃脂余韵序〉，见〈诗话〉栏，《小说月报》第5卷第4号（1914年），页1。

¹¹⁵ 王蕴章，《燃脂余韵》（上海：商务印书馆，1918），页1。

¹¹⁶ 注：根据《妇女杂志》创刊号的栏目分类，该刊设有〈家政〉、〈学艺〉、〈论说〉栏。

烦，再学丰干之饶舌，若云斐然有述作之思，则吾岂敢。乙卯小分龙日西神书。”

¹¹⁷王蕴章将此前连载于《小说月报》的《燃脂余韵》比作闲适时信手拈来的零散创作，并谦虚地称自己文拙笔劣，而是书的创作并无修身养性之用，所以自搁置以来，并没有继续编撰的念头。但是由于读者相继来信打听，或邮寄作品要求辑录于《燃脂余韵》中，为了不辜负读者不厌其烦的询问，无奈之下只能多嘴多舌、再次操笔，而并非自身又一度提起了著述的兴致。诚然，以上只是王氏的自谦之词，但是我们由此可知，他关于《燃脂余韵》之创作，在1914年5卷12期《小说月报》连载暂时完结之后，曾一度辍笔搁置、且并无续作之念，而后因为海内读者之殷殷关切，才于1915年农历2月2日（即乙卯小分龙日）重新开始该书的撰写。

《燃脂余韵》在《妇女杂志》上的连载，断断续续从1915年一直持续到1917年：即1915年1卷5号至10号，1916年2卷6号至8号以及1917年3卷1号。或许王氏于此年间对于该书的资料收集与编辑撰写，间中亦有辍笔之时，所以未能持续在《妇女杂志》上连载。尤其是1917年3卷1号上所刊载的《燃脂余韵》，其位置则由一贯之〈杂俎〉一栏移至〈补白〉一栏，而内容仅有两条。

若将《燃脂余韵》单行本的内容与其在《妇女杂志》上的刊载情况对比，后者大概包括该书单行本卷三及卷四的部分内容。而就条目的编排顺序上，两者差异巨大。根据笔者的整理，现所见《燃脂余韵》卷三及卷四的条目内容编排，若以《妇女杂志》与此前刊载在《小说月报》的末两号为参照，则按照以下顺序排列：《妇女杂志》15年1卷5号——同前1卷6号——同前1卷7号——《小说月报》14年5卷12号——《妇女杂志》16年2卷6号——《小说月报》14年5卷11号——《妇女杂志》15年1卷8号——同前1卷9号（以上为第三卷内容）；《妇女杂志》15年1卷10号——《妇女杂志》16年2卷7号——同前2卷8号——《妇女杂志》17年3卷1号（以上为第四卷部分内容）。由此可见，此后出版的《燃脂余韵》单行本于条目编排上曾做出巨大的调整。

¹¹⁷ 见〈杂俎〉栏，《妇女杂志》第1卷第5号（1915年），页1。

二、《燃脂余韵》之编撰策略

除了王蕴章自序外，《燃脂余韵》前另有 1918 年邵瑞彭¹¹⁸（1886-1938）与白曾然¹¹⁹骈序两篇，以及王氏“凡例”数条，书后亦有同年徐彦宽¹²⁰（1886-1930）所书之跋。笔者现将其中言及该书收录内容及编纂策略之言加以总结，归纳为如下几点：

（一）《燃脂余韵》以诗文评为编撰体裁。集后徐彦宽所著之跋中将该书与女性总集与别集相较优劣，肯定了王氏采取以“诗话”为体的撰写策略，他说：“以为闺人专集，其力量恒难行远，今之独在天地间者，不过易安居士等几人耳。若夫总集，存人虽易，然选楼鉴衡，未必适能尽擷其英华；兼之掇求广，乃自来通癖。于是萧艾偶入，兰蕙遂为不老，或溢或泛，都易见过，则亦未为善制。惟此用诗文评体裁出之，乃最推胜着……微恨女士《荟说》¹²¹，明以前摭取略备，于清代翻不多。并时梁苕林中丞《闽川闺秀诗话》等编，仅系一隅，皆非能有意广阐之。”¹²²徐彦宽指出，女性别集流传不易，惟有个别女诗人，诸如李清照的别集能流传至今；总集虽然易于为女性诗人存名，但是编者在选诗入集的时候，未免厚此薄彼，有所疏漏，而未能将精华尽收其中。另一方面，总集收录求广，难以避免劣作时有混入佳作中的情况；徐彦宽更以《金箱荟说》以及《闽川闺秀诗话》为例，指出它们在收录时段和地域选择方面的限制与偏颇，从而肯定了《燃脂余韵》之“诗话”诗文评体裁的优势。

（二）该作收录时间“断自清初，以迄近驥”。¹²³《燃脂余韵》并非女性诗选总集，王氏更注重对清代女性诗人及时人诗作的收录。纵观蒋寅对十二种清代闺秀

¹¹⁸ 邵瑞彭，为南社社员，字次公，浙江淳安人，1886年生，历任北京大学、民国大学、中国学院、河南大学教授。众议院议员、临时参政员参政。见郑逸梅，《南社丛谈》（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页167。

¹¹⁹ 白曾然，民初词人，曾加入镇江海门吟社，他与王蕴章亦同属上海淞滨吟社。

¹²⁰ 徐彦宽，无锡人，原名泰来，一名士奎，后更名彦宽，曾任无锡县图书馆编目，辑有《念劬庐丛刻》。其少年时与钱基博同师承清末秀才许国风（1876-1963），钱基博曾著有《亡友徐君薇生学行谊传》。

¹²¹ 杨蕊渊（1778-?）著有女性诗话《金箱荟说》八卷，据徐跋，只见其稿本，《燃脂余韵》卷六种亦载有该事：“蕊渊，名芸，蓉裳先生女，曾辑《古今闺阁诗话》为《金箱说荟》。”见王蕴章，《燃脂余韵》，页845。

¹²² 王蕴章，《燃脂余韵》，页864。

¹²³ 王蕴章，〈燃脂余韵序〉，《燃脂余韵》，页625。

诗话的简介¹²⁴，涵盖各朝代的综合性女性诗话占其中大部分，即使其中有专论清代女诗人的闺秀诗话，如梁章钜（1775-1849）《闽川闺秀诗话》亦有地域性的限制。沈善宝的《名媛诗话》虽然收录时段只限本朝，可惜至其截稿时，时值道光年间，对道光年后的女性诗人及作品未及收录。所以，《燃脂余韵》是继《名媛诗话》后，较为完整的一部专录清代女性诗人的闺秀诗话。

（三）在内容方面，该书不录“仙乩鬼怪、淫靡艳荡”之作。白曾然序中亦对此两则标准加以阐释道：“夫朝朝暮暮之辞，卿卿我我之语。柳梢月上，忆人约而不来；桑落霜寒，赋氓蚩而自悔：究嫌佚荡，奚事平章？至若遗世佳人、降真仙子：盘塘江上，马缨一树之题¹²⁵；疏香阁中，灰囊两字之喻¹²⁶。非弄狡猾，亦近谬悠，付之闕如。”¹²⁷白序“佚荡”即王氏所谓“淫靡艳荡”之作，而“谬悠”即所谓“仙乩鬼怪”之事。纵观全书，王氏确实严格遵循其凡例所述之收录标准，如《小说月报》5卷4号所刊之《燃脂余韵》中曾录有“乩题诗一首”¹²⁸，在正式出版后该条却被删除。若将《燃脂余韵》与清代的闺秀选集与诗话比较，王蕴章不录“仙乩鬼怪”的收录准则便显得较为特殊。以清代较为著名的闺秀选集为例，袁枚所编选的《随园女弟子诗选》曾收录随园女弟子金逸（1770-1794）的仙乩诗；任兆麟所编选的《吴中女子诗钞》曾收录江珠《酬乩仙诗三首》；就连以标举“雅

¹²⁴ 详见蒋寅，〈闺秀诗话十二种叙录〉，页253-261。

¹²⁵ “盘塘江上，马缨一树之题”：元代虞集《水仙神》诗云：“钱塘江上是奴家，郎若闲时来吃茶。黄土筑墙茅盖屋，门前一树马樱花。”（清）蒲松龄《聊斋志异》〈王桂庵〉一文中曾引此诗，言王桂庵于南游途中偶遇一舟中少女，从此一见倾心，苦为寻访却不得消息，后于梦境中见一居所之庭园中有一株合欢花，便吟诵“门前一树马樱花”句，而少女正居此处。见（清）蒲松龄撰，《铸雪斋抄本聊斋志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页714-716。

¹²⁶ “疏香阁中，灰囊两字之喻”：晚明才女叶小鸾（1616-1632）未婚早夭，曾著有《疏香阁词》一卷，“灰囊”两字不知何意。而叶小鸾的父亲叶绍袁（1589-1648）《午梦堂集》中有〈窃闻〉、〈续窃闻〉、〈琼花镜〉等篇叙述了他为女儿叶小鸾扶乩招魂之事，说她前身为曹大家，而逝后则入天界，召为广寒执节侍史。结合王氏“仙乩鬼怪”之谓，或与叶绍袁扶乩招魂一事相关。（明）叶绍袁，《琼花镜》，见（明）叶天寥辑，《午梦堂集》，收录于施蛰存主编《中国文学珍本丛书》第一辑（上海：贝叶山房，1936），页1-4。

¹²⁷ 白曾然，〈燃脂余韵序〉，见王蕴章，《燃脂余韵》，页623-624。

¹²⁸ “前载小青女史牡丹亭骰谱，偶阅《蠡庄诗话》，又得其乩题刘仪可《美人结网图》一绝云：‘藕丝衫子藕丝裳，放鹤归来趁晚凉，借问阿依忙甚事，结成锦网网鸳鸯。’”见《小说月报》第5卷第4号（1914年），页18。

正”为选录标准的《国朝闺阁正始集》亦收录女诗人春桃的《和虬仙》诗一首。若以清代女性诗话为例，沈善宝《名媛诗话》即专辟末卷收录方外、题壁以及仙虬诗；袁枚《随园诗话》亦收录了一些与女性有关的仙虬鬼怪之事¹²⁹。

（四）虽以“诗话”为编撰体裁，实则书中亦采录女性著作之，其他文体：如诗余、杂文、尺牍等。除了诗选、词选、尺牍选、散曲集等限制文体的清代闺秀选集之外，这种广采文体的编辑策略在清代闺秀诗话的编撰中实则较为普遍，特别是以“随笔”形式书写的女性诗话。明清女性诗话的编写本身即包含了编纂者为女性作品“存余”、为闺秀作家“留名”的意图，所以在作品的采纳和收录中并没有严格的规定文体。

除了上述四点，笔者认为较为值得学者关注的尚有另外两点：其一为《燃脂余韵》一书收录女性作家的社会地位与身份，这亦是历来学者研究明清女性选集的切入视角之一，讨论的重点则以选集是否收录青楼女性的作品为主；其二则是关于清代才媛“德”与“才”之辩的议题。

有关清代闺秀选集收录女性作家的社会身份问题，时常被学者引为参照的自然是清代完颜恽珠所编写的《国朝闺秀正始集》，完颜氏在序言中即开宗明义地申明将秉持“温柔敦厚”之诗教观，而此集将不录“青楼失行妇人”之作，认为“是集所选以性情贞淑、音律和雅为最。……青楼失行妇人，每多风云月露之作，前人诸选，津津乐道，兹集不录。”¹³⁰“柳如是、卫融香、湘云、蔡闰诸人，实能以晚节盖，故遵国家准旌之例，选入附录，以示节取。”¹³¹完颜氏在编选女性诗作时，注重诗歌风格的端庄贤淑，音律的和谐雅正，指责历代文人在编纂女性诗歌选集时热衷于收录“青楼失德妇人”作品的做法，其《国朝闺秀正始集》选录青楼之作收入附录，亦是因为这些青楼女作家能够“晚节善终”，即便如此，置入附

¹²⁹ 关于《随园诗话》中有关仙虬鬼怪之事记录的详细论述，请参考林容榆，《〈随园诗话〉中的女性群像研究》，台中：东海大学中国文学系硕士论文，2010，页193-195。

¹³⁰ （清）完颜恽珠编，〈国朝闺秀正始集例言〉，《国朝闺秀正始集》，见麦基尔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明清妇女著作》电子版，

<http://digital.library.mcgill.ca/mingqing/search/results-work.php?workID=38&language=ch>。

¹³¹ 同上。

录中的青楼作品，相较集中其他闺秀诗作仍有主次之分。

而反观王蕴章《燃脂余韵》一书，除了凡例中言明不录“淫靡艳荡”之作外，并没有对书中所收录的女性作家的社会身份地位有明确的限制与规定。诚然，白曾然序中有“熏香摘艳丽，与清丽为邻；滴粉搓酥，本温柔立教¹³²”之语，言辞间似主张“清丽温婉”之诗风与“温柔敦厚”之诗教，但这只是针对女性作品整体的内容、格调与立意而言，并未将“风尘”作为一种收录女性作品的限制。另一方面，王蕴章也并没有采用明清文人对于自己在女性选集中收录青楼诗人诗作合理化的一贯辩证方法，它在全书中并没有特别指出《燃脂余韵》包括青楼妇人作品的筛选标准是借鉴及校方《诗经》收录郑卫之声的做法。

纵观全书，王蕴章曾收录柳如是（1618-1664）、顾横波（1619-1664）、董小宛（1624-?）、“闽妓”等勾栏中人的诗作，且在行文中并未直接对这些青楼诗人的品格操行提出批评，却仍以诗词创作本身为批评重点。如王氏论及柳如是及其词时便说道：“靡芜诗词颇富，虞山《柳枝词》，诋斥过甚，要其文采自足动人也。余最赏其《咏寒柳》《金明池》一词……缠绵婉笃，词意殊胜。”¹³³王蕴章认为清人王运《虞山柳枝词》对河东君柳如是的诋毁过甚，而提醒读者及诗评家关注柳如是诗词本身的文学造诣，并进而肯定了其词作的语言及格调。又如王氏论及明末妓女顾横波词则言，“柳如是诗词，人多知之；顾横波之作，则流传较少……《众香词》又录横波词三首……此外所见甚少，惟《正始集》载其二诗……”¹³⁴王氏感叹顾作流传不如柳作之广，遂收集现有文集中可见之顾作，将其归整并纳入《燃脂余韵》中。虽然王蕴章叙述间曾论及她与龚鼎孳（1615-1673）之间的风韵情事，且并未对其作品加以评点，但此则笔记的主要目的仍是以保存及流传顾横波作品为主。

另一方面，王蕴章于序言与凡例中并没有正面谈论关于清代争辩不迭的有关女子“才德之辩”之讨论，但是邵瑞彭（1887-1937）序中却对此议题有所回应：

¹³² 白曾然，〈燃脂余韵序〉，见《燃脂余韵》，页 623。

¹³³ 王蕴章，《燃脂余韵》，页 655-656。

¹³⁴ 王蕴章，《燃脂余韵》，页 813-814。

“或谓才思非妇人之事，乐安于焉。焚诗小技，非壮夫所为，扬云悔其作赋；不则易安词媛，诬起玉壶，涪皤高贤，罪在绮语。莼农兹作，岂不多事？虽然歌谣之端，发于劳声；士女之情，多由托兴。人生百年，欢娶能几？当其百昌，外铄牢愁，中沍冥心，孤运往而不复。琼楼夜冷，锦瑟春啼，结想所生，神光离合。作者、述者，各有会心。皇穹鉴其忠诚，圣人知其怨悱。辞取复意，何假蹄筌？莼农微指，或在斯摩？”¹³⁵

在以上这段论述中，邵氏首先以扬雄（公元前53-公元18）、李清照（1084-1155）、黄庭坚（1045-1105）等人为例，以提出“才思非妇人之事”之设问。所谓“内言不出于外”，明清才媛惧其诗作外流，故多有焚稿之举，“焚余”也常见于闺秀诗集之名。而就算大丈夫如汉代扬雄虽无焚稿之举，但其晚年亦有“雕虫篆刻”之语，悔其早年赋作；宋代女词人李清照与丈夫赵明诚（1081-1129）精于金石之辨，却因此获罪“玉壶颁金”之通敌诬名¹³⁶；宋代文人黄庭坚也因为早年多有艳词之作，被道人法秀视为一种逾越礼法、冒犯廉耻的举动，而被法秀警告可能会因此而堕入十界最劣之泥犁地狱¹³⁷。既然才思于妇人乃至文豪皆非益事，王氏此作可谓“多事之举”？但是邵瑞彭继而为王蕴章辩论道，文章歌谣常常发端于辛劳疾苦，情思文采往往肇始于寄托比兴，更何况人生苦短、悲喜无常，无

¹³⁵ 邵瑞彭，〈燃脂余韵序〉，见王蕴章，《燃脂余韵》，页621-622。

¹³⁶ 此事指一名为张飞卿的学士曾以一把玉壶出示赵明诚，离去时又把玉壶带走，于是外界有风言风语传赵明诚用玉壶沟通金国。“初，学士张飞卿者，于明诚至行在时，以玉壶示明诚，语久之，仍携壶去。时建康置防秋安抚使。扰攘之际，或疑其馈璧北朝也。言者列以上闻，或言赵、张皆当置狱。”见（清）俞正燮撰，涂小马等校点，《癸巳类稿·易安居士事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页540。

¹³⁷ 黄庭坚为晏几道《小山集》作序，其言：“余少时闲作乐府，以使酒玩世。道人法秀，独罪余以笔墨劝淫，于我法中，当下犁舌之狱，特未见叔原之作耶。”见（宋）晏几道、晏殊撰，张草纫笺注《二晏词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页603。又“法云秀老，关西人，面目严冷，能以礼折人。李伯时画马，东坡第其笔，当不减韩干。都城黄金易致，而伯时画不可得。师让之，曰：‘伯时士大夫，而以画马之名行，已可耻，矧又画马人夸以为得妙入马腹中，亦足可惧。’伯时大惊，不自知身去坐榻曰：‘今当何以洗其过？’师劝画观音像以赎其罪。黄鲁直作艳语，人争传之，秀呵曰：‘翰墨之妙，甘施于此乎？’鲁直笑曰：‘又当置我于马腹中邪？’秀曰：‘公艳语荡天下淫心，不止于马腹中，正恐生泥犁耳。’鲁直颌应之。故一时公卿伏师之善巧也。”见（宋）惠洪《冷斋夜话》，收录于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台湾：商务印书馆，1939），页46。

论作者与读者皆能于人生境遇之起伏在文学创作中产生情感上的共鸣，甚至苍天和圣人亦能体知诗人忠诚怨悱之心。邵氏最后提出“辞取复意，何假蹄筌”之论说，就是指出“文”与“辞”就好比“蹄”与“筌”一般，只不过是情感寄托的工具与手段。“得意忘言”，邵氏更为强调的乃是情感表达的自主性与自发性，而并不把文学创作视为闺秀卖弄文笔、炫才露己的工具，也进一步合理化了王氏编辑此书的初衷。

以上对《燃脂余韵》一书编撰体例、收录标准的论述，乃源自对于该书凡例及序跋内容的总结及归纳。除此之外，根据笔者的本身的阅读经验，《燃脂余韵》一书在体例与内容上另有如下特点，以下分为三点叙述：

（一）对欧派诗话传统的继承

与梁章钜《闽川闺秀诗话》等女性诗话不同，王氏本书并不以人物为条目。《燃脂余韵》各条目之间并不以人物姓名为区分，表现在具体的写作手法上，书中的一则记录内容可能牵涉数位男性或女性文人，或者关于同一位女性的记录可能散见于书中的各卷中。以清代道光年间的女诗人关璞（字秋芙）（生卒年不详）为例，卷二的一则记录首先提及该人物，这则笔记始于清人王诒寿（字眉叔）（1830-1881）《笙月词》中两闕〈金缕曲〉的词序，序中记载了王眉叔与蒋霭卿（生卒年不详）、关璞夫妇的交游状况，以及〈金缕曲〉乃观关氏《梦影词》而作之写作动机。笔记由此展开，进而以关璞为记叙中心，铺展记录。而这条记录所牵涉的人物另有清代女性文人凌祉媛（1831-1852）（关氏为其《翠螺阁诗稿》作序）、嘉庆年间女诗人庄盘珠（1796-1820）（关氏为其作〈秋水词〉骈文书序一篇）、关筠（生卒年不详）（其为关璞妹，王氏称其“亦工诗词”）、陈湘英（生卒年不详）（其为关夫蒋霭卿从兄蒋恭亮室，王氏称“亦夫妇共吟咏”）。而王氏随后又在卷二、四、五分别录有与关璞相关的笔记数条：关氏为庄盘珠刊选《秋水词》、从友人处得关氏《梦影词》而摘录其词作、从友人处得关夫蒋霭卿《夕阳红半楼诗词剩稿》刊本中录有关氏为庄盘珠《秋水词》序文全篇而特此转录。总体上，《燃脂余韵》继承了自宋代欧阳修（1007-1072）《六一诗话》所开创的欧派诗话传统，以“以资闲谈”的随笔形式书写，以即时性的记录方式不断补充诗话的内容。自清代陈

维崧编《妇人集》¹³⁸，闺秀诗话大多不出“论诗及事”之窠臼，“且从诗话之体的首创者、体质、性质、风格特征诸方面来考察，欧派诗话应该是中国诗话之坛上的正宗。”¹³⁹不可否认，清代闺秀诗话对于女性诗歌理论性的讨论仍有所欠缺，但例如《燃脂余韵》中对闺秀诗人及其作品的记载情况，即忠实地反应了编者收集资料的来源和过程，相比系统性地单纯资料辑录、在原创性上确实更值得珍视。

（二）以主题区分条目

纵观《燃脂余韵》一书，王氏既不以人物为条目区分，在撰写时必然需要采取其他的编纂策略，使得行文不至于散乱无章，一个较为典型的例子便是采用主题式的编撰方法。所谓主题，呈现于同一则笔记中，可能为女性作家的身份或际遇，例如卷二中所载之闽妓郑玉笋、慕碧云虽同为勾栏女子，但她们却在诗作中寄托身世之悲，慕碧云更因不肯轻易失身而投水自尽，于是被王氏称誉为“瑶想琼思，兰芳竞体，宜其从春水量愁，不肯向风尘作伴。”¹⁴⁰除此之外，主题也可能表现为诗作的内容、题材、体裁，如卷二中两则笔记中的两位传主袁紫卿与浦合双即同题有《临镜诗》¹⁴¹；或皆以“蚕”为主题，玉岑与张清河则分别作有《饲蚕词》及《看蚕词》¹⁴²。卷五中一则笔记的两位传主徐菑仙与余碧则分别专赋四言小诗与六言诗。¹⁴³又如王氏认为“妇人作悼亡诗绝少”，遂于同卷一则笔记中录有桐乡孔瑶圃与嘉兴乾隆年间女诗人戴兰英之《悼亡诗》二首。除此之外，其他文人对于不同女性作家作品的评价亦可能成为一则笔记的主题，例如被清代男性文人陆祈孙（生卒年不详）在《合肥学舍札记》中誉为“诗之一过目，久而不忘者”的三位女性诗作，就被王蕴章共同收录在例如卷三中的一则笔记中，¹⁴⁴其他类似评语尚有“为人传诵句”、“两题绝唱”¹⁴⁵等。更有甚者，连姓氏相同、遭遇相同的

¹³⁸ 《妇人集》是至今所知清代最早记载清代闺秀诗词创作而具有诗话性质的著作。

¹³⁹ 蔡镇楚，《中国诗话史》（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页18。

¹⁴⁰ 王蕴章，《燃脂余韵》，页680。

¹⁴¹ 王蕴章，《燃脂余韵》，页678。

¹⁴² 同上。

¹⁴³ 王蕴章，《燃脂余韵》，页802。

¹⁴⁴ 王蕴章，《燃脂余韵》，页719。

¹⁴⁵ 王蕴章，《燃脂余韵》，页640。

清代女性亦被王氏录于同一则笔记中：如卷三中所载任邱旅店壁上名为白浣月者所作之题壁诗抒写其身世不幸，另有杭郡女子白晓月亦尝题诗庵壁申诉其遭遇，而两者相似的凄苦处境就另王氏发出了“何白氏女之多才，而所遭又皆不幸耶？”¹⁴⁶ 的感叹。

（三）对清代及时人诗话笔记内容的借鉴

虽然《燃脂余韵》在资料的收集和整理上反映了编撰者较高的原创性，但是书中的部分内容对清代的某些诗话仍时有借鉴。根据笔者现在的研究和整理结果，《燃脂余韵》的少数内容乃摘录自以下的几部清代诗话及笔记：（清）沈善宝《名媛诗话》、（清）梁章钜《闽川闺秀诗话》、（清）丁绍仪（1815-1884）《听秋声馆词话》、（清）李家瑞（1765-1845）《停云阁诗话》、（清）黄任（1683-1768）《香草斋诗话》、（清）钱泳（1759-1844）《履园丛话》、（清）陆以湑（1802-1865）《冷庐杂识》、（清）李清（1602-1683）《女世说》以及（清）史震林（1692-1778）《西青散记》等。

除此之外，王蕴章亦参考了与其同时文人所编撰的闺秀诗话，例如现所见《燃脂余韵》单行本卷四的部分条目就与《妇女杂志》上曾刊载的另外两部女性诗话——《今妇人集》与《镜台螺屑》中的相关记载内容如出一辙。《今妇人集》于《妇女杂志》创刊号〈杂俎栏〉开始连载，作者为常熟庞树伯（1884-1916），庞树伯为南社的成员之一，而其内人程灵芬则为该书作注。相较《今妇人集》，《镜台螺屑》的篇幅较为短小，其登载于《妇女杂志》2卷5号及6号，4卷11号及12号〈杂俎〉栏中，作者为程灵芬，而《妇女杂志》2卷5号〈图画〉栏亦载有程灵芬女士的小像。《燃脂余韵》卷四自“天台魏琴娘”条至“如皋冒鹤亭”条中，有数十条的记载与上述两本女性诗话的部分内容基本完全一致。根据笔者的推断，应该是王氏抄录了庞氏与程氏著作中的内容。其一，已于《小说月报》与《妇女杂志》刊载的《燃脂余韵》内容尚未涉及上述部分，而《今妇人集》的刊载时间较早。其二，与《镜台螺屑》的内容比较，王氏《燃脂余韵》多有省略，特别是

¹⁴⁶ 王蕴章，《燃脂余韵》，页721。

其中关于“钱塘女士平素娴”一条笔记的内容在全书中显得尤为突兀。王氏于书前曾有凡例数条，申明“浮靡艳荡之作，不录戒狎褻”¹⁴⁷，而该条在记录“平素娴女士”诗作之前，他却说道：“余辑此编，绝少香艳之作。以吟风弄月，无裨诗教，且易溺之志气也。唯钱塘女史平素娴绝句百首，少时即讽诵不去口，不忍割爱，录其八首云……¹⁴⁸”。而《镜台螺屑》程灵芬女士该条则载为：“吴川李小岩文泰《海山诗话》载钱唐素娴女士七绝，慧语灵心，得未曾也，转录于此……惜其姓不传，且未知其夫婿为谁也。”¹⁴⁹王蕴章与程灵芬皆录素娴女士七绝八首，且顺序一致，但根据程氏的记载，素娴女士姓氏不传，而王蕴章却称其姓“平”。除此之外，《燃脂余韵》卷三中在记载时人顾繁（生卒年不详）〈新年杂咏〉十首时，亦提及“平素娴”该人。王氏称“余尤爱诵其（顾繁）〈新年杂咏〉十首，谓得平素娴香奁遗韵。”¹⁵⁰若将现行本《燃脂余韵》与《妇女杂志》上未发行《燃脂余韵》的相关内容比较，此则关于顾繁的笔记应为王蕴章后补。但是，素娴女士的七绝皆为香艳之作，而顾繁的〈新年杂咏〉十首乃纯粹描写新年庆祝场景及风俗的诗作，全无吟风弄月之绮靡，不知王氏所谓“得平素娴香奁遗韵”所指何意。此外，若然诚如王蕴章所言，素娴女士著有绝句百首，而《海山诗话》¹⁵¹所载并非断句残章，应不至于失其姓氏不传。据上述所论数个疑点，笔者认为，王蕴章此则笔记应该是参考程灵芬《镜台螺屑》的中相关著录所得。

三、王蕴章对于女性诗歌的品评

蔡振楚曾对“诗话”的概念有所界定，其中第三点便指出诗话“必须是‘诗’与‘论’的有机结合，是诗本事与诗论的统一。”¹⁵²区别于诗歌别集与总集，即使闺秀诗话大多继承“论诗及事”的欧派诗话传统，编纂者在行文间也会适时对女

¹⁴⁷ 王蕴章，《燃脂余韵》，页 627。

¹⁴⁸ 王蕴章，《燃脂余韵》，页 773。

¹⁴⁹ 程灵芬，《镜台螺屑》，见〈杂俎〉栏，《妇女杂志》第 4 卷第 12 号（1918 年），页 2。

¹⁵⁰ 王蕴章，《燃脂余韵》，页 703。

¹⁵¹ 惜李文泰《海山诗屋诗话》流传不广，笔者于截稿之前，未能得见原著，无法考证有关素娴女士其人及其诗作在《海山诗屋诗话》中的记载状况。

¹⁵² 蔡镇楚，《中国诗话史》，页 7。

性文学作品提出批评。虽然王蕴章在《燃脂余韵》中对女性诗作的批评都呈现为简短精辟的寥寥数语，但稍加总结，也能看出编者对于女性文学创作之接受与见解。若以王蕴章自序所发之诗论作为考查该书编撰收录诗作风格的准则，他似乎特别推崇女性“抒写性灵”的诗作以及强调女性“纤丽温婉”的诗风，实则《燃脂余韵》一书是否忠实反映了王氏在自序中所言的诗歌品味，以下将分别论之。

（一）抒写性灵

“性灵”作为一种文论著作的批评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南朝刘勰的《文心雕龙》¹⁵³，其后钟嵘在《诗品》中也使用“性灵”评论阮籍的咏怀诗¹⁵⁴，宋代主张性灵学说的文人首推杨万里（1127-1296）¹⁵⁵，明代文人李贽（1527-1602）以及公安派、竟陵派亦相继对性灵学说进一步的阐发与诠释¹⁵⁶。清代著名的文人袁枚更是此种诗论的倡导者¹⁵⁷，他在《随园女弟子诗选》中收录许多符合性灵派创作理论的女弟子作品¹⁵⁸，大体而言，袁枚认为，每个个体都具有自己独特的灵智与感情，他主张文学创作者要在诗歌中表现真情、个性以及才情，诗歌要自然天成且

¹⁵³ “仰观吐喟，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见（梁）刘勰撰，周振甫著，《文心雕龙今译·原道》（北京：中华书局，1986），页9-10。

¹⁵⁴ “而咏怀之作，陶性灵，发幽思。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见（梁）钟嵘《诗品》，收录于（清）何文焕辑，《历代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1），页8。

¹⁵⁵ “从来天分低拙之人，好谈格调，而不解风趣。何也？格调是空架子，有腔口易描；风趣专写性灵，非天才不办。”见（清）袁枚，《随园诗话》，收录于《清代闺秀诗话丛刊》第一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页57。

¹⁵⁶ 关于性灵学说的渊源及发展，请参考王英志，《性灵派研究》（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页1-17。

¹⁵⁷ 许多学者曾尝试诠释袁枚“性灵说”的内涵，但他们的见解与主张不尽相同，李志恒在他的硕士论文中对前人研究成果进行了细致的梳理与总结，他指出：“多数的研究者如刘大杰、马积高、张少康、成复旺、朱自清等人，多以反对礼教、却沦于游山、纵伎、男女私情的纵欲立场，来界定袁枚的性灵（性情）涵义，也就是说，‘道德与感性情感二分，而属情’——这几乎是过往袁枚诠释成果的典型论述。”见李志恒，《袁枚性灵诗说诠释》，嘉义：国立中正大学中国文学所硕士论文，1996，页6；吴宏一归纳袁枚的“性灵说”为“主性情而抑格调”、“尚才情而不费学历”、“诗论工拙而不分时代”。见吴宏一，《清代诗学初探》（台北：学生书局，1986），页222-228；另外王英志《性灵派研究》（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及其一系列关于袁枚及其随园女弟子的论著也对“性灵说”有相关讨论。

¹⁵⁸ 相关论述，请参考李德伟，〈论袁枚〈随园女弟子诗选〉呈现之诗学观及其在清代文学史上的意义〉，《东华汉学》2009年第10期，页187-225。

具有独创性，内容要基于真实情感的抒发并表现个性。随园女弟子如席佩兰（1766-1829）、金逸、孙云凤（1764-1814）也主张性灵说，并将这种文学理论自主地运用于诗歌创作中。

王蕴章在评点《燃脂余韵》中所收录之女性诗词时，时而也用到“性灵”两字。实则，王氏在该书序中便论及上乘诗作的境界，他说道：“尝谓诗词之作，本乎性情。忽然而来，神与古会。空山无人，水流花放¹⁵⁹。臻斯境者，厥云上乘。”¹⁶⁰他以上这段论述，和“性灵”学派的创作理论颇为相似，王氏强调诗歌出于诗人真诚的天性和感情，而创作的灵感并非有意酝酿而来，而是源自刹那间的感悟和体会，诗歌的艺术表现应该空灵自然，无需过多雕琢。清代文人沈德潜（1673-1769）主张“格调说”，作诗讲求有法可循以及重视体格声调的辨析，他对当时诗坛主盟王士禛（1634-1711）及其论诗“神韵说”颇有微词，认为王士禛所编选的《唐贤三昧集》选诗讲求“空山无人、水流花开”的意境¹⁶¹、偏重清幽淡远的诗风，而缺乏雄浑的气格。袁枚主张“性灵说”主要就是为了反驳沈德潜之“格调说”，王蕴章在《燃脂余韵》的序中引用苏东坡“空山无人、水流花放”一语，显然是对“性灵”诗论的推崇。

王蕴章在《燃脂余韵》中对“性灵说”也曾加以具体阐释。他在评论郭润玉（生卒年不详）的诗作时，以“皆能抒写性灵，一洗斧凿堆砌之迹”¹⁶²以示嘉许。在评论丹徒包佩芬女史（生卒年不详）〈秋日病中〉一律时，说该诗“诗意清淡，是能以性灵为主者。”¹⁶³此外，他对沈香卿女士（生卒年不详）诗作的评语为“诗多性灵语”¹⁶⁴。

¹⁵⁹ “空山无人，水流花放”一句出自苏东坡《十八大罗汉颂》。见（宋）苏轼著，《东坡全集·卷九十八》，收录于《景印摘藻堂四库全书荟要·集部》第33册（台湾：世界书局，1989），页320。

¹⁶⁰ 王蕴章，〈燃脂余韵序〉，《燃脂余韵》，页625。

¹⁶¹ “司空表圣云：‘不着一字，尽得风流’，‘采采流水，蓬蓬远春。’严沧浪云：‘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苏东坡云：‘空山无人，水流花开。’王阮亭本此数语定《唐贤三昧集》。木玄虚云：‘浮天无岸’，杜少陵云：‘鲸鱼碧海’，韩昌黎云：‘巨刃摩天’，惜无人本次定诗。”（清）沈德潜著，霍松林校注，《说诗碎语》卷下第80条，见《原诗·一瓢诗话·说诗碎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页255-256。

¹⁶² 王蕴章，《燃脂余韵》，页682。

¹⁶³ 王蕴章，《燃脂余韵》，页688。

¹⁶⁴ 王蕴章，《燃脂余韵》，页690。

王蕴章的上述评论皆较为简略，无法具体地阐明其所谓“性灵说”的涵义，现笔者分别引用他在《燃脂余韵》中所摘录的上述闺秀诗人的诗作¹⁶⁵，加以简略分析，以期能够稍加厘清王氏的“性灵诗学观”。

《和石梧》·郭润玉

浮名不过单场事，知己何愁异日无。
偶随时样梳新髻，为喜家常着故衣。
娇儿习字移灯影，弱女敲诗爱月华。¹⁶⁶

《秋日病中》·包佩芬

萧瑟重阳信，寒生薄暮中。
病多尝试药，体弱不禁风。
人意和诗瘦，乡书遣雁通。
倦看秋色老，枫叶饱霜红。¹⁶⁷

《看花吟示儿》·沈香卿

东邻花盛开，西邻春寂寂。
雨露本无私，根基赖培植。¹⁶⁸

纵观以上三首诗作，语言平白、内容浅易、结构单纯，辞藻并未十分雕琢，也不曾使用任何典故。三位女诗人似在闲话家常一般，将生活常态如实记录于诗作中，诗歌内容所描写的场景皆源自生活琐事及个人遭遇，并没有过多思想感情的比兴寄托。由此可见，王蕴章反对诗歌雕琢过甚、堆砌典故，鼓励即情即景的

¹⁶⁵ 《燃脂余韵》中另有关于清乾隆年间女诗人熊琏的笔记一则，其中亦有“诗词俱妙、出于性灵”一语，但根据笔者考证，该则笔记内容全辑录自清代文人钱泳（1759-1844）之《屐园丛话》，并非王氏原创，故不纳入讨论。见王蕴章，《燃脂余韵》，页726；另见（清）钱泳撰，张伟校点，《屐园丛话》（北京：中华书局，1979），页657。

¹⁶⁶ 王蕴章，《燃脂余韵》，页682。

¹⁶⁷ 王蕴章，《燃脂余韵》，页688。

¹⁶⁸ 王蕴章，《燃脂余韵》，页690。

书写方式，清新淡雅的写作风格，从而不假雕饰地将个人生活经验自然真实地呈现出来。遗憾的是，王蕴章《燃脂余韵》中对闺秀诗词的点评仍过于省略，缺乏系统的论述，对于“性灵”学说的阐释只呈现为一个片面，“性灵”派其他诸如重性情、尚才情的特征并没能够结合女性文学作品进行更为具体的阐发。

（二）雄壮豪迈的诗风

王蕴章在《燃脂余韵》的自序中即提出了个人对女性诗歌创作风格的认识，他说道：“女子之作，于金戈铁马之风，豪肉哀丝之奏，或稍稍漓也。”¹⁶⁹王氏认为女性之作大多纤婉淑丽、温柔含蓄，区别于男子雄放豪壮、悲切洪亮的风格，然而他同时亦很欣赏见识与辞采不让须眉的女性，对她们富有巾帼气概的作品时有称赏。

在关于清代乾隆年间著名女词人庄盘珠的一则笔记中，王蕴章首先肯定了其词作在清代女性词坛上的成就及地位，提出“清中叶以后，闺阁倚声，不得不推苏之庄、浙之吴为眉目”¹⁷⁰的看法。随后，王氏摘录了她的词作，〈探芳讯·咏络纬〉以及〈踏莎行·大兄寄示京口怀古〉两首，亦分别在每首词后加以评点，尤其是〈踏莎行·大兄寄示京口怀古〉一词，被王蕴章评为：“豪情壮采，遂可与左杏庄‘掷于巴江流到水，切莫回头’一唱，把臂入林。”¹⁷¹“掷于巴江流到水，切莫回头”乃是清代文人左辅（1751-1833）《浪淘沙》词作中的一句，二人的词作内容都是描写在江上行舟时所见景物以及由此所引发的人生感悟。相对左辅将乡愁当作一种情绪的负担，而想把它掷入江中以求解脱的做法，庄盘珠面对“不愁不笑看今古”的青山，在体悟到人生却面临恒久的离别与哀愁时，所选择的乃是坦然接受此种无奈，而反不将伤怀付诸辞章，于是词末便有“莫将词句掷寒涛，多情恐惹蛟龙怒”¹⁷²的自我告诫之言。此后，王蕴章又摘引于闺阁中传唱一时，庄氏伤春感时的词句¹⁷³，称其“格韵卑下”，并引用晚清词人谭献（1832-1901）“东风红

¹⁶⁹ 王蕴章，《燃脂余韵》，页 625。

¹⁷⁰ 苏之庄，浙之吴：指苏州籍庄盘珠以及浙江籍吴藻（1799-1862），见王蕴章，《燃脂余韵》，页 695。

¹⁷¹ 王蕴章，《燃脂余韵》，页 696。

¹⁷² 王蕴章，《燃脂余韵》，页 696。

¹⁷³ “一院海棠春不管，依替花愁。知道明年人在否，花替依愁。”见王蕴章，《燃脂余

豆，最下最传也¹⁷⁴”的评语再次佐证自己的观点。

感伤青春及年华的流逝，本是女性文学作品中常见的主题，王蕴章却批评其“格韵卑下”，反而欣赏庄盘珠其他词作中所表现出的宽和以及豁达，这种论调也表现在他对其他闺秀诗人悲壮雄放诗风的欣赏之辞。类似对庄词的嘉赏之语尚有：“亦雄放，不似寻常闺阁中语”¹⁷⁵、“极悲壮，无一毫脂粉气”¹⁷⁶、“诗多古风，取法甚高，无闺襜绮艳之语”¹⁷⁷、“是能从大处落笔，不作小红低唱者也”¹⁷⁸等等。当然，这些诗词之所以能得到王氏“不作小红低唱者”之类的评语，与其本身的体裁与题材也有一定的关系，诸如以怀古、拟古、宦游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即已脱离了本来女性日常生活的范畴。当面对宽宏的时空跨度以及雄丽的山水风景时，诗人的性别被模糊，文学作品中抒发地更多是人类所共有的、面对宇宙自然所感受到的人世沧桑之感。

四、小结

综上所述，《燃脂余韵》本是刊登在《小说月报》中的一个小栏目，王蕴章对于该作内容及资料的收集是在断断续续的撰写过程中完成的，在1918年正式出版之前，王氏对于在《妇女杂志》中连载的《燃脂余韵》内容及编排顺序曾有过大幅度的调整。区别于女性别集与总集，《燃脂余韵》是一部以诗文评为编撰体裁，在时间及地域跨度上较为完整的清代闺秀诗话。它继承了欧派诗话“论诗及事”的传统，不以人物为条目，以“以资闲谈”的随笔形式书写，忠实地呈现了编者收集资料的过程，具有较高的原创性。王氏亦间中采取“主题式”的记录方法，

韵》，页696。

¹⁷⁴ 王蕴章，《燃脂余韵》，页696。

¹⁷⁵ 此句为王蕴章对常州毕幽兰女史（生卒年不详）《春日游敬亭》句的评语，见王蕴章，《燃脂余韵》，页688。

¹⁷⁶ 此句为王蕴章对丹徒陈女史（佚名、生卒年亦不详）《咏歌风台》诗的评语，见王蕴章，《燃脂余韵》，页693。

¹⁷⁷ 此句为王蕴章对阳湖杨蕴萼女史（生卒年不详）古风诗作的评语，见王蕴章，《燃脂余韵》，页694。

¹⁷⁸ 此句为王蕴章对左锡璇（1829-1891后）《水调歌头》词作的评语，见王蕴章，《燃脂余韵》，页789。

避免内容过于散乱无章。

虽然王氏强调不录“仙乩鬼怪、淫靡艳荡”的作品，但他在集中并未排斥收录青楼作家的文学作品，且正面评价了这些诗词的文学价值。另一方面，王蕴章并不视诗文写作为女性逞才炫己、卖弄文采的工具，并认可了以文辞抒发情感的正当功能。

根据王蕴章自序所言，他似乎特别推崇“抒写性灵”以及女性诗人特有的“纤细温婉”这两类诗风，这是否也成为他该诗话选录诗作的筛选标准呢？通过仔细阅读《燃脂余韵》中王蕴章对女性诗词的具体点评，我们可以看出“性灵”派诗论对王氏文学观念的影响，他偶以“抒写性灵”来评价自然真实、不加斧凿的女性诗作。但是另一方面，王氏虽然强调到女性诗风与男性诗风本质上的区别，具“不似闺阁语”雄壮诗风的女性作品也往往能受到编者的青睐，从而被编选入集。

学者胡晓真将王蕴章《燃脂余韵》与晚清女诗人施淑仪《清代闺阁诗人徵略》相比，认为王作缺乏章法、信手拈来，《燃脂余韵》只是编者王蕴章“随手拈来、信手成篇”的作品，而它“难免男性文人猎奇述旧的心态”¹⁷⁹。不可否认，《燃脂余韵》中诸多关于闺秀诗事的记载均富有相当的话题性及趣味性。例如，王蕴章在卷一即以两则笔记考证了清代文人张问陶（1764-1814）（字船山）买妾一事的前后始末及真伪：在第一则笔记中，王氏不厌其烦地从《船山诗草》中筛选及征引张问陶自身对于其夫妇二人诗歌唱和、琴瑟和鸣之日常生活记录的诗作，以证明张氏买妾为世人附会之说；在第二则笔记中，王蕴章提及自己偶与友人陆炜士论及此事，并通过检索《船山诗草》中较后期诗作的相关内容，发现该事其实并非子虚乌有。除此之外，王氏更将张问陶纳妾之事编成《可中亭记》戏曲一部，并刊登在《妇女杂志》1卷1号的〈杂俎〉栏中。一方面，王蕴章此种对于辩证清代文人与闺秀间风韵情事的热衷与兴趣确实或许如学者胡晓真所论，是源自男性文人某种“猎奇述旧”的心态。更为重要的是，《燃脂余韵》最初的雏形是一部刊载在大众传播刊物上的连载栏目，它为了迎合读者的口味，选材上注重趣味性和谈资性才更为符合一本商业杂志的消闲功能。

¹⁷⁹ 胡晓真，《新理想、旧体例与不可思议之社会——清末民初上海“传统派”文人与闺秀作家的转型现象》，页192。

但是笔者认为，若然将王氏该作全视为一部消闲随性的游戏之作，这种说法未免有欠公允。其一，施作与王作采取的编纂体例不尽相同，施作以清代女诗人的姓名为索引，而王作采用随笔形式书写。两种编撰体例各有特点，并不适合相互比较高低优劣；其二，《燃脂余韵》并非纯然属于男性文人的游戏之作，通过比较该书单行本与《妇女杂志》及《小说月报》相关连载内容的异同，不难发现，王氏在单行本的刊印之前，曾对连载内容有过一定幅度的增删、修改及审订。《燃脂余韵》书中也采用了主题式的记录方法，这也间接反映了作者曾对来源资料进行过筛选、整理及合并的工作；其三，《燃脂余韵》在体例上，本是一部随笔性质的诗话，编者对资料的著录在某种程度上是为读者提供一种“谈资”，在记事的风格上也相对比较轻松灵活，而并不以系统及周密的文学理论贯串其中。然而，编者王蕴章对于该部闺秀诗话资料的收集及考证仍然是十分严谨的，他就曾在著述中指出此前清代诗话中的某些舛误¹⁸⁰，且不遗余力地记载并保存某些稀缺的闺秀文集及作品¹⁸¹，为研究明清女性文学的学者提供了可信且丰富的学术材料。其四，《燃脂余韵》不仅仅是一部单纯的文学选集，它背后更包涵了编者更为深刻的政治隐喻及理想寄托，关于此点，本文第五章将会有更为详细的论证。

¹⁸⁰ 例如王蕴章指出，清代诗人张南山（1780-1859）《国朝诗人征略》一书就误将文人徐朗斋妻子侯氏的诗句归为徐朗斋的创作，见《燃脂余韵》，页649-650；又如袁枚《随园诗话》误将闽县女诗人张宛玉的丈夫朱豹章记录为黄莘田，见《燃脂余韵》，页696。

¹⁸¹ 例如王蕴章就在《燃脂余韵》中辑录了《吴中十子诗钞》中所收录的闺秀作家及其作品，见《燃脂余韵》，页676-677；又如王氏对关雎《梦影楼词》集中词作的收录，见《燃脂余韵》，页668。

第四章 从《燃脂余韵》看王与时人的交游状况

在前两章中，笔者大略介绍了《燃脂余韵》一书的成书经过及内容、编者王蕴章的编撰策略以及文学观念，大致来说，以上所探讨的内容仍较为直观。而在本章，笔者将尝试考察《燃脂余韵》中对时人闺秀作品记载，并结合《妇女杂志》及《小说月报》中的相关刊载情况，梳理王蕴章与“春音词社社友”以及“女界治学先锋”两大代表团体之间的交游状况。一方面，虽然《燃脂余韵》因其随笔性的诗话性质，往往被研究近代词社以及女性教育史的学者所忽略，然而书中的关于其与时人交往情况的相关记载均源自第一手资料，具有相当的可信度，应该可为相关研究提供有参考价值的史料。另一方面，《燃脂余韵》的编撰者王蕴章本身也可以被视为一个阅读对象，诗话的相关记载忠实地再现了他与时人的交游状况，本章将以王蕴章作为一个例子，一观身处于时代交替的旧派文人是如何在致身推动及保留旧体文学创作的同时，也积极参与在民国教育体系，尤其是女性教育体系的建构过程中。

一、春音词社社员及其家眷

（一）春音词社背景介绍

春音词社乃民国四年，1915年于上海创办的文人词社。关于春音词社的发起与创立，参考现存资料，周延初著《吴兴周梦坡先生年谱》及王蕴章本人在《同声月刊》创刊号发表的〈春音余响〉¹⁸²一文，共有两种说法：根据前者，一说为周庆云于民国四年（公元1915）创立；根据后者，另一说则为王氏与陈匪石共同发起创设。而学者杨柏岭另外结合赵尊岳《蕙风词史》相关记录，于《词学》第18期所发表的〈春音词社考略〉一文中的考证则指出：“综合上述材料，可以这么说，王蕴章、陈匪石为词社的倡议者，著名儒商周庆云则是经济上的主要保证者，他们皆可谓词社的发起者、创立人。”¹⁸³另一方面，关于词社成员名单及其先后入

¹⁸² 王蕴章，〈春音余响〉，《同声月刊》第1卷创刊号（1915年），页178-180。

¹⁸³ 杨柏岭，〈春音词社考略〉，收录于邓乔彬等主编，《词学》第18期（上海：华东大

社顺序，《吴兴周梦坡先生年谱》与《春音余响》中的相关记录也稍有出入，根据王氏的记载，“一时同社者，有虞山庞槩子、长洲吴瞿安、湘潭袁伯夔、新建夏映庵、杭县徐仲可、乌程周梦坡、番禺潘兰史、长洲曹君直、通州白中磊诸公。最远者为陕西李孟符、最少者为义甯陈彦通，特二君不常在沪，偶一莅沪，加入社集耳。最后加入者，为吴江叶楚伦、临桂况夔笙、侯官郭啸麓、淳安邵次公、闽县林子有、丹徒叶荭渔、香山杨铁夫及林铁铮，黄公渚等，又更其后加入社也。”¹⁸⁴春音词社的发起人奉朱祖谋为社长，疆村以“春音”为社名，是取“互相劳苦”¹⁸⁵之意，关于这点，现存资料中的记载都是一致的。

根据学者杨柏岭的考证，春音词社前后历时三年，共计有十七次集会，每次集会皆设有社题，社员也多有词作¹⁸⁶。根据王蕴章《春音余响》一文，“十余集后，槩子病故，映庵长浙江教育厅长，遂渐成阑珊之态。梦坡尝哀社集所作，欲镂板问世，属余编次，未竣而梦坡又以癖疥之疾，忽作古人！今社稿亦不可问矣！”¹⁸⁷由此可见，春音词社社员兼资助人周梦坡曾试图搜集词社社员的词作，嘱咐王蕴章编辑次第、集结成书，而由于社员相继因病离世或调职离开沪上，词社的集会状况渐呈疏散之态，而社员的词作也多亡佚。

虽然春音词社的集社盛况只有短短三年，但该社为常驻沪上的词人之间提供了交际往来的机会与便利，通过游览集社活动以及对同一主题的吟咏唱和，促使词人之间建立了一种共同的身份认知。作为春音词社的一员，王蕴章的《燃脂余韵》中亦不乏对词社成员及其家属女眷文学活动的记载。

（二）徐珂（1869-1928）

徐珂，字仲可，浙江杭州人，师事周茗湄、谭复堂、宗啸吾、俞小甫¹⁸⁸，1902

学出版社，2007），页 159。

¹⁸⁴ 王蕴章，《春音余响》，页 178。

¹⁸⁵ 王蕴章，《春音余响》，页 178。

¹⁸⁶ 关于春音词社的十七次集会情况及现存词作，见杨柏岭，〈春音词社考略〉，页 162-166。

¹⁸⁷ 王蕴章，《春音余响》，179。

¹⁸⁸ 郑逸梅，《南社丛谈》，页 230。

年至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编辑，此后多在沪上¹⁸⁹，他有《历代白话诗选》、《古今词选集评》、《清词选集评》、《清稗类钞》等著作。根据上引王蕴章〈春音余响〉所述，徐仲可应是第一批加入春音词社的词人之一。《燃脂余韵》第四卷中载有两则与徐珂女眷相关的笔记，一则为其前室朱夫人蓉笙，一则为其女公子徐新华（1894-1914）。

徐仲可前室名朱承芳，字蓉笙，根据《燃脂余韵》的记载，朱氏为胥山老农砚臣先生淑女，与徐珂结缡三载，后因瘵疾卒，逝前自毁其稿，仅有五律四首（〈送春〉、〈登楼〉、〈怀甯甫大弟〉、〈晓泊〉和外子）存于《国朝杭郡诗三辑》中¹⁹⁰。王氏采用摘句式记录法，摘录了朱氏四首五律中的佳句，并评曰：“俱可颂也。”除了《燃脂余韵》，朱氏诗作也反复刊载于王氏所编辑的两本民国杂志中，早于1912年11月《小说月报》第3卷8号〈文苑〉栏“诗选”中便刊有朱氏五律四首，其后《妇女杂志》创刊号〈文苑〉栏“诗选”亦同样载有此四首诗作，并在其后附有王氏关于朱氏生平的简略记载，内容与《燃脂余韵》的记载大致相同。

另外一则关于徐仲可次女徐新华（字彤芬）的笔记，内容则相对丰富。徐新华为朱氏所出，王氏称其：“年少多才，所作《彤芬室笔记》¹⁹¹，多通达语。诗不多作，最工六朝人书，作画亦有悟入处。”¹⁹²而其少年早夭，年仅二十一岁便匆匆辞世，《燃脂余韵》亦记载了其因孝侍母疾而染病辞世的过程：“仲可先生继室何墨君主持教育有年，偶患猩红热症¹⁹³，就医于上海公立医院。新华侍疾唯谨，何夫人愈而新华病传染，竟以不起，闻者多悲之，钦其孝，伤其早慧而不寿也。”¹⁹⁴王氏继而记录了徐仲可为其女所作悼词《青衫湿编·视次女新华殡所作》¹⁹⁵以及

¹⁸⁹ 杨柏岭，〈春音词社考略〉，页161。

¹⁹⁰ 王蕴章，《燃脂余韵》，页774。

¹⁹¹ 徐新华《彤芬室笔记》先后刊载于《妇女杂志》第一卷2、3、7号。

¹⁹² 王蕴章，《燃脂余韵》，页774。

¹⁹³ 关于徐新华病逝的原因，王氏的记载与徐仲可为其所作〈青山湿遍〉词之小序所载略有出入。根据徐序，新华所染之猩红热乃源于医院邻房，而非其后母何墨君。见（清）徐珂，〈青衫湿编·视次女新华殡所作〉，〈文苑〉栏，《小说月报》第5卷第8号（1914年），页5。

¹⁹⁴ 王蕴章，《燃脂余韵》，页774。

¹⁹⁵ 徐仲可〈青山湿遍〉一词作于新华逝后半年，最早刊于1914年11月25日5卷8号《小说月报》〈文苑〉栏中。《小说月报》该篇较王氏《燃脂余韵》所载更为完整，前附有小序，并于词作中夹有徐氏自书之注脚，王氏则删减二者。以下附录《小说月报》徐

新华同学名陈客者所作之《哭新华》诗二。

徐新华少年辞世故令人慨叹，徐珂的挚交好友也纷纷将哀悼之情寄以诗词以示慰唁，例如与徐珂自作《青衫湿遍·视次女新华殒作》刊载于同一期《小说月报》〈文苑〉栏中即有夏敬观所作《仲可丧其女新华书此慰唁》、《新华女士能文章善书法常写余诗一卷余从北归新华方歿仲可以写诗示余相与怆然》五古二首以及季迟所作《题仲可先生贤媛新华女士遗著》七古一首。

王蕴章亦曾作有挽词《百字令》一首，虽不见于《小说月报》，但附录于1915年《妇女杂志》创刊号〈杂俎〉栏庞槩子著《今妇人集》“徐仲可女公子”条后。庞槩子在该条笔记中亦略述徐新华家学文采以及侍母疾而染病辞世的过程，并将徐新华与明末才女叶小鸾的身世相比，作有“海外何来不死药，人家空有返生香¹⁹⁶”挽联一副，王氏挽词即附录其后：

飞琼瞥影，叹芝焚蕙刈，古今如此。寸草春晖无恙在，翻遣红心先死。翡翠晨吟，琉璃暝写。明月前身是，玉箫吹梦，玉台佳句堪记。

氏原作，供读者参考：

此纳兰容若自度腔，（原注：纳兰词作青衫湿，朱和义新声谱作青衫湿编）周稚圭、王少鹤、王半塘、况夔笙诸先生尝先后拟之。新华为予次女，（原注：长女榴视新华尤慧，惜三岁而夭，瘞于余姚未归葬也）生于余姚，时为清光绪二十年五月十六日。以民国三年四月三十日（原注：旧历甲寅四月初六日）殁于上海中国公立医院，年仅二十有一，伤哉！新华初无疾，以内子丹阳何墨君病喉，就诊医院，往侍汤药，母瘳而新华惫甚。会邻房有患猩红热（原注：我国谓之喉痧）者，新华遂传染，西药不效，竟死，殁于锡金公所，今半载矣，薄暮往胝，归而继声。

闲阶伫立，招魂此际，与酌椒浆。一霎昙花隐见，费人间、几许斜阳。又哀蝉、落叶近昏黄。镇伤心、相对卷菴草。（原注：皮日休《伤女诗》：惟余卷菴草，相对共伤心）黯秋灯、更断无肠。怕检丛残遗稿（原注：新华有文一卷日记一卷及所作书画），宵分墨泪淋漓。

缥缈玉京幽梦，可曾回首，冷月钱塘。（原注：先大幅印香府，君先妣陆淑人、前室朱恭人均葬杭州灵隐之龙门山。今拟俟儿子新陆，自法返国，命其送枢归葬先墓之侧。）我亦西风身世，孤吟倦、两鬓吴霜。叹年来、尘海恨茫茫，愿他生、莫被兰因误，问骖鸾、欲驻何乡。怅望人天永隔，凭谁共话沧桑。（原注：比岁以来，新华慨念世变，颇具厌世观，校课之暇，辄览佛经，且时与予纵论时事，言多中肯，略无虚懦之气，今已矣，萧斋寂坐，畴可与语，惟观书自遣而已，悲哉！）见（清）徐珂，〈青衫湿编·视次女新华殒所作〉，页5。

¹⁹⁶ 庞树柏著，内史程灵芬注，《今妇人集》，收录于〈文苑〉栏，《妇女杂志》第1卷第1号（1915年），页7。

最念唐韵未成，苍茫独立，虎背荒山倚。应为情多才学佛，五浊浮浮提轻弃，世尽言愁，才原非福。一现优昙耳，拈花归也，姓名早注仙史。右调百字令。¹⁹⁷

该首《百字令》共分上下两片，上片用“飞琼瞥影”、“芝焚蕙刈”点出徐新华正值妙龄却少年早逝之事，一句“古今如此”，将其不幸身世与自古才情卓越却红颜早凋的薄命才女相较。“寸草春晖无恙在”，该句点出徐新华孝侍母疾，母亲无恙痊愈，而孝女却身染顽疾、不治离世的悲痛事实。“翡翠晨吟，琉璃暝写”是对徐新华琳琅文采的赞誉之词。上片末句王氏将徐新华的前世譬喻为南朝《玉台新咏》的编者徐陵序中所书的“倾国倾城、无对无双”的“丽人¹⁹⁸”，王氏词中“玉箫吹梦”句即将徐新华比作这位从秦穆公女儿弄玉处习得箫技的丽人¹⁹⁹。“加以天情开朗，逸思雕华，妙解文章，尤工诗赋。琉璃砚匣，终日随身；翡翠笔床，无时离手”²⁰⁰，徐陵在《玉台新咏》序中对这位丽人的才情称誉如此，王氏借此典故表达了对徐新华容貌与文才的称许。

该词下片首句仍表达了王氏对徐新华才情卓越却未能创作更多传世佳作的惋惜之情。根据徐珂《青衫湿遍》的词中自注，其女新华近岁颇有厌世之想，于是阅览佛经、参悟佛法²⁰¹，所以王氏词中亦有“应为情多才学佛”等句，所谓“世尽言愁，才原非福”，作者将徐新华的离世视为逝者对烦浊尘世的解脱，以抚慰逝者家属伤痛心情。下片最后一句将新华其人世间短暂的过往譬喻为昙花一现，而最终拈花而归，不过是去往其归属之地罢了。

¹⁹⁷ 王蕴章，《百字令》，见庞树柏著，内史程灵芬注，《今妇人集》，页7。

¹⁹⁸ （陈）徐陵编，（清）吴兆宜等注，《玉台新咏笺注》（北京：中华书局，1992），页2。

¹⁹⁹ 徐陵序中有“传鼓瑟于杨家，得吹箫于秦女”句，见（陈）徐陵编，（清）吴兆宜等注，《玉台新咏笺注》，页2。

²⁰⁰ 见（陈）徐陵编，（清）吴兆宜等注，《玉台新咏》，页12。

²⁰¹ 徐珂《青衫湿遍》“怅望人天永隔，谁与共话沧桑”句后有自注云：“比岁以来，新华概念世变，颇具厌世观，校课之暇，辄览佛经，且时与予纵论时事，言多中肯，略无虚懦之气。”见（清）徐珂，《青衫湿编·视次女新华殡所作》，页5。

纵观全词，王蕴章并没有过多着墨于描写徐新华离世，其亲属及朋友的悲痛哀悼之情，除了对徐氏才情的称赞与惋惜，作者言辞间更倾向于寄愿于入籍仙界、解脱红尘的美好念想，以作安慰之语。

是年，《妇女杂志》1卷12号〈文苑〉栏又再次刊载了数位春音词社社员为徐新华遗作所题之诗词，包括夏敬观《徐仲可女公子新华书画遗册见示率题二绝》²⁰²、况周颐《玉京谣·题徐仲可女公子新华画稿》以及王蕴章《庆清朝慢·题徐仲可女公子新华画稿》词二首。

《玉京谣·题徐仲可女公子新华画稿》·夏敬观

徐仲可以其女公子新华山水画稿二帧见贻，冰雪聪明流露楮墨之表，石谷麓台胜处庶几，具体为谱，夷则商犯无射宫腔²⁰³，即以答谢。

玉映伤心稿，凤羽清声梦里仙云幻。（原注：用徐陵母梦五色云化为凤事）故纸依然，韶华容易凄婉。乍洗净，金粉春华，澹绝处山容都换。瑶源远，湘萍染墨，昭华摘管。（原注：徐湘萍，徐昭华皆工画）

茸窗旧扫烟岚，韵致云林，更楷模北苑。陈迹经年，蟫匿分贮丝茧。黯赠琼，风雨萧斋。带孺子，泣珠尘潜。帘不捲，秋在书画香篆。²⁰⁴

《庆清朝慢·题徐仲可女公子新华画稿》·王蕴章

画月乘鸾，梦云化凤，碧城人去迢遥。玉映当年，红丝小研亲调。认取仙山一角，黛螺分影上生绡。含毫惯，绿窗清课，想见垂髫。

比似吴绫半臂，共西河都讲，茗玉名珣。洗净铅华，还留墨泪痕飘。

²⁰² 见〈文苑〉栏，《妇女杂志》第1卷第12号（1915年），页5。

²⁰³ 〈玉京谣〉为宋朝吴文英自度曲，吴文英曾自注“夷则商犯无射宫”。

²⁰⁴ 夏敬观，〈玉京谣·题徐仲可女公子新华画稿〉，见〈文苑〉栏，《妇女杂志》第1卷第12号（1915年），页8。

为问生来慧业，春风笔底断魂招。伤心处，纯飞香偈，谱入琼箫。²⁰⁵

根据夏敬观词前小序，徐新华遗画的内容为山水画，而虽然夏敬观与王蕴章所作乃题画词二首，但若具体阅读两首词作，词人并未过多着墨于描写画中的景色，词作内容更偏向于称赞作画人的绘画技巧以及表达亲友的追思之情。另一方面，徐仲可以爱女遗画见示友人索题，并没有限题或限韵，然而夏作与王作在用词和典故的运用上，却颇有相似之处。例如在以上两首词作中，两位词人都运用了以下相同的典故：

1、徐陵母梦五色云化为凤事

根据《南史》的记载，“徐陵母臧氏，梦五色云化为凤，集左肩，已而有娠，生陵。年数岁，家人抱以见僧宝志上人，上人以手摩其顶曰：‘真天上石麒麟也。’”²⁰⁶夏词首句“玉映伤心稿，凤羽清声梦里仙云幻”以及王词首句“画月乘鸾，梦云化凤，碧城人去迢遥”都运用了该则典故，而用以称誉徐新华天赋异禀。

2、徐昭华工画

徐昭华为清代乾隆年间人，是一名工书善画的才媛，曾拜入清初文人毛奇龄（1623-1716）（号西河）门下为女弟子²⁰⁷，毛奇龄曾作〈观昭华画障〉诗称赞徐昭华书法画工：“吾郡闺房秀，昭华迥出尘。书传王逸少，画类管夫人。”²⁰⁸夏词上片末句“昭华摘管”以及王词下片“比似吴绫半臂，共西河都讲，苕玉名珣”都是借用此典故，意指徐新华的画工出众、声名高贵，即好比当年徐昭华一般，受到其业师毛西河的赞许。

在以上两例中，虽然两位词人的遣词不尽相同，但是他们都灵活地运用“徐”

²⁰⁵ 王蕴章，〈庆清朝慢·题徐仲可女公子新华画稿〉，见〈文苑〉栏，《妇女杂志》第1卷第12号（1915年），页8。

²⁰⁶ （唐）李延寿，《南史·卷六十二·列传第五十二·徐孺子陵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页1522。

²⁰⁷ 《燃脂余韵》卷五对徐昭华谒毛奇龄为师亦有记载，毛西河知徐昭华善画蝶，即命题《画蝶》五绝，限东韵，徐昭华立成五绝一首。见王蕴章，《燃脂余韵》，页797。

²⁰⁸ （清）毛奇龄，《观徐昭华画障作》，见（清）毛奇龄，《西河集》卷一百五十四，收录于《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清别集》第1321册（台湾：台湾商务，1983），页17。

姓文人及才媛的典故对徐新华的才情与画工加以称赏，一方面意在光耀徐氏门楣，另一方面，使用徐昭华的典故亦巧妙地呼应了题画词的主题。

除了使用相同的典故外，两位词人在遣词用句上也颇有相似之处。例如夏氏与王氏都使用“玉映”二字用来形容徐新华的文采如玉色映现一般光彩耀人。另外，徐新华所作山水画应该为水墨画，所以两位词人都使用“乍洗净，金粉春华”以及“洗净铅华”之词句用来形容徐氏画作的色彩，或也暗指徐氏超凡脱俗的气质。

在《群体身份与记忆的建构：清遗民词社须社的唱和》一文中，学者林立曾具体分析了须社社员唱酬作品中的互文现象，他指出，这种“共同使用、变化使用的一些话语，也似乎是一些象征身份和思想意识的符码，除了能进一步加强集体内部的凝聚力之外，还可以视为一种身份识别的手段。”²⁰⁹诚然，对徐新华遗画的题词并不能视为一种计划性、集会性的唱酬活动，我们也不必过度解读两位词人使用相同典故背后或有某种伤悼身世的寄托。但是同为春音词社的社员，受邀在友人家眷遗作上题词，本不是一项开放性的公共文化活动，词人通过画作这个交流空间，用文辞安抚逝者家人伤痛情绪、表彰逝者的才情画工，并间接地表达自身的追悼与惋惜之情。

而王蕴章本人也确实对徐新华的才情颇为欣赏，其在《妇女杂志》的编辑过程中，曾多次收录及刊载徐新华的诗文与画作。除了上文提到曾连载于《妇女杂志》的《彤芬室笔记》之外，例如第1卷2号〈文苑〉栏即登载了徐氏的短文〈游飞来峰记〉及〈古意〉、〈秋柳〉、〈园卉未开感成〉诗三首，第2卷1-4期则在刊首〈图画栏〉分别载有〈徐新华女史洛神赋四幅〉、〈杭县徐新华女士画山水〉、〈杭县徐新华女士遗画〉等画作。上述徐新华遗作在《妇女杂志》的刊载时间据其离世已有一至两年，这些资料也必定陆续源自于同为春音词社社员，徐新华的父亲徐珂。王蕴章刊载徐新华遗作的用意，除了肯定与推动女性文学创作之外，想必也是为挚友亲眷的文学作品流传贡献一己之力，以作对友人的宽慰之情。

²⁰⁹ 林立，〈群体身份与记忆的建构：清遗民词社须社的唱和〉，《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2011年第52期，页225。

（三）潘飞声（1858-1934）

根据王蕴章所著《春音余响》，潘飞声（字兰史）亦是第一批加入春音词社的社员之一，其为广东番禺龙溪人，乃海山仙馆潘仕成（1804-1873）之后，祖父和父亲都以倚声名扬粤东，刊有《梧桐庭院词》及《铎影词》。清光绪中叶，随轺海外，掌教德国柏林大学，专讲汉文学。返国后，举经济特科，不应，遂避地海上。

210

王蕴章《云外朱楼集》正编录有《兰寿飞诗记》一篇，篇首谈及潘飞声之为人，说道：“其寓庐曰翦淞阁，诗情酒胆，豪兴无匹，乘海以还，海上诸名流遗老，每举诗社，必邀丈与俱。”²¹¹可见潘飞声性格豪壮不羁，寓居上海时，曾积极参与当时诗坛上的文人集会与活动。

《燃脂余韵》卷五有关于潘飞声夫人及其妾氏的笔记一则，其德配梁霫，字佩琼，南海人，王氏言其“亦工诗”²¹²，著有《飞素阁诗词》，并摘录其《重过海山仙馆有感》七律一首及《寄兰史》诗中“燕子何时相语别？鸳鸯好是不离家”一联。潘飞声另有姬人名月子者，为掌书画，《燃脂余韵》与《兰寿飞诗记》中关于她的记录大抵相同，即值潘飞声年六十时，湘人刘闳青作贺联一事，联曰：“樊榭有佳人，初三月上双修福；放翁真健者，六十年间万首诗。”²¹³

《妇女杂志》5卷5号《文苑》栏亦载有光绪庚子（1900）三月，冒广生（1873-1959）为《飞素阁遗诗》所作之序。冒光生曾与潘飞声及姚绍书同学于广州叶兰台先生门下，根据冒广生的叙述，是年潘飞声刻《飞素阁遗诗》，距梁霫亡歿已有十年。²¹⁴冒广生在序中慨叹历代才女或嫁权贵，或配家奴，才名不传、文采淹没，惟南朝谢氏出谢道韞一人能够名垂青史。²¹⁵而观潘飞声的家阀门第不减南朝王谢

²¹⁰ 郑逸梅，《南社丛谈》，页264。

²¹¹ 王蕴章，《兰寿飞诗记》，《云外朱楼集》正编（上海：中孚书局，1934），页56。

²¹² 王蕴章，《燃脂余韵》，页807。

²¹³ 王蕴章，《燃脂余韵》，页807。

²¹⁴ “往游广州，与潘子兰史、姚子伯怀，同学于叶兰台先生……今年兰史刻《飞素阁遗诗》成，邮以示余，曰，此亡妇梁孺人所作也，子其序之。呜呼，孺人歿已十年矣，悠悠生死，魂魄梦想，兰史之情倪未已乎。”见冒光生，《飞素阁遗诗序》，收录于《文苑》栏，《妇女杂志》第5卷第5号（1919年），页1。

²¹⁵ “余尝批《朱鸟逸史》，慨古今才媛，或归咤利、或嫁厮养，其名淹没，何可胜道。南朝门第，首推王谢，茫茫天壤，乃出道韞，未尝不叹为贵人妻易，为才子妇难也。”

大家，文笔才情相较道韞叔父亦不遑多让，孺人梁霫却和丈夫潘兰史间拥有真挚的感情、尽享闺房唱和之乐，她的诗作更是婉转幽曲、纤细秀美，感人至深。²¹⁶

冒广生此序一是称羨潘氏夫妇伉俪情深，琴瑟和鸣，甚至连谢道韞想求其夫妇生活一日之雅致也未必可得；²¹⁷潘飞声有德配不永年之憾，清代才媛王采薇词作有“落英早谢虑有怜者，何俟颓侵，始舍恒干”一句，反问怜惜英华早凋之人，为何鲜花一定要等到枯萎残败才脱离枝干？冒广生体悟王采薇之辞为佛家解脱之意，并借此安慰潘飞声炊臼之痛；²¹⁸其二也称誉了梁霫的文采，其书写性情，自然真挚，而某些苦吟诗人钻研雕琢，也未必能超越她的成就；²¹⁹三亦肯定了潘飞声对保留并刊刻其夫人遗作所作的贡献，相信梁霫的《飞素阁诗》一定能留名文史。²²⁰

二、女界治学先锋

自1907年清廷学部正式颁布《奏定女学堂章程》，将女学纳入国家教育系统管制始，各地政府更加积极地开始推动地方女学的兴办，除了公立的女子小学及女子师范之外，地方也开设了更多私立女校。这其中不乏女性教育家热心投身教育事业，身先担任这些女子学校的校长。在王蕴章担任编辑《妇女杂志》的数年中，他经常与这些女界先锋书信来往，《燃脂余韵》卷六就曾记载道：“年来操《女志》笔政，得常与海内淑媛，书驿往还。心所服膺者，以侯官沈林步荀、汉寿黄易瑜、浏阳贝李素筠三人为最。”²²¹其中易瑜与李素筠两位女士就曾在湖南地方积极开设女校，担任校长。除了身为女界治学的榜样，她们更是当时享誉文坛的女

冒广生，〈飞素阁遗诗序〉，页1。

²¹⁶ “潘氏閨閔，何減諸王。而蘭史之才，即阿大中郎，猶將卻走，孺人唱隨婉嫵，閨房燕好。”見冒廣生，〈飛素閣遺詩序〉，頁1。

²¹⁷ “而彼謝氏之女，求其一日之雅不可得者”，見冒廣生，〈飛素閣遺詩序〉，頁1。

²¹⁸ “雖欲永其天年，不可兼已，且年亦何必其永也。王采薇云，落英早謝慮有憐者，何俟頹侵，始舍恒干，味其言，儗佛氏之所謂解脫與。此可以塞蘭史之悲矣。”見冒廣生，〈飛素閣遺詩序〉，頁1。

²¹⁹ “孺人所作幽曲纖峭、感人肺腑。蓋雖苦吟雅宗之士，或未能過。”見冒廣生，〈飛素閣遺詩序〉，頁2。

²²⁰ “得蘭史張之，其足以信今傳後無疑也。”見冒廣生，〈飛素閣遺詩序〉，頁2。

²²¹ 王蘊章，《燃脂余韻》，頁819。

诗人，王蕴章亦在《燃脂余韵》中记载了她们的诗文创作。下文将通过《燃脂余韵》的相关记录以及她们在《妇女杂志》相关发表，分析王蕴章与她们的交游状况。

（一）易瑜（1868-1932）

易瑜，幼字湘畹，后字仲厚，号玉俞，湖南汉寿城关镇人，江苏布政使易佩绅（1826-1906）之女，后与秀才黄仲芳结为夫妇，著有《湘影楼诗选》²²²。

《燃脂余韵》卷三有关于易瑜的笔记一则，王氏在笔记中记录了易氏〈题海涵女士诗集〉七绝三首以及〈念奴娇·谢仲实五兄赠砚〉词作一首，其中〈题海涵女士诗集〉第一首写道：“独立平权并自由，放言高论震神州。温柔敦厚风人旨，今见闺中第一流。”²²³王蕴章对这首诗的评论为：“晚近女教日媮，趺驰不羈者，率以欧化为借口，读此诗第一绝，可谓先得我心。”²²⁴由此可见，王氏十分反对当时以欧化为借口的激烈女学改革言论，以及将民国女子教育及课程安排全部照搬欧式的作法，而因此忽略的以秉持“温柔敦厚风人之旨”的传统国学教育。王蕴章在《妇女杂志》的创刊号发刊词中即发表了这种看法，他指出：“粤稽晚近，欧风东渐，发扬踔厉，靡孱稍捐，崇实宏艺，实轶中上。若夫略其致用之的，鹜其凌竞之名，忽其明珠之华，炫其棨饰之宝，步趋强似，甚嚣尘上者，放乎东西，新基肇创，往往有之，无足讳也。”²²⁵王氏认为，在欧风影响下的女子教育改革理论，最近愈发张扬纵横。虽然其主张放弃轻巧艳丽的虚表，强调实用和工艺的教育，但是其中秉持这种欧化理论而叫嚣尘上的教育改革家，往往忽略了“欧化教学”致用的实际功用，只一味追求这种新潮思想的优越感，可谓尚名略实、买椟还珠，并不切实考虑民国女子教育的实际状况。于是，“然而揀正匡迪之以适乎中，其所亟矣”²²⁶，王蕴章认为纠偏与匡正这种做法而使其符合民国女子教育的实情，则为当务之急。其实，王氏并不反对适当地学习取益欧洲女子教学方法，所以〈发刊

²²² 《妇女杂志》1卷6号〈文苑栏〉曾刊载易瑜《湘影楼诗选》六首及《湘影楼词钞》词三首，见〈文苑栏〉，《妇女杂志》第1卷第6号（1915年），页7、9-10。

²²³ 王蕴章，《燃脂余韵》，页706。

²²⁴ 王蕴章，《燃脂余韵》，页706。

²²⁵ 王蕴章，〈妇女杂志发刊词1〉，见《妇女杂志》第1卷第1号（1915年），页1。

²²⁶ 王蕴章，〈妇女杂志发刊词1〉，页1。

词>中他亦有“本杂志有见于是，知殖学之不可缓”²²⁷之言，而他所反对则是秉此“欧化”观念，却犹如邯郸学步一般生搬硬套的理论家，并因此忽略了传统国学在女子教育中应扮演的重要角色。于此观点上，易瑜和王蕴章的观点应该是十分一致的。

王氏在《燃脂余韵》中随后记载道：“仲厚近主汉寿县立女学，具此识解，女墙桃李，固知菁莪棫朴选矣。”²²⁸在宣统元年（1909）开办湖南汉寿私立女子小学之前，易瑜亦曾在1907年间任教于由姚蕴素²²⁹担任校长的南通女子师范，执教修身、国文、历史、地理等科目²³⁰。王氏钦赏其见识与胸怀，相信必定能桃李成蹊，但遗憾的是，易瑜未曾在《妇女杂志》〈论说〉栏中发表相关女校办学经验，我们只能从《妇女杂志》1卷9号〈补白〉页中所刊载的〈汉寿女校第一次运动歌〉的歌词中一窥她的办学理念，“精神活泼技术良，努力莫抛荒；愚化智兮弱转强，增我巾帼光”²³¹，由此可见，易氏创办汉寿私立女校，旨在培育活泼开朗、德智双全、兼备手艺技术的女性英才。

（二）李素筠（生卒年不详）

李素筠，为湖南浏阳私立含章女学初等高等小学校长，《燃脂余韵》第六卷有关于其笔记一则，王蕴章言其“专精小学，宏篇奥著，读《女志》者，当共此钦仰。诗词不多件，录其〈菊花石记〉²³²一篇如下。”²³³诚然，《妇女杂志》曾在1卷1号及2号〈论说〉栏连续登载李氏〈论女子宜通小学〉长篇。根据李氏文中自述，

²²⁷ 王蕴章，〈妇女杂志发刊词1〉，页1。

²²⁸ 王蕴章，《燃脂余韵》，页706。

²²⁹ 桐城姚蕴素（1863-1944），字倚云，乃清末著名文人通州范当世（1854-1905）夫人，于1906年始担任南通女子师范的第一任校长。《燃脂余韵》卷五有关于其笔记一则，摘录其古风两首，见王蕴章，《燃脂余韵》卷五，页807-809。姚氏著有《蕴素轩诗稿》，亦连载于《妇女杂志》1卷3、4、5及10号〈文苑〉栏中。

²³⁰ 陈晓峰，〈姚倚云女子师范教育思想研究〉，《教育学术月刊》2009年第9期，页77-81。

²³¹ 〈汉寿女校第一次运动歌〉，《妇女杂志》第1卷第9号（1915年），页36。

²³² 李素筠〈菊花石记〉一篇亦刊载于〈文苑〉栏，《妇女杂志》第1卷第8号（1915年），页2。

²³³ 王蕴章，《燃脂余韵》，页819。

含章女学初等高等小学创办于“宣统元年（1909）²³⁴”，而该文的写作时间为学校创办后六年（1915）。李氏称其对小学一道最有研究，尚且能自诩为学者²³⁵，而其得以濡染及钻研小学之过程，亦全得益于先夫贝氏一族。在〈论女子宜通小学〉一文中，李氏批评了历来闺秀徒以诗词吟风弄月为事，而忽略了对文字训诂的修养，认为这是女界的一大灾厄。²³⁶而她认为，文字是国学的源泉，而保留国粹必须从文字开始，如果肯在小学上下功夫，不止对学习文字大有帮助，亦有益于道德培养。²³⁷于是，李素筠在文中以从“女”汉字数个为例，详解其形义，并从文字释义上阐发，以作为训导闺阁妇德之根据。

作为女校校长，李素筠亦担任教习国文之教职，《妇女杂志》2卷1号〈国文范作〉栏即刊载了李氏〈教授国文作法之状况〉一文²³⁸。李氏在文中详述了自己教授国文作法的经验，其中不乏许多精辟的见解。例如在“出题后不宣示作意”一章，李氏指出曾见某校教师在教授国文的过程中，出题后即“将题意及作法尽数演讲，并将应用词句标于黑板以示学生”²³⁹，究其原因，则是因为该校每周要求学生国文作文习作两篇，教师为了减轻批改及修正学生习作的负担，便行此方便之法。这样的教习法导致习作千篇一律，而学生的本意并不能在文中尽情发挥。李氏在本文第一章即提出“每周止作一题”的论述，在讲求习作质量的前提下，学生可以尽情发挥文思。于是在此基础之上，她进一步提出教师在出题后一小时之内，不应宣讲题意，而应该由学生自己思考命意和文体的教习法。李氏亦在该文中拟题十二则，以作为含章女学暑期后作文教习之用，而该校学生们根据拟题所作之范文亦陆续被王蕴章采用，刊载在此后《妇女杂

²³⁴ 李素筠，〈论女子宜通小学〉，《妇女杂志》第1卷第2号（1915年），页8。

²³⁵ “惟是小学一道，夙所究心，区区之愚，窃为学者”，见李素筠，〈论女子宜通小学〉，页8。

²³⁶ “闺阁之英，操觚弄翰，徒以吟风弄月为事……此亦女界一大厄矣”，见李素筠，〈论女子宜通小学〉，页4。

²³⁷ “夫文字者，国学之源泉，欲保国粹，必须自文字始”；“如于此（小学）肯为注意，匪惟文字上有莫大之功，即于道德上亦有无穷之益。”见李素筠，〈论女子宜通小学〉，页4、8。

²³⁸ 李素筠，〈教授国文作法之状况〉，见〈国文范作〉栏，《妇女杂志》第2卷第1号（1916年），页1。

²³⁹ 李素筠，〈教授国文作法之状况〉，页6。

志》2卷3至5号的〈国学范文〉一栏中，为读者提供国文自修之范本。

三、小结

《燃脂余韵》是一部断代诗话，相比综合性的女性诗歌总集，编者更为注重对同时闺秀诗人著作的收录。王蕴章身为春音词社的一员，词社社友女性家眷的文学创作自然也被纳入编者的视野。现学界关于春音词社的讨论不脱社友集会唱酬的词作内容，然而除了定期的集会题咏之外，社员相互间的支持与交往亦可以更具私人及家庭性质。如上文所述春音词社社员对徐新华辞世的集体题咏行为，甚至在不限题限韵的前提下，社员词作中不约而同对相同或类似典故以及词汇的使用现象，更加从侧面反映了社员之间感情的纽带。民国初期的女性教育家亦是王氏交际圈中较为活跃的另一群体，除了上文所述之易瑜、李素筠、姚倚云之外，《燃脂余韵》中提及的女界治学先锋另有嘉兴高小女校姚振明女士、上海王元珠等人。女性教育史上定然会有她们光辉的足迹，然而除此之外，《燃脂余韵》亦为她们的文学作品提供了一个保留与流传的空间。

另一方面，身处新旧交替的时代，王蕴章一方面积极参与沪上的各种文学集会，以旧体诗词的创作与社友间唱和交游、文辞悦情，裁定高低、互相砥砺。与此同时，面对新时代对女性教育发展的迫切需求，与海内女界治学先锋书信往来，交流办学经验亦是身为女性杂志主编的关注所在。通过对《燃脂余韵》内容的考察，我们大致可以勾勒出王蕴章与时人的交游状况，读者亦可以清楚地看见身处清末民初的旧派文人，是如何参与于旧传统与新文化相互碰撞的时代潮流中。

第五章 节烈与死亡、气节与革命——王蕴章《燃脂余韵》广采节烈事迹背后之政治寓意

纵观《燃脂余韵》一书，夹杂在对女性诗文的记录中，尚有很多内容是对节妇、贞女、烈妇事迹的记载与书写。更甚者，王蕴章所载女性文学作品亦是关于对其他女性贞烈事迹的记录和表彰。例如第四卷中，王蕴章所录善化和何桂珍（生卒年不详），著有《枸櫞轩诗词钞》，而王氏从该集中摘录的即是何桂珍所作《婢子小红殉难得旌记恩两首》，并附录此两首诗歌的序言，记录婢子小红在都城陷乱时选择投井就义之事的始末。²⁴⁰又如卷五中的一则笔记，王蕴章先是记录了嘉定郑烈妇在夫死子殇后选择不食而死的烈行，随即又著录了吴中十子之一朱宗淑（生卒年不详）为郑烈妇所作的〈烈妇行〉古风一篇。²⁴¹

学者秦燕春曾作有专著论述清末民初的遗民如何借助对晚明义烈人物故事的重写以寄寓政治理想，并通过此种对历史记忆的建构激发民族情绪，为推翻满清政权酝酿革命舆论的种种追忆晚明的行为。²⁴²晚清遗民将明末清初的社会作为当时社会的写照，而他们以对义烈妇女事迹的发掘与表彰寄托政治寓意的传统，同样也可以上溯至清初文人的笔下。学者李惠仪即以清初文人对 1645 年扬州屠戮时死难烈女的表彰为研究主线，考证了方志及诗文中，清初男性文人为烈女钱淑贤、史八夫人、卓烈妇等殉难妇女所作之墓志铭、传记、诔文、诗词等作品，分析其中所隐藏的政治寓意。作者指出，明清鼎革之际殉难女子之“死节”，往往被赋予“忠贞”的政治寓意。文人将被虏劫女子描绘成为亡国劫难与耻辱的表征，并往往通过妇女的绝烈行为以反衬士大夫的不振。而无论以上这些文人的政治立场、出处如何，都能从这些从容赴难的烈女事迹中营构政治意义。²⁴³笔者认为，

²⁴⁰ 见王蕴章，《燃脂余韵》，页 744。

²⁴¹ 见王蕴章，《燃脂余韵》，页 802-803。

²⁴² 相关论述，请参见秦春燕，《清末民初的晚明想象》（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²⁴³ 见李惠仪，〈性别与清初历史记忆——从扬州女子谈起〉，《台湾东亚文明研究学刊》2010 年第 7 卷第 2 期，页 289-344。

若将《燃脂余韵》广录节烈作品的做法纳入此种遗民对烈女文学记录与书写的大传统下，或许可以以此为切入点，解读编者王蕴章的某些政治立场。

一、辛亥革命前后对于明季殉烈妇女事迹的书写及其政治寓意

晚清社会上一直口耳相传着“十不从”或“十不投”的说法，这种说法源自民间笔记及野史记载，讲述的乃是满清入关，迫令汉人剃发投诚、服从清制，明礼部尚书金之俊（1593—1670）与清廷斡旋谈判，提出“十不投”的要求，作为自身投诚的交换条件，而其中又以“男投女不投”、“生投死不投”以及“长投幼不投”流传最广。²⁴⁴虽然有关“十不投”的说法并没有确凿的史实根据，但是确实被革命派用以觉醒民族意识、鼓吹民族革命的根据之一，特别是“男投女不投”以及文人对明季殉烈妇女事迹的追述与重写，更被塑造为降志辱身男性的鲜明反差。

1904年《警钟日报》〈史谭〉栏即载有〈妇女不降〉文一篇，记载明清易代之时贞烈妇女殉身之事三则，此文开篇即写道：“秦汉以降，妇女以奇节著闻者，彪炳于史册，然卒未有为民族殉身者，然明季妇女，其志尤坚。”²⁴⁵作者更在小序中引用福州女子邵飞飞〈薄命吟〉中的诗句，说这些诗句至今读来仍然哀怨异常，可见明季妇女之贞烈，并借此讽刺当世降身辱志的男子。²⁴⁶南社倡起人柳亚子（1887—1958）亦曾在《女子世界》上发表〈女雄谈屑〉及〈为民族流血无名之女杰传〉，专门记叙明清之际殉烈女子的事迹²⁴⁷，张扬女性为民族殉身的贞烈形象。同时与柳亚子声气唱和的尚有南社诸君如陈去病（1874—1933）、高燮（1879—1958）、庞树柏等人，他们纷纷著有传记类作品，塑造明季妇女集体为民族殉身、誓死不降的坚

²⁴⁴ 关于对“十不投”说法的具体考证，请参见夏晓虹，《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页114-119。

²⁴⁵ 不知名人撰，〈妇女不降〉，刊载于〈史谭〉栏，《警钟日报》1904年7月13日。见《警钟日报》第三册，收录于罗家伦主编，《中华民国史料丛编》（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68），页1285。

²⁴⁶ “明季之时，妇女尚如此，男子安可逢。”〈妇女不降〉，《警钟日报》1904年7月13日，见《警钟日报》第三册，页1285。

²⁴⁷ 亚庐（柳亚子），〈女雄谈屑〉，《女子世界》第9-10号（1904年），〈为民族流血无名之女杰传〉，《女子世界》第11号（1904年）。转引自夏晓虹，《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页124。

贞形象。²⁴⁸

以上所叙述的乃是辛亥革命前，文人对于明季妇女殉烈事迹的重写与宣扬，这种对于“男降女不降”的借题发挥，正是当时的革命份子以文学而鼓吹革命，为推翻满清的革命风暴酝酿民族情绪，以及为激发男性所塑造的宣传舆论。虽然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但是时局仍然动乱不安，后来又相继发生了二次革命、洪宪称帝等政治事件，文人并没有就此停止对义烈妇女的褒奖，虽然此中的政治寓意已并不在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但殉节妇女事迹所代表的“气节”仍然是文人希望借以匡正世风的精神纲领。

以文学而鼓吹革命，不只是对于义烈女性事迹的搜罗与重写，甚至连女性文学本身也沾染了某些政治色彩。我们不妨借鉴 1912 年 11 月，同为南社成员凌景坚（1895-1951）为《近代闺秀诗话》²⁴⁹所作之序中的内容，来看看女性文学在当时的政治及社会语境中扮演了如何的角色：

今日之号称诗人者，大都出处不臧，腆颜虏廷，及夫沧桑更迭，失所凭依，往往赞颂旂裳，诋讥民国，实华夏之罪人，亦炎黄之逆子。其尤无耻者，谄媚当途，揄扬权要，视共和之公仆，如专制之帝皇。大义不明，根本先拔，何况风骨猥鄙，吐属淫哇，虽有文采，宁堪称述耶？²⁵⁰

凌景坚在这篇序中指责当时所谓“诗人”者，在政权动荡之际，立场不坚，先是誓忠清廷，继而诋毁民国，更有献媚于袁世凯（1859-1916）者。凌景坚斥责这些政治立场摇摆不定的诗人为“华夏之罪人，亦炎黄之逆子”，这种批评显然基于反满之种族革命的论调之上。而为何凌氏要借为女性诗话所作之序而抒发自己的愤懑之情，或许他认为，相较于这些“风骨猥鄙、吐属淫哇”的所谓“诗人”，某些女性诗人其人其作更具风骨与气节。

²⁴⁸ 关于对南社社员有关明季妇女殉烈著作的考证，请参看夏晓虹，《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页 120-126。

²⁴⁹ 《近代闺秀诗话》的作者不详。

²⁵⁰ 凌景坚，〈近代闺秀诗话序〉，见《南社史长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页 313。

而如本文第三章所述，王蕴章在《燃脂余韵》的凡例中曾注明，“惟节烈之作，广为甄采，匪云有裨阴教，庶几少挽颓风”，²⁵¹当然，王蕴章并没有具体解释何谓“颓风”，但是以一部以记载女性诗文为主、且为“以资闲谈”之用的笔记体女性诗话，却要担当起“拯救颓风”的社会教化功用，实在包含了作者更为深刻的理想及寓意，这也是笔者试图在本章论述的重点所在。

二、《妇女杂志》中有关节烈妇女的议论及记叙

《妇女杂志》1卷8号曾在〈论说〉栏刊载清代女诗人施淑仪（1877-?）所作〈对于烈妇殉夫之感言〉一文²⁵²，与王蕴章一样，施淑仪同样编有女性诗话《清代闺阁诗人征略》一部。她在该文开篇即感叹自己在编纂《清代闺阁诗人征略》一书的过程中，发现各类传记对于烈妇贞女尤为表彰的现象。她指出，这种着重表彰烈女贞妇的时代风气近来越发偏激，女学界中已有不少女性行殉烈之举，而文人学士更是从旁煽风点火、助长波焰，她认为这种违逆常情的做法应该稍加改革²⁵³，于是继而从平等学说、人道主义、国家思想、人格修养等各方面论证，阐述殉夫陋俗实为不当之观点。

作为《妇女杂志》的主编，对于刊物文章的编选与刊载的同时，亦担负了刊物理念及其对女子教育所产生的影响之重责。若诚然如王氏所称，《燃脂余韵》广录节烈之作的目的乃“有裨阴教”，而施淑仪〈对于烈妇殉夫之感言〉一文又是王氏担任《妇女杂志》主编辑期间，唯一一篇登载在杂志上、有关对妇女殉烈问题讨论之文章，那王蕴章本人对于妇女殉烈行为正当与否的看法着实显得有些矛盾。笔者认为，王蕴章所谓“有裨阴教”并不是鼓励当时女性对殉烈行为本身的盲目模仿，而是对这种义烈之举背后所寓意精神的效法。

除此之外，《妇女杂志》在〈文苑〉及〈行传〉栏中亦陆续刊载了许多男性文人所

²⁵¹ 王蕴章，〈燃脂余韵凡例〉，见王蕴章，《燃脂余韵》，页627。

²⁵² 施淑仪，〈对于烈妇殉夫之感言〉，见〈论说〉栏，《妇女杂志》第1卷第8号（1915年），页5。

²⁵³ “晚近风气渐开，矫激之风，宜可稍革。乃女学界中以殉烈闻于世者，亦已不乏其人。而文人学士，尚从而煽扬其波焰，岂其劫数犹未尽焉？”见施淑仪，〈对于烈妇殉夫之感言〉，页5。

作之贞女节妇的行传。学者胡晓真曾论及《妇女杂志》〈文苑〉栏收录女性文学作品渐成败像的情况：“〈文苑〉所录之文，几乎都是贞女传、节孝传之属，妇女诗词反而成了可有可无的点缀。”²⁵⁴她认为，文人的写作大宗本来就是祝寿、墓志或传记类型的文字，而〈文苑〉栏转向收录这一类型的文章，只是回归传统的做法。其实若然仔细阅读这些所谓文人写作大宗之贞女、节孝传，男性文人往往在其中附以一定的政治寓意，以下为笔者整理历年来收录于《妇女杂志》中贞烈妇女传记中的相关论述：

刊载于《妇女杂志》1卷7号〈文苑〉栏的〈周烈妇传〉，作者丁逢甲（1864-1929）有如下议论：“晚近来从容就义，视死如归之奇行，往往不钟于须眉，而钟于巾幗。”²⁵⁵刊载于《妇女杂志》2卷9号〈文苑〉栏的〈刘烈妇传〉，作者王师愈议论道：“自清室之季，我国叠遭大变，而名节扫地以尽，保留而爱嗇之者，或往往出于妇人，岂天地之正气，固有郁极而必发者也。悲夫，烈妇之烈，其足励世矣。”²⁵⁶刊载于《妇女杂志》3卷6号〈文苑〉栏的〈向烈妇篇〉，作者陈大纲作诗十解，其最后一解总结道：“新学日昌名节卑，莫谓匹夫匹妇经沟渎。试问见危致命古今几男儿。”²⁵⁷

刊载于《妇女杂志》4卷11号〈文苑〉栏的〈书唐烈女〉，作者吴恭亨（1857-1937）有如下议论：“呜呼，自庚子联军入京师，百执事之臣，仓皇奔走，殉社稷者寥寥无几，闻乾坤节义之气，疑若割剥无余，而山谷之细民，乃有烈女，夫伯夷叔齐，非有臣史之责也，而圣人许其死。夫妇之义，犹君臣也，断脰一暝，皎然无疵。烈女今虽死而不死矣。虽然吾特以恶夫天下之临大节而首鼠不决者，故亟书之。”²⁵⁸

²⁵⁴ 胡晓真，〈文苑、多罗与华发——王蕴章主编时期（1915-1920）〈妇女杂志〉中“女性文学”的挂念与实践〉，《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2004年第12期，页179。

²⁵⁵ 丁逢甲，〈周烈妇传〉，见〈文苑〉栏，《妇女杂志》第1卷第7号（1915年），页5-6。

²⁵⁶ 王师愈，〈刘烈妇传〉，见〈文苑〉栏，《妇女杂志》第2卷第9号（1916年），页6。

²⁵⁷ 陈大纲，〈向烈妇篇〉，见〈文苑〉栏，《妇女杂志》第3卷第6号（1917年），页6。

²⁵⁸ 吴恭亨，〈书唐烈女〉，见〈文苑〉栏，《妇女杂志》第4卷第11号（1918年），页1。

总结上述文人的言论，他们都大力褒奖乱世中女性视死如归、英烈殉节的奇行，并以此作为对比，批评了清季以来，男性在遭逢变乱、面临大节选择时，首鼠两端、犹豫不决的怯懦行为。特别是南社社员吴恭亨在〈书唐烈女〉一文中，更明确地指出此作所要批判讽刺的对象，即适逢庚子八国联军入京之乱，仓惶奔走逃命，而不能殉国尽节的执事之臣。文人将夫妻纲常比作君臣之义，女性的节烈操行自然在此风雨飘零之世，成为激励男性积极为民主理想而奋斗献身的榜样。

三、从王蕴章戏曲创作中对贞烈的书写看其政治理念

虽然王蕴章属于南社早期社员，但他并非被学界视为鼓吹革命的积极份子，但是若然我们结合他自身的文学创作以及其编辑事业加以考察，不免还是能从中看出他的某些政治立场。学者张晖就曾指出，在王蕴章担任《小说月报》的总编辑期间，他身边就集结了一群以南社成员及以遗民自诩沪上文人为主的古典诗词创作群体，并在《小说月报》的〈文苑〉栏上大量发表诗词。虽然这些文人的文学立场不尽相同，但“无论是哪一派的作者，即使他们之间存在着文学分歧，但都笼罩在同一种情绪下：家国之悲。”²⁵⁹学者于佩灵更补充论证道，王蕴章在从事《小说月报》编辑期间，于辛亥革命前后刊载的诗词创作并非纯粹依据个人的文学鉴赏力与品位，于佩灵说他“宁舍诗词之美，而以对清朝之态度为编辑裁选之方针”。²⁶⁰除此之外，王蕴章本身也有戏曲作品〈碧血花传奇〉刊载于《小说月报》第2年临时增刊中，这篇戏曲的本事出于余怀（1617-1696）《板桥杂记》所录孙武公及葛瑞芳之事，而王氏对其内容大加补充及增改，除了剧中大量慷慨激昂的曲辞及念白之外，更安排葛瑞芳持刀突刺主将，并授予她“女荆轲”之名。²⁶¹于佩灵指出，在晚清革命份子的语境中，“女荆轲”刺秦之举实则暗寓“刺清”，而王蕴章〈碧血花传奇〉之所以有如此情节安排，应该可以视为他隐隐然鼓励“刺清”行为的另一证明。²⁶²王蕴章在《碧血花传奇》最后一段借李十娘之口，评价孙、葛

²⁵⁹ 见张晖，〈新时代与旧文学——以民初〈小说月报〉刊登的诗词为中心〉，页50。

²⁶⁰ 见于佩灵，〈辛亥革命前后〈小说月报〉对“遗民气节”的想象与认同〉，页310。

²⁶¹ 见于佩灵，〈辛亥革命前后〈小说月报〉对“遗民气节”的想象与认同〉，页312。

²⁶² 见于佩灵，〈辛亥革命前后〈小说月报〉对“遗民气节”的想象与认同〉，页313。

二人的殉烈行为，点明这段故事除了可作为一段佳话流传之外，更有为“我辈”阐扬义烈的意义。²⁶³于佩灵认为，“我辈”指与王蕴章一样认同义烈行为的人，而王氏凭借自身《小说月报》主编的权利，有意借杂志这个公开、开放的传播工具，创造一个给“我辈”以文学来阐扬义烈的舆论空间。²⁶⁴

《碧血花传奇》向来被视为王蕴章戏曲作品中的代表作，受到学者的研究与关注²⁶⁵，实际上，除了《碧血花传奇》外，王蕴章也曾著有其他戏曲创作，其中对女性贞烈的叙述和撰写，亦可视为其政治理念的佐证。王氏曾作有《香桃骨传奇》一篇，刊载于《中华小说界》1915年第6期〈传奇〉栏中，该剧是根据清人钮琇（？-1704）（字玉樵）所作《觚剩续编》中〈于家琵琶〉篇中的情节改编而来，《于家琵琶》本是数百字的短篇笔记，而王氏《香桃骨传奇》则将其内容扩张为〈理曲〉、〈跌雪〉以及〈还姬〉三折。这部传奇讲述的是于明末清初李自成起义期间，蒲州于孝廉在战乱中被执，后得李自成麾下牛金星赏识，奉为其子西席。于孝廉有爱妾名红桃者，善弹奏琵琶，技艺超群，亦在动乱中散失，不知所终。事隔两年，闯王兵士进逼北京，在保定城北列营，于孝廉亦随军其中。一晚，孝廉在一帐外闻得琵琶声，识得乃是爱妾红桃所奏之声，遂乃大働扑雪，兵士疑其为奸细，便将其捆绑至帐中。孝廉向帐中人说明个中原因，帐中人即迎出乐姬相见，果然为红桃，三人通宵欢饮，后帐中人更成人之美，将红桃与于孝廉送回蒲州。

钮琇原著的内容本来只是一段才子佳人于乱世中失散又重逢的佳话，但王蕴章在《香桃骨传奇》中将内容扩张，塑造了剧中三位主角生动鲜明的形象。王氏在该传奇后另附有跋一篇，说明该作的创作原委，其中便提到了自己对于三人性格的认知：“红桃之节烈、于生之多情、帐中人之豪侠，非奇而可传者耶？”²⁶⁶实则，在〈于家琵琶〉原著中，钮琇对小说主角的形象塑造，除了于孝廉之多情外，刻画并不十分丰满，而在《香桃骨传奇》中，王蕴章则分别以一人为一折的叙述

²⁶³ 王蕴章，〈碧血花传奇〉，见阿英编，《晚清文学丛钞·传奇杂剧卷》（北京：中华书局，1962），页671。

²⁶⁴ 见于佩灵，〈辛亥革命前后〈小说月报〉对“遗民气节”的想象与认同〉，页313。

²⁶⁵ 秦春燕《清初明末的晚明想象》一书第四章中，也曾论及王蕴章《碧血花传奇》中对《板桥杂记》原文的情节增补是为了凸显晚明悲情，女子“必须殉节”的命运设计。见秦春燕，《清初明末的晚明想象》，页253。

²⁶⁶ 王蕴章，〈香桃骨传奇跋〉，《中华小说界》第6号（1915年），页11。

主角，分别塑造了三人节烈、多情、豪侠的人物形象。

举例而言，〈于家琵琶〉并没有事先交代红桃离散后的行踪，直到故事发展到于孝廉于帐外听到琵琶声后，读者才了解红桃原来亦是闯王部下所虏。而在《香桃骨传奇》中，王蕴章在第一折〈理曲〉就直接交代了红桃和于生离散，且被闯王部下所虏之事，并借主角红桃之口，自述事情始末。王蕴章笔下所表现红桃的品格是十分坚贞刚烈的，她自白道：“闯贼几度相犯，都被我用计自脱”、“万一于郎已遭不测，奴家岂不腆颜偷生么？”²⁶⁷更甚，两个小厮以“我们大王不日真要封王拜爵，你稳稳是一位王妃了”等语劝诱红桃就范，却被红桃以“我魂一缕要将正气扶……明珠碎明珠，报故夫，罗襦裹罗襦，杀贼奴”²⁶⁸的刚烈自白所吓退。

除此之外，〈于家琵琶〉中第三位主角本无姓氏，只以“帐中人”称之，钮琇也并未具体交代该人的身份。而王蕴章在《香桃骨传奇》中则为此人取名为“甄雄风”，寓意“真雄风”，并安排其身份为闯王麾下一员弁将。此角一开场就述以郁郁不得志之自白，感叹自己“文通诸子百家、武晓六韬七略”²⁶⁹，却只能屈就于闯王部下，而不能如唐末动乱时起兵之钱繆（852-932）一般，封王授爵²⁷⁰，成就一番事业。甄雄风更在醉酒后自称要效仿东汉末年击鼓骂曹的弥衡（173-198），一解胸中闷气，王蕴章此处将甄雄风比作弥衡，而其击鼓怒骂的对象曹操自然指“盗弄潢池”²⁷¹的李闯王。甄雄风成人之美，还姬红桃予于孝廉，于生感激之余，更在剧末进言，劝甄雄风应该“诚愿效忠明室，则反戈相向，以一军分捣陕楚，掣张李之肘；以一军西出关外，扼满洲之吭。”²⁷²诚然，王蕴章在剧中拥护的显然是大明王朝的正统政权，甄雄风是其塑造的一个理想人物，而可以在明末乱世这一虚构的剧本空间中实现内剿流寇、外抗清兵，维系明朝政权的政治理想。

从王蕴章对〈于家琵琶〉故事内容的扩充和改写，我们不难看出作者的某种政

²⁶⁷ 王蕴章，〈香桃骨传奇〉，页2。

²⁶⁸ 王蕴章，〈香桃骨传奇〉，页3。

²⁶⁹ 王蕴章，〈香桃骨传奇〉，页8。

²⁷⁰ （唐）钱繆先后被唐昭宗封为越王及吴王，后更被唐庄宗授以金册，自称吴越国王。事见（宋）欧阳修，《新五代史·卷六十七·吴越世家》（北京：中华书局，1976），页835-844。

²⁷¹ 〈还姬〉折中，王蕴章借甄雄风之口，有一段对李自成军中腐败情况的描写。见王蕴章，〈香桃骨传奇〉，页9。

²⁷² 见王蕴章，〈香桃骨传奇〉，页10。

治寄托，特别处于清末民初的动乱时局中，对同样处于风雨飘摇的明末清初时期烈女豪侠故事的重写与修饰，是一种对节义忠良的表彰。在剧本中对明王朝政权的维护及认可，亦是对时下“夷夏之辨”之民族心理以及“驱除鞑虏”之排满思潮的呼应。

四、绍兴陈烈女殉夫一事引发沪上文人的热议

除了散见于<文苑>、<传记>栏的节妇、烈女行传之外，1918年间，旅居沪上、原绍兴籍陈烈女自杀殉未婚夫一事复又引起了一波文人撰稿的热潮，《妇女杂志》是年第9期至第11期的<文苑>栏即刊载了一系列以“挽绍兴陈烈妇”为主题的诗词，作者包括上章所述的春音词社社员徐仲可、湖南汉寿小学校校长易瑜、曾任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部部长的武进人于定一（1875-1932）及陈铎，王蕴章本人亦参与其中。

关于此一系列挽诗词传主“绍兴陈烈女”本人的事迹亦略载于1918年第9期《妇女杂志》中，该期《妇女杂志》于<家政门>一栏后附有传记短文四篇，共占一页篇幅，但其内容与“家政”完全无关，作者不详，题名亦不见于本期杂志的目录中。该四篇传记分别名为<彤史流芳>、<贞洁可风>、<烈女殉夫>以及<醴泉无源>，每篇的传主皆为某地节妇、烈妇及贞女，内容则为传主贞烈事迹的简短记叙。其中第三篇<烈女殉夫>的内容即为“绍兴陈烈女”的事迹简述：

上海小南门外里仓桥滨王远甫第四子菁士，上年聘定新北门内老街陈远波之女宛珍为室。尚未过门，菁士年十八，习钱业，以积劳成疾身故。王命人往陈宅报告，詎料陈女闻訃后，即命女仆舀水上楼，擦身洗足，是日天气甚热。伊家中人初不以为意。未几洗毕，即更换衫裤，卧于床上，哭呼其姐至前曰：“与姐别矣。”家人闻此，始知有异，查之已仰药，急延医救治，女坚拒不纳，竟随未婚婿地下矣。此事贞烈可风，且从容赴义，为士君子所难能，实堪钦敬。现已由王氏接枢过门，与菁士同厝丙舍。日

前开追悼大会，海内诗文家，均撰文致奠云。²⁷³

陈烈女仰药殉未婚夫之事曾在沪上文人间掀起一阵热议，除了上引文所载“海内诗文家，均撰文致奠”之外，根据胡适散文〈贞操问题〉一篇中的相关记载，陈氏殉夫一事曾刊载于上海某报上，上海绍兴同乡会所亦曾出征文启，上海县知事也呈文于江苏省长请予褒奖，除了给予“贞烈可风”匾额、以资旌表外，另造具清册、附证明书，且附送褒奖银六元。²⁷⁴

陈烈女之事对于男性文人，除了于社会有“贞烈可风”的风化教育作用，更具有讽喻意义，巾帼若陈烈女尚能从容就义，而此等节义与操行确是“士君子所难能”之行。纵观〈妇女杂志〉上所刊载的挽诗词文，男性文人在笔墨间皆有钦佩烈女节义，而痛恶须眉不具此等胆识与操行之意。

例如徐珂的〈绍兴陈烈女挽诗〉五古律三首就有以下诗句：

其一

越中山水佳，地灵人斯杰。
湖塘百里间，仰目皆绰楔。
巾帼维纲常，大义日月揭。²⁷⁵

其二

陈媛本越娥，旅居久沪涘。
沪俗尚自由，习非遂胜是。
邪波侵闺门，相率风斯靡。
家有掌中珠，一一化蛇虺。
卓哉媛读书，独能识大义。

²⁷³ 不知名人撰，〈烈女殉夫〉，见〈家政门〉，《妇女杂志》第4卷第9号（1918年），页6。

²⁷⁴ 胡适，〈贞操问题〉，见《胡适作品精选》（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页208-209。

²⁷⁵ 徐珂，〈陈烈女挽诗〉其一，见〈文苑〉栏，《妇女杂志》第4卷第9号（1918年），页5。

蓬直弗待扶，橘迁不为枳。
葱茏女贞木，蓬橘差可拟。
沪江方滔滔，砥柱幸有此。
国粹赖以存，亦未伤国体。
自愿从一终，须眉定愧死。²⁷⁶

在第一首诗中，徐珂追溯了越地自古以来便地灵人杰，山水之间随处可见政府为了表彰节烈妇女所立的贞节牌坊的现象，而陈烈女自然如同古来以名节得旌表的贞女烈妇一般，继承山灵水秀之越地的贤婉之气，才有此等昭昭揭日月的殉烈壮举。

在第二首诗中，徐珂首先介绍了陈烈女籍贯本绍兴，而旅居沪上的情况，紧接着转而批评了沪上女性崇尚自由的习俗。当然，徐氏并没有具体解释此种“自由”乃何种“自由”，但笔者认为，徐氏所谓“自由”或许是指女性从“三从四德”的妇德教育中解放，而崇尚之人权自由、男女平权之呼声。徐氏认为这种伴随着女权主义而来的呼声是一种“邪说”，它腐蚀了中国女性自古以来所具有的美德，使大家闺秀一一化为邪狡的“蛇虺”。而此中，只有陈烈女能在“沪江滔滔”的歪风袭涌下坚守大义，独正其身、橘不化枳²⁷⁷，蓬生麻中、不扶自直²⁷⁸。徐氏认为陈烈女的这种精神是乃是对国粹的保留，而男子面对陈烈女的凌然大义，也定会羞愧至死。徐珂笔下所谓“国粹”，一方面或许是指中国女性自古以来的妇德教育，另一方面，若将其置于清末民初士人关于欧风及国学的相关讨论之大环境下，“国粹”亦可以视为“国粹派”文人，如《国粹学报》编者邓实（1877-1951）笔下的“精神国粹”，换言之，即“气节”。²⁷⁹以此看来，徐氏诗中“须眉定愧死”、“我

²⁷⁶ 徐珂，〈陈烈女挽诗〉其二，页5。

²⁷⁷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见（周）晏婴撰，吴则虞校《晏子春秋集释·内篇杂下第六》（北京：中华书局，1982），页392。

²⁷⁸ “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见（战国）荀况撰，北京大学《荀子》注释组注释，《荀子新译·劝学》（北京：中华书局，1979），页3。

²⁷⁹ 邓实（1877-1951），字秋枚，别号枚子、野残等，广东顺德人，为《国粹学报》的主编及灵魂人物。《国粹学报》自1905年2月23日正式发行，刊物内容为介绍西方文

斥是言谬”²⁸⁰之论，显然是具有针对性的批评，即其在《陈烈女挽诗》其三中所描述的“草间得求活、薇尽且续种”²⁸¹之碌碌求存、苟活人世的男性。

同样，于定一〈纪绍兴陈烈妇〉诗中亦有类似的议论，其诗句写道：“我生当叔世，纲常已垂绝。陈氏有奇女，殉夫事何烈”、“良禽惜羽毛，志士念沟壑。爰作烈女行，以此愧末俗。”²⁸²于定一感叹自己身处乱世，纲常紊乱，而陈烈女能在如此乱世之中坚持大义，殉夫之事何其刚烈。而后于氏又将“贞烈”引申为对“气节”的坚守，并运用《孟子·滕文公下》中“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²⁸³的典故，激励读者要像良禽爱惜自己的羽毛一般，保重自身的气节和操守，并要具备在乱世中为正义献身，而毫无悔恨的思想准备。“爰作烈女行，以此愧末俗”，于定一作此首诗的目的不仅为致奠陈烈女，更重要的是要借对其贞烈的褒奖而激起明哲保身之士人的羞愧之心。

刊载于1918年11期〈文苑〉栏，陈铎所作〈陈烈女行〉诗中亦有类似的感叹及议论，其诗句写道：“报纸轰传奇烈讯，骚人争赋断肠诗。吁嗟世道久不古，激励颓风振聋聩。愿移拱墓木连枝，植立中流为砥柱。”²⁸⁴诚如上文所述，陈烈女殉夫的事迹曾刊载于沪上报纸，许多文人都纷纷作诗祭奠。陈铎感叹世道不古久矣，希望借由对陈烈女殉夫贞烈之行的表彰，而在社会上激起振聋发聩，匡正颓风的作用。“愿移拱墓木连枝，植立中流为砥柱”，陈铎显然将陈烈女的义行视为弘扬气节操守的坚固精神支柱，并希望其成为动荡环境中鼓舞人心的一剂强心针。

诸如以上三人，持借陈烈女殉夫一事而寓意“精神国粹”论调的文人层出不

明以及宣传强国思想，与邓实志同道合之国粹诸君有章炳麟、刘师培、陈去病等人，他们主张“国粹无碍于欧化”。邓实认为“国粹”乃一种“立国的精神”，《国粹学报》“附录”栏刊有“正气集”，意在表彰神州之国粹，即杀身成仁、至死不悔之忠臣义士节妇烈夫所持之正气。关于《国粹学报》以及“精神国粹”的具体讨论，请参见秦燕春《清末明初的晚明想象》第三章的相关论述，页163-193。

²⁸⁰ 徐珂，〈陈烈女挽诗〉其三，页6。

²⁸¹ 徐珂，〈陈烈女挽诗〉其三，页6。

²⁸² 见于定一，〈纪绍兴陈烈妇〉，见〈文苑〉栏，《妇女杂志》第4卷第9号（1918年），页6。

²⁸³ （战国）孟子：“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汉）赵歧注：“志士守义者也，君子固穷，故常念死无棺椁没沟壑而不恨也。”（战国）孟子撰，（汉）赵歧注，（宋）孙奭疏，收录于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孟子注疏·滕文公章句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页159。

²⁸⁴ 陈铎，〈陈烈女行〉，见〈文苑〉栏，《妇女杂志》第4卷第11号（1918年），页4。

穷，反映在文学创作中，除了挽诗词之外，还有最为精略的挽联：例如方君叔“名节陵夷，不生侠丈夫，乃仅见奇女子”²⁸⁵、寿孝天“至性乎、至情乎？激叔季之天良，功侔东汉投瓜女；妻道也、臣道也，从夫君于地下，贤比西山采蕨人”²⁸⁶及“问是女何奇，曰殉名同于烈士；有诸君到此，知直道尚在斯民”²⁸⁷、周岷源“为斯世留两字纲常，志决身殁，方信人间有气节”²⁸⁸、萧尔昌“未成妇，先殉夫，力持名教纲常，天姥山高钟间气；欲全贞，便死烈，竞说英雄儿女，春申江上砥横流”²⁸⁹。文人赞赏陈烈女之气节、称誉其义行，将其视为乱世中匡风俗、正纲常的中流砥柱。而将这些言论置于清末民初的时势中，自然又饱含了强烈的政治寓意，这好比当时文人对明遗民故事以及人物一再追忆的热衷一般，对女性贞烈之举的褒奖与书写亦成为鼓舞精神、奋发人心的宣传手段。

王蕴章本人亦作有〈长亭怨〉挽词一首，相较上述所论徐珂、于定一以及陈铎三人的诗作，王蕴章该词的感情基调并不十分慷慨激昂，一方面，限于词这种文学体裁本身的句式和押韵方式，念诵起来本不及诗歌句句铿锵，另一方面，王氏该词的内容更偏向表彰陈烈女之贞劲及抒发自身哀悼之情。虽然如此，读者仍然能在该词中窥见王蕴章对当时社会上欧风东渐的看法，其词中上阕开篇便写道：“正划地欧风墨雨，阴教神州。纤儿争坏，野哭夷歌。”²⁹⁰如同笔者上章所论，王蕴章本人似乎对欧化问题十分关注，虽然他并没有激奋地在词中批评须眉不及巾帼，但是他显然将陈烈妇殉夫一事置于当时社会整体风气的关怀中，尤其是西学东渐对女子教育产生的负面影响。虽然1918年距离推翻满清政权已有一定时日，但是此间先后经历了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洪宪称帝、北洋军阀割据、张勋复辟等事件，时局仍然如王蕴章词中“纤儿争坏、野哭夷歌”所描述的状况一般，小人割据、动荡不安，恸哭四起、人心惶惶。或许此刻对妇女殉烈事迹表彰与书写，

²⁸⁵ “予与方君叔远合挽一联”，见胡复君，《古今联语汇选》第三册（北京：西苑出版社，2002），页362。

²⁸⁶ “乡人寿孝天联”，见胡复君，《古今联语汇选》第三册，页502。

²⁸⁷ “寿孝天先生追悼会大门联”，见胡复君，《古今联语汇选》第三册，页363。

²⁸⁸ “绍兴同乡会董事周岷源联”，见胡复君，《古今联语汇选》第三册，页502。

²⁸⁹ “乡人萧尔昌联”，见胡复君，《古今联语汇选》第三册，页502。

²⁹⁰ 王蕴章，〈长亭怨慢·绍兴陈烈女挽词〉，见〈文苑〉栏，《妇女杂志》第4卷第9号（1918年），页6。

其政治寓意已不复辛亥革命之前，用以强调民族主义，推翻满清政权所带来的强烈精神动荡。但身处此风雨飘摇之时局，妇女之义烈行为依然是文人争相吟咏的重要议题，而其背后所寓意之气节依然被文人寄以厚望，以期其成为黑暗浊世中鼓舞人心、匡正世风的指路明灯。

第六章 结论

一、总结

本文以上共分为五个章节，对王蕴章及其《燃脂余韵》进行了较为初步及宏观的研究。大致而言，论文可以分为两个主要部分：第二章及第三章以《燃脂余韵》为直接阅读文本，分析本书的收录内容及编纂体制；第四章与第五章则是以《燃脂余韵》中的相关记载为例证，考察王蕴章与时人的交游状况以及分析其文学创作背后所隐含的政治立场。

《燃脂余韵》保存了清代女性作家大量的文学作品，开辟了广阔的女性文学场域。在第二章中，笔者即选取“友伴式婚姻”以及“母教”为两个切入视角，并通过对《燃脂余韵》中相关的闺秀诗作及事迹辑录的具体分析，考察《燃脂余韵》中所呈现的清代女性生活以及编纂者意图在书中所建构的女性形象。一方面，笔者以“唱和”及“寄外”这两类次文类女性诗作为例，论述了清代闺秀与丈夫之间“友伴式”婚姻形态的呈现，她们不仅与丈夫在生活上互相扶持，更在精神上与伴侣沟通交流。夫妇以诗词唱和互诉衷情、灵犀互通，并表达出伉俪间共有的审美情趣及生活趣味。面对宦游在外的丈夫，清代闺秀除了在寄外作品中传达相思之情、抒发离别之苦，更不乏在精神上给予配偶支持及鼓励，并适时地提出忠告及建议。另一方面，清代的闺秀也以丰富的学养自觉承担起教育后代及传承家学的角色，除了督导儿女钻研经学历史、诗词文章，母亲也致力在待人处事方面给予后代提点及警训，引导他们迈向人生正途。

《燃脂余韵》是一部以诗文评为体裁的断代闺秀诗话，排除了收录女性诗人地域以及社会身份的限制，若以其收录时段的完整性及资料的丰富性与清代其他的闺秀诗话比较，它堪称其中的集大成者。以内容而论，王蕴章强调不收录“淫靡艳荡”及“仙乩鬼怪”的作品，尤其是不录“仙乩鬼怪”之作的准则，在清代闺秀诗话中可谓独树一帜；以体例而论，王蕴章继承了欧派诗话“以资闲谈”、“论诗及事”的随笔性书写传统，以即时性的记录方式不断补充诗话的内容，具有较高的资料原创性；以编者对女性文学的接受及审美而论，王蕴章继承了“性灵”派学说的诗论观，鼓励女性在诗歌中真实自然地抒发情感，反对刻意雕琢、堆砌

典故。除此之外，王氏亦特别推崇女性雄壮豪迈的诗风，欣赏她们在诗词中所表现出的豁达胸襟及广阔见识。

二十世纪初被视为中国文学的转型期，面对当时社会与文化的剧烈变动，传统文人必须面临的选择是如何在努力保留学术传统的同时，适应当代社会的文化体制改革。若以这些传统文人的交际网络作为重建清末民初文学与文化转移脉络的线索，旧派文人如王蕴章在沪上的文学活动以及他与时人的交游状况即可以被作为一个可取的研究切入点。在第四章中，笔者以《燃脂余韵》中的相关记载为线索，并结合《小说月报》及《妇女杂志》中的刊载文献，分析王蕴章与时人的交游状况。作为一个传统文人，王蕴章积极参与沪上词社的活动与集会，以旧体诗词的创作与社友间声气唱和、互相砥砺。若以春音词社作为个案研究，社友女眷的文学创作即被纳入了王氏编撰闺秀诗话的收录视野，另外结合《妇女杂志》中词社社友及其女眷文学作品的相关刊载情况，笔者亦发现，除了定期主题集会及唱酬吟咏之外，社友间的联系及互动更延展至彼此的家庭生活中；作为《妇女杂志》的主编，王蕴章也对民国女性教育体系的创建与发展情况颇为关注，他与当时社会中创办女学的女界精英频密书信来往，互相交换治学理念与授课经验，并将这些女性教育家的文学作品收录在《燃脂余韵》中。

在第五章中，笔者特别关注王蕴章在《燃脂余韵》中广为采录贞烈妇女事迹背后的初衷。辛亥革命前期，文人即有通过对贞烈妇女事迹的褒奖及宣扬以鼓吹排满情绪、酝酿革命舆论的行为。虽然王蕴章从不被学界定位为一位革命激进份子，但若对他的文学创作（尤其是戏曲创作）及编辑事业进行细致地考察，我们亦可以隐约解读出其中的某些政治隐喻：在清末民初这个政治动荡不安的黑暗时期，妇女义烈行为背后所寓意的“气节”或许就是王氏赖以激励人心、拯救颓风的精神良药。

最后，笔者尝试回应第一章绪论中所提出的设问：《燃脂余韵》是否如学者胡晓真所述，只是编者王蕴章“随手拈来、信手成篇”的作品，而它“难免男性文人猎奇述旧的心态”？²⁹¹

²⁹¹ 胡晓真，《新理想、旧体例与不可思议之社会——清末民初上海“传统派”文人与闺秀作家的转型现象》，页192。

二、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限于时间及精力，本文在一些细节方面尚存在许多值得完善与精进的空间。例如笔者尚未及对《燃脂余韵》中所收录的闺秀作家的人数、身份及地域进行系统的整理与统计。一方面，由于这部诗话本身就不以人物为条目，同一则笔记的内容可能涉及多位女性作家，资料的信息量有时显得非常庞杂，需要大量时间进行细致地区分及归纳；另一方面，虽然王蕴章对大部分女性作家的地域出身都有相关介绍，但是仍有少部分女性作家缺少这方面的信息记载，她们之中有些并不出名、有些甚至姓名不传，虽然有诸如《历代妇女著作考》或《明清妇女著作》这类的资料库可以对其身份进行索引及查证，但并不能囊括诗话中所收录的全部闺秀作家。

除此之外，在论文参考资料的征引方面，一直让笔者深觉遗憾的是王蕴章本人文学作品的资料匮乏。其一，王蕴章并没有个人的诗集或词集刊行，虽然有《南社丛刻》²⁹²及《南社从选》²⁹³收录了他的部分诗词作品，但是数量非常有限。其二，除了《燃脂余韵》之外，王蕴章的文学批评专论尚有《秋云平室词话》²⁹⁴、《梅魂菊影室词话》²⁹⁵以及未刊稿本《梁溪词话》²⁹⁶等，前两部词话的篇幅较为短小，虽然记载了一定的词学资料，但是内容并未过多涉及女性词学的相关论述。若将来时间允许，可以将王蕴章散载于民国报章刊物中的诗词作品及文学论著加以收集及整理，虽然无法再现其毕生文学创作的原貌，但笔者相信，从中一定可以发掘出珍贵的史料，得以进一步论析王蕴章本人的文学观念及创作实践。

进一步而论，虽然笔者行文中间有将王蕴章《燃脂余韵》与其他女性文人，如沈善宝所编撰的《名媛诗话》进行对比，但是这种对比仍然非常初步及浅略。其实，笔者在撰写论文的过程中，曾有如下假设：王蕴章的男性编撰者身份实际

²⁹² 柳亚子主编，《南社丛刻》影印本（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6）。

²⁹³ 胡朴安选录，沈锡麟、毕素娟点校，《南社从选》（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0）。

²⁹⁴ 收录于王蕴章著，《云外朱楼集》正编，页151-161。

²⁹⁵ 《梅魂菊影室词话》散载于《双星杂志》1915年第二、三、四期，《文星杂志》1915年第一期，《春声》1916年第二、三期，共三十则。笔者在论文写作期间，仅仅得见发表于《双星杂志》1915年二、三、四期中的内容。

²⁹⁶ 根据郑逸梅的记载，王蕴章同邑孙伯亮在王氏去世之后，曾试图收购《梁溪词话》稿本，但可惜已被人攫去。见郑逸梅，《南社丛谈》，页104。

影响了他的撰写过程，即以“男性”为思考本位的写作方式。举例而言，笔者在对《燃脂余韵》的实际阅读过程中，发现王蕴章在记载清代闺秀的诗作时，常常由她的男性亲属（父亲、兄弟或丈夫）的相关事迹展开内容的铺叙。甚至在条目内容的安排上，也可能出自编者这种“男性本位”的思维方式：譬如在《燃脂余韵》的第六卷中，有关于“陈葆贞”（号静宜女史）、“陆瑀华”及“陆蕙心”三则连续的笔记²⁹⁷，其中，后二者分别是清代文人陆以湑的妹妹和姑姑。“陈葆贞”看似和后两者毫无关系，但是其实王蕴章此则笔记是完全转录自陆以湑《冷庐杂识》卷八中“静宜女史诗”条中的相关内容。由此可见，王蕴章在编撰过程中，是以“陆以湑”为思维中心，将这三条笔记安排及串联在一起的。

但是，若要证明笔者的如上假设，必定要将男性与女性文人所撰写的诗话，在行文风格及内容安排上分别加以对照及比较，这就需要细致地文本细读，甚至需要对清代笔记和诗话进行地毯式的搜索。

不仅如此，学者甚至可以将男性及女性诗集或诗话中所收录的闺秀作品加以比对，具体来说，就是看同一个闺秀作家作品在不同诗集或诗话中的选录情况：哪一类型的闺秀诗作能受到男性/女性编撰者的青睐？如果男性及女性编撰者确实存在不同的收录倾向和偏好，是否因为他/她们分别具有不同的考量或标准？这种标准的差异是否又和性别有关？然而，具备一定的文学批评理论也是支持以上研究论述的重要依据，这也是笔者在论文写作过程中有所欠缺，仍需要加强的部分。

若没有一个完整的电子资料库以及完善的索引系统，要进行以上的研究工作，想必十分耗时及繁琐。当然，笔者认为，短时间之内，学者或许可以集中精力于小范围的资料整理及比对上，举例而言，王蕴章《燃脂余韵》及沈善宝《名媛诗话》就可以作为两个较为适合的比对文本，因为二者无论在资料的丰富程度以及撰写的体例规范都非常相似，若可以加以横向对比，或许可以回答笔者以上提出的某些设问。

²⁹⁷ 见王蕴章，《燃脂余韵》，页 815-817。

参考书目

中文书目

专书

一、古籍

(汉)毛亨撰,(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疏,《毛诗正义》,收录于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周)晏婴撰,吴则虞校《晏子春秋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82)

(战国)孟子撰,(汉)赵歧注,(宋)孙奭疏,收录于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孟子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战国)荀况撰,北京大学《荀子》注释组注释,《荀子新译·劝学》(北京:中华书局,1979)

(梁)刘勰撰,周振甫著,《文心雕龙今译》(北京:中华书局,1986)

(梁)钟嵘《诗品》,收录于(清)何文焕辑,《历代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1)

(陈)徐陵编,(清)吴兆宜等注,《玉台新咏笺注》(北京:中华书局,1992)

(唐)李延寿,《南史》(北京:中华书局,1975)

(唐)段成式撰,方南生点校,《酉阳杂俎》(北京:中华书局,1981)

(五代)王定保著,《唐摭言》(上海:中华书局,1960)

(五代)孙光宪著,贾二强点校,《北梦琐言》(北京:中华书局,2002)

(宋)苏轼著,《东坡全集》,收录于《景印摘藻堂四库全书荟要·集部》第33册(台湾:世界书局,1989)

(宋)欧阳修,《新五代史》(北京:中华书局,1976)

(宋)晏几道、晏殊撰,张草纫笺注《二晏词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宋)惠洪《冷斋夜话》,收录于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台湾:商务印书

馆，1939)

(明)叶天寥辑，《午梦堂集》，收录于施蛰存主编《中国文学珍本丛书》第一辑(上海：贝叶山房，1936)

(清)毛奇龄，《西河集》，收录于《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清别集》1321册(台湾：台湾商务，1983)

(清)沈德潜著，霍松林校注，《说诗碎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清)完颜恂珠编，红香馆藏《国朝闺秀正始集》，收录于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明清妇女著作资料库》电子版。

(清)茗溪生辑，《闺秀诗话》，收录于王英志主编，《清代闺秀诗话丛刊》第二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

(清)骆绮兰，《听秋轩诗集》，乾隆六十年(1795)年金陵龚氏刻本，收录于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明清妇女著作资料库》电子版

(清)俞正燮撰，涂小马等校点，《癸巳类稿》(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

(清)徐钊，《词苑丛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清)袁枚，《小仓山房诗集》，《袁枚全集》(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

(清)袁枚著，顾学颀校点，《随园诗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清)顾若璞，《卧月轩稿》，光绪嘉惠堂丁氏刻本，收录于麦基尔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明清妇女著作资料库》电子版。

(清)钱泳撰，张伟校点，《履园丛话》(北京：中华书局，1979)

(清)徐乃昌辑，《小檀栾室汇刻闺秀词》，收录于麦基尔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明清妇女著作》电子版

(清)徐乃昌辑，《闺秀词钞》，清宣统元年(1909)小檀栾室刻本，收录于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明清妇女著作资料库》电子版。

（清）鲍之蕙，《清娱阁吟稿》，嘉庆 16 年（1811）年刻本，收录于麦基尔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明清妇女著作资料库》电子版

（清）雷瑛、雷城辑，《闺秀词话》，收录于王英志主编，《清代闺秀诗话丛刊》第二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

（清）蒲松龄撰，《铸雪斋抄本聊斋志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清）蔡殿奇辑，《国朝闺阁诗钞》，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刻本，收录于麦基尔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明清妇女著作》电子版

（清）静寄东轩辑，《名媛尺牋》前润浦氏藏版，收录于麦基尔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明清妇女著作》电子版

（清）静寄东轩辑，《名媛尺牋》，前润浦氏藏版，收录于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明清妇女著作资料库》电子版

（清）戴燮元辑，《江鲍氏三女史诗钞合刻》，清光绪 8 年（1822）刻本，收录于麦基尔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明清妇女著作资料库》电子版

二、今人专著

王蕴章，《云外朱楼集》（上海：中孚书局，1934）

王英志，《袁枚和随园诗话》（台北：万卷楼出版社，1993）

王英志，《性灵派研究》（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

王英志，《袁枚暨性灵派诗传》（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

王力坚，《清代才媛沈善宝研究》（台北：里仁书局，2009）

王英志主编，《清代闺秀诗话丛刊》（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

王英志，《袁枚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王蕴章，《燃脂余韵》，收录于王英志主编，《清代闺秀诗话丛刊》第一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

刘咏聪，《德·才·色·权：论中国古代女性》（台北：麦田出版社，1998）

孙康宜，《耶鲁·性别与文化》（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

- 孙康宜,《文学的声音》(台北:三民书局,2001)
- 孙之梅,《南社研究》(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 阿英编,《晚清文学丛钞·传奇杂剧卷》(北京:中华书局,1962)
- 张宏生编,《明清文学与性别研究》(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
- 罗家伦主编,《中华民国史料丛编》(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68)
- 郑逸梅,《南社丛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 杨天石、王学庄主编,《南社史长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
- 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 钟慧玲主编,《女性主义与中国文学》(台北:里仁书局,1997)
- 钟慧玲,《清代女诗人研究》(台北:里仁书局,2000)
- 胡复君,《古今联语汇选》第三册(北京:西苑出版社,2002)
- 胡适,《胡适作品精选》(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
- 胡晓真,《新理想、旧体例与不可思议之社会——清末民初上海“传统派”文人与闺秀作家的转型现象》(台北市: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10)
- 梁乙真,《清代妇女文学史》(北京:中华书局,1932)
- 夏晓虹,《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 (美)高彦颐著;李志生译,《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 栾梅建,《民间文人的雅集——南社研究》(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6)。
- 秦春燕,《清末民初的晚明想象》(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 (美)曼素恩著;杨雅婷译,《兰闺宝录:晚明至盛清时的中国妇女》(台北县新店市:左岸文化:发行远足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5)

谢无量,《中国妇女文学史》(上海:上海书店,1990)

鲍家麟编著,《中国妇女史论集》(台北市:稻乡出版社,1988)

谭正璧,《中国女性文学史话》(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

蔡镇楚,《中国诗话史》(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

三、近代期刊杂志

《小说月报》(民国期刊)(1910-1920), (上海:商务印书馆)

《妇女杂志》(民国期刊)(1915-1919), (上海:商务印书馆)

《南社丛刻》(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6)

论文

于佩灵,〈辛亥革命前后〈小说月报〉对“遗民气节”的想象与认同〉,《明清诗文研究》2011年第1期,页307-325。

孙康宜,〈明清诗媛与女子才德观〉,《中外文学》1993年第11期,页52-53。

刘咏聪,〈清代女性的课子诗文〉,收录于周愚文、洪进编《中国传统妇女与家庭教育》(台北:师大书苑有限公司,2005),页123-171。

吕凯玲,〈李尚璋、钱韞素合集所见之夫妻情谊——清代友爱婚姻一例〉,《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2010年第50期,页189-217。

李志恒,《袁枚性灵诗说诠释》,嘉义:国立中正大学中国文学所硕士论文,1996。

连文萍,〈诗史可有女性的位置?——以两部明代诗话为论述中心〉,《汉学研究》1996年第1期,页177-200。

张晖,〈新时代与旧文学——以民初〈小说月报〉刊登的诗词为中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4期,页42-56。

李国彤,〈明清妇女著作中的责任意识与“不朽”观〉,《燕京学报》2006年新20期,页55-77。

- 李德伟,〈论袁枚〈随园女弟子诗选〉呈现之诗学观及其在清代文学史上的意义〉,《东华汉学》2009年第10期,页187-225。
- 李惠仪,〈性别与清初历史记忆——从扬州女子谈起〉,台湾东亚文明研究学刊2010年第2期,页289-344。
- 周叙琪,《1910-1920年代都会新妇女生活风貌:以〈妇女杂志〉为分析实例》,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硕士论文,1996。
- 陈建男,《清初女性词选集研究》,台北:国立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硕士论文,2006。
- 杨柏岭,〈春音词社考略〉,收录于邓乔彬等主编《词学》第18期(上海:华东大学出版社,2007),页159-167。
- 陈晓峰,〈姚倚云女子师范教育思想研究〉,《教育学术月刊》2009年第9期,页77-81。
- 林容榆,《〈随园诗话〉中的女性群像研究》,台中:东海大学中国文学系硕士论文,2010。
- 林立,〈群体身份与记忆的建构:清遗民词社须社的唱和〉,《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2011年第52期,页205-245。
- 胡晓真,〈最近西方汉学界妇女文学史研究之评介〉,《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2(1994),页271-289。
- 钟慧玲,〈陈文述与碧城仙馆女弟子的文学活动〉,《东海中文学报》2001年第13期,页151-182。
- 钟慧玲,〈期待、家族传承与自我呈现——清代女作家课训诗的探讨〉,《东海学报》2003年第15期,页177-204。
- 胡晓真,〈文苑·多罗·华鬘——王蕴章主编时期(1915-1920)の《妇女杂志》における「女性文学」という观念とその实践〉,《〈婦女雜誌〉からみる近代中国女性》(东京:研文出版社,2005),页107-131。
- 胡晓真,〈艺文生命与身体政治——清代妇女文学史研究趋势与展望〉,《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13(2005),页27-62。
- 钟慧玲,〈阅读女性·女性阅读-沈善宝〈名媛诗话〉的女性建构〉,《东海中文学

报》2008年第20期，页217-252。

贺晓艳，《明末清初女性作家——顾若璞研究》，上海：上海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2。

(美)康正果，〈重新认识明清才女〉，《中外文学》6（1993），页121-131。

蒋寅，〈闺秀诗话十二种叙录〉，《文献》2004年第3期，页253-261。

温珮琪，《家族、地域与女性选集——梁章钜〈闽川闺秀诗话〉研究》，南投：国立暨南国际大学中国语文学系硕士学位论文：2010。

詹颂，〈道咸时期京师满汉女性的文学交游与创作——以沈善宝〈名媛诗话〉为主要考察线索〉，《民族文学文学研究》2009年第4期，页123-128。

英文书目

Books

Ellen Widmer, Kang-i Sun Chang (eds.), *Writing Wome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Grace S.Fong, *Herself an Author: Gender, Agency, and Writing in Late Imperial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8.)

Grace S. Fong and Ellen Widmer (eds.), *The Inner Quarters and Beyond: Women Writers from Ming through Qing* (Leiden; Boston: Brill, 2010.)

Grace S. Fong, Nanxiu Qian, and Harriet T. Zurndorfer (eds.), *Beyond Tradition & Modernity: Gender, Genre, and Cosmopolitanism in Late Qing China* (Leiden; Boston: Brill, 2004.)

Ying,Hu, *Tales of Translation: Composing the New Woman in China, 1898-1918*(Stanford, Calif.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Kang-i Sun Chang and Haun Saussy (eds.), *Women Writers of Traditional China: An Anthology of Poetry and Criticism*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Lucie Cheng, Charlotte Furth, and Hon-ming Yip (eds.), *Women in China: Bibliography of Available English Language Materials* (Berkeley, Calif.: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c1984.)

Nanxiu Qian, Grace S. Fong, and Richard J. Smith (eds.), *Different Worlds of Discourse: Transformations of Gender and Genre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Leiden; Boston: Brill, 2008.)

Susan Mann and Yu-Yin Cheng (eds.), *Under Confucian Eyes: Writings on Gender in Chinese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Wang, Zheng, *Women in 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 Oral and Textual Histori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Wilt Idema; Beata Grant (eds.), *The Red Brush: Writing Women of Imperial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4.)

Yates, Robin D. S., *Women in China from Earliest Times to the Present: a Bibliography of Studies in Western Languages* (Leiden; Boston: Brill, 2009.)

Articles

Chang, Kang-i Sun, "Ming and Qing Anthologies of Women's Poetry and Their Selection Strategies", in Ellen Widmer, Kang-i Sun Chang (eds.), *Writing Wome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147-170.

Chang, Kang-i Sun, "Ming-Qing Women Poets and the Notions of 'Talent' and 'Morality,'" in Theodore Hutters, R. Bin Wong, and Pauline Yu (eds.), *Culture and State in Chinese History: Conventions, Accommodations, and Critique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1997) , pp.236-258.

Grase S.Fong, "Gender and the Failure of Canonization-Anthologizing Women's Poetry in the Late Ming",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26 (2004), pp.129-139.

Grase S.Fong, "Writing Self and Writing Lives: Shen Shanbao's (1808-1862) Gendered Auto/Biographical Practices", *Nan Nü: Men, Women and Gender in Early and Imperial China* , 2.2 (2000), pp.259-303.

Hamilton, Robert , "The pursuit of Fame: Luo Qilan (1775-1813?) and the Debates about Women and Talent in Eighteenth-Century Jiangnan", *Late Imperial China*, 18(1997), pp.39-71.

J. D. Schmidt, "Yuan Mei (1716-98) on Women", *Late Imperial China*, 29 (2008), pp. 129-185.

Nivard, Jacqueline, "Women and Women's Press: The case of Ladies' Journal (Fun ü Zazhi), 1915-1931", *Republican China* , 10 (1984) , pp.185-236.

Ko, Doroty, "A Man Teaching Ten Women: A Case in the Making of Gender Relation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in 柳田先生古稀記念中国の伝統社会と家族 (东京: 汲古书院, 1993), pp.65-93.

Li, Xiaorong, *Rewriting the Inner Chambers: The Boudoir in Ming-Qing Women's Poetry*, Ph. D. Dissertation, McGill University, Canada, 2006.

Mann, Susan, “Fuxue (Women's Learning) by Zhang Xuecheng (1738-1801): China's First History of Women's Culture”, *Late Imperial China*, 13(1992), pp.40-62.

Ropp s. Pual, “Love, Literacy, and Laments: Themes of Women Writer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Women's History Review*, 1(1993), pp. 107-141.

Xu, SuFeng, “The Rhetoric of Legitimation: Prefaces to Women's Poetry Collection from the Song to the Ming”, *Nan Nü: Men, Women and Gender in Early and Imperial China*, 8(2006), pp. 255-289.

Widmer, Ellen, “Retrieving the past: women editors and women's poetry, 1636-1941”, in Grace S. Fong and Ellen Widmer (eds.), *The Inner Quarters and Beyond: Women Writers from Ming through Qing* (Leiden; Boston: Brill, 2010.), pp. 81-105.

Widmer, Ellen, “Xiaoqing's Literary Legacy and the Place of the Woman Writer in Later Imperial China”, *Late Imperial China*, 13(1992), pp.111-155.

Widmer, Ellen. “The Rhetoric of Retrospection: May Fourth Literary History and the Ming-Qing Women Writer”, in Dolezelova-Welingerova and Oldrich Kral (eds.), *The Appropriation of Cultural Capital: China's May Fourth Projec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c2001.), pp.193-225.